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calibre 2.0.0

博览群书的革命家(逢先知)

——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从一九五〇年冬到一九六六年夏，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历时近十七年，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把它们介绍出来，对于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是有价值的，对于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是有意义的。

酷爱读书，广收博览

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后来，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到了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毛泽东十分爱惜自己的书。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一九四七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好了。在我接手管书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但是他对书的酷爱，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毛泽东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夏，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指导和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他还经常要我们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一九五八年夏，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我们特地给他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这里稍为多介绍一点毛泽东对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阅读情况。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兴起，使佛教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①（①毛泽东1961年1月23日同班禅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再以科学技术书为例。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也广泛涉猎，面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作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毛泽东常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一九五八年九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

在行进的列车中，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毛泽东经常用这句话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做秘书工作的，做警卫工作的，还是做医护工作的。一九五七年他亲笔写信给他的秘书林克，要他“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

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作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三月四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划、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等十五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四十七首，明代杨基、杨慎等十三人写的十八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三月八日他曾借阅楹联书十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还有孙髯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一百八十字的对联。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甚为赞赏，他能背诵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联丛话》中，认为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在对此书的批语中写道：“从古未有，另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例如，他借阅过宋朝林通（和靖）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林和靖，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诗人。于谦，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叶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二千多首，从中选出二百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写到“大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诗叫《励志诗》。随后要我们找出载有这两篇诗词的书给他。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昔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意思是说，从我们这里两边沉下去的月亮，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个人间，那里刚好见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呢？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要我们给他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是他在参观时看到的。

①（①从五十年代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为了使中央领导同志了解和学习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国务院有关的工业部门相继在中南海瀛台办了一些展览。毛泽东曾多次参观，如1956年4月12日至17日连续六天，7月中有四天，每天下午参观；1958年6月、7月间又先后参观四次。）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六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的学问很渊博，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他碰到不懂的东西，或者读一些有关的通俗小册子，或者请教专家，或者查工具书。在读书学习上，毛泽东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地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②（②毛泽东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的一次演说。）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吧！毛泽东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一些，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这一点，凡是与毛泽东作过长谈的人，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钦佩的。

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不是说他广泛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的很少；中国的现实文学作品也读的很少；至于经

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的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毛泽东读书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泽东很重视工具书，我们也很注意为他收集这类图书，在他的藏书室里，各种辞书和地图等工具书是相当齐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

《辞海》、《辞源》是过去发行量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部辞书，但毛泽东对这两部书都不甚满意。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见到《辞海》的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事这项巨大的重编工作。一九六五年出版了试行本。新的《辞海》出版以后，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将它跟旧《辞海》一条一条对照，看看新《辞海》有什么优点，与旧《辞海》有什么不同。他对新《辞海》仍不甚满意，他说，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有而没有。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新《辞海》的批评，不如说是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新《辞海》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九年重新修改出版。在重编《辞海》的同时，《辞源》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修订。

在毛泽东的故居里，现在还保存着一部小字本的《辞源》，那是从延安带出来的。解放初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部《辞源》，里面有他圈、划的地方。当人们看到这一道道的笔迹，会深深为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这部书字太小，后来我们给他买了一部大本的《辞海》，字稍大些，一直使用到晚年。

毛泽东提出编辑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谭其骧说，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史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①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它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一九八二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读中国史书提供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虽不能说没有工具书则无法读书；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书，确为读书提供了便利条件，有时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毛泽东从长期的读书生活中深深地感到编好工具书的重要性。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里说的书，是指《书经》。毛泽东把它推而广之，及于其他，就是说，不要迷信书本，读书不要盲从，要独立思考。他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在看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之后，总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毛泽东在他写的大量读书批语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作出自己的评价，有些见解和评价是相当精辟的。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他不仅对待中国古书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评价是比较好的，但他在建议各级干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强调要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了大量评论性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许多观点；但他自己认为，这还只是跟着书走，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他认为，应当以问题和论点为中心，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作进一步的研究。他说，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面又不迷信书本，具有独立思考 and 追根究底的精神。

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

毛泽东是一个读书不知疲倦的人。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他曾经号召我们的干部，

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了。

读者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每天管很多国家大事，哪有时间读那么多书？要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读书的效率也是很高的。他有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加上深厚的知识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读得快，记得牢，理解得深。毛泽东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不论读一本书，看一篇文章，还是同别人谈话，他能迅速而又准确地抓住要点，抓到问题的实质。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感受更深。读者大概都读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末几篇评美国白皮书的文章。白皮书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的，不到十天，于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就发表了他写的第一篇评白皮书的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发表四篇评论文章。他抓住并针对白皮书中的一些要害处，揭露了美国当时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美国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再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他要看拿破仑传，选了几种翻译过来的本子。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毛泽东每天睡眠的时间很少，像工作起来常常昼夜不眠一样，读书也是如此。他几乎把一切工作之余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了。

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换取来的！它是毛泽东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结晶，也是毛泽东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结出的硕果。

活到老，学到老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中国俗话，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过：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五十万年^①（^①这是当时科学界的说法。随着人类古化石不断有新的发掘，到现在为止，考古学家认为，人类历史已有二百万年、甚至更长。），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十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这里，毛泽东把学习（认识世界）的主体，由个人推延到整个人类。客观现实世界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

晚年的毛泽东，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不见低落。一九七三年，他在大病恢复后不久，还同科学家杨振宁谈论物理学的哲学问题。一九七四年，他以极大的兴趣同李政道讨论“对称”、“宇称不守恒”这些深奥的物理学问题。他还说：“很可惜，我年轻时，科学学得太少了，那时没有机会学。不过，我还记得年轻时非常喜欢读汤姆生的《科学大纲》。”一九七五年他的视力有所恢复后，又重读《二十四史》^②（^②1975年8月、9月两次读《晋书》。），重读鲁迅的一些杂文，还看过《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杂志，并且提出给他印大字本《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

到一九七六年，他还要英人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根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的记载，毛泽东要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他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也就是临终前的那一天的五时五十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共读了七分钟。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讲过一句话：“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①（^①这是按阴历算的，一年为三百六十天。）毛泽东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他五十多年前所作的诺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兼学问家，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附记

这里有一个书目，是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这是从当时我的登记本里照录下来的，读者可以从中窥见毛泽东博览群书情况之一斑。

10月23日

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示要以下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

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

《毛泽东选集》全部。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杨献珍的哲学著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一些主要著作。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西洋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日本史。《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朱熹：《楚辞集注》、《屈宋古音义》。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絮》。《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苏联一学者给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字帖和字画。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毛泽东读马列著作(逢先知)

毛泽东是在经过对各种思想流派和革命学说进行探讨、比较之后，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他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便终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从一九二〇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读了很多，有的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地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

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

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这是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根本方法。

一九二〇年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两三本书，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他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泽东在一九二六年已经直接地或者间接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但是问题不在于读了这本书，可贵的是，毛泽东用《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指导中国的革命。^①

（①《国家与革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柯柏年译），最早刊登在1927年1月15日出版的《岭东民国日报》的副刊《革命》（周恩来题名）上。毛泽东最早提到《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根据现有材料，是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的记录稿里。据初步分析，讲授时间是1926年5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此时（按：指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保卫祖国’口号时）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马列著作十分困难。但是毛泽东是多

么渴望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多么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啊！在他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挤的时候，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毛泽东因受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列著作确实不如他们读得多。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说服党内其他同志，就得有理论武器，这也是使他发愤读马列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马列主义的书。一九三二年四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根据彭德怀和吴黎平的回忆，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来，毛泽东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一九六四年三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亲眼目睹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一位忠诚的老革命家。在一次访问中，她对我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听了这段生动的回忆，使人对毛泽东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的精神，感佩不已！另据吴黎平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

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还因为列宁的作品，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①（①这是毛泽东1958年4月6日在武汉会议上的一段插话。）毛泽东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②（②1965年4月21日同中共中南局负责人的谈话。）在列宁著作中，《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等著作，又是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当然不只是这些）。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他用的这两本书还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划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两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这两本书早已丢失，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一九三三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①（①彭德怀自述第183页。）从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的这两本书有了深刻的理解。一方面，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还可以说明，为什么毛泽东特别重视列宁的这两部著作，反复地学习和研究，并用来教育中国共产党人。

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当时毛泽东阅读、圈划并作了批注的马列著作，现在保存在毛泽东故居的已经为数不多了，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

（多卷本，苏联出的中文版）、《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收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苏联出的中文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圈划的马列著作，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如何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某些思考。

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阅的马列著作，我们现在掌握的有两本，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也都是毛泽东为了当时的革命需要而重新阅读的。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毛泽东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1946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翻开书一看，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同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毛泽东

读这本书的时候，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重温列宁这部重要著作的。他从中汲取理论的力量，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乘胜前进，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塞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一日”。中宣部在六月一日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教育干部，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小册子，毛泽东读了许多遍，据我看到的，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评论。（这里顺带澄清一个事实，“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所谓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那是误传。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是作过批注的，但不是“文革”中流传的那个本子。）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评论，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对该书中斯大林概括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五条，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在斯大林批评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地方，毛泽东写道：“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在斯大林讲到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地方，毛泽东则写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这些批注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并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突破了斯大林的某些论点。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讲话中得到了充分展开。他说：现在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想立即进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就发愁，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商品生产？他就没有区别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在性质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充分发展和利用商品生产。为了团结几亿农民，为了换取农民的产品，就要跟他们做买卖，商品生产不是缩小，而是要发展。废除商品，对农民的产品实行统一调拨，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一个国家。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怕资本主义。毛泽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毛泽东并没有全盘肯定斯大林这本书，然而他抓住其中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他在读这本书时阐述的一些好的观点，至今还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干部

毛泽东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干部，大力提倡干部要读马列著作。在延安整风中，为了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他亲自规定高级干部都要学习《“左派”幼稚病》和其他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他提议整风之后，组织人力大量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当时他说：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如果读通了这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党就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党史》。一九四九年，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①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当时胡乔木写的这十二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给七届二中全会。由毛泽东起名的《干部必读》十二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从思想上武装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①这十二本书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一九五三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为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央决定全党干部学习《联共党史》九至十二章。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准备组织干部学习。但毛泽东说，《毛选》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大意）在我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学习苏联，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我们从苏联经验中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但也有消极

的一面。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苏联经验缺点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在总结我国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不同于苏联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出现严重失误的时候，干部中产生了某些混乱思想。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两本书：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①(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页。)

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七月十一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部门管理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习马列著作问题做出布置。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办法引起高中级干部读书。他认为，原来提出的目录，哲学书开得少了，书目中还应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三十本书都要出大字本，译文要校对一下。他还提出，要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他说，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二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①(①摘自许立群当时记录的毛泽东讲话要点。)过了不到一个月，八月四日，毛泽东专为印马列著作大字本问题写信给周扬，并且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应分装四本或八本，使每本减轻重量。毛泽东对印大字本关照得如此细密周到，是为了便利一些老同志阅读，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发展马列主义，创造新的理论

毛泽东重视阅读马列著作，但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他反对死读马列的书，生搬硬套马列主义教条，反对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他曾说过：“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固定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的观点注意变化中的事物。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②(②毛泽东1940年7月13日在一次干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

关于应当用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在一九六〇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今天读来仍很受教益。他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后，又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重新提出写序问题。他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到杭州进行这一工作。我也随着他们去了，还给毛泽东带去二十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加上别的一些书，装了两大木箱。毛泽东特别提醒，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刚提了一个头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但总的来说他又不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论断所束缚。他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大胆地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他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一起，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也曾经为开创一条中国式的道路进行过思考和探索。《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凝集着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一些光辉的思想，成为我们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他本人主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这个任务，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又发生过失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做的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总结经验，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力求创造出新的理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

介绍了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情况后，我想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毛泽东一生坚持读马列著作，并且一再号召全党学习马列著作，为什么自己在晚年却犯了严重错误呢？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毛泽东晚年长期脱离实际，又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因而对现实社会状况和许多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估量和分析。正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长期脱离实际，主观专断，就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在他出色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这是大部分时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晚年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教条化甚至误解，则又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紧密结合活生生的现实，实行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从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经验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

如果说，“否认理论”是“狭隘经验论”的特征，那么，《实践论》的写作这件事本身，却正是重视理论的一个明证。《实践论》、《矛盾论》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乃是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所进行的这些创造性的理论建设工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我们党建立和展开活动的初期，理论准备是不足的。这是由于：第一，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很不成熟。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过：“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这是从社会调查的材料准备这个方面来说的，从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准备这个方面来说，也是这样。这里说理论准备，取的是间接的含义。在理论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相互对立的，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理论发展上的不足，影响到中国无产阶级理论发展的不足。第二，中国共产党一诞生，立即投入迅速高涨的实际革命运动，来不及从容地作理论的准备。当然，决不可以低估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的巨大成绩。正是由于这种介绍和研究，使中国人民的眼界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貌。但是，这种介绍毕竟是很不充分的，马恩列的许多重要著作都还没有翻译出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还缺乏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第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党又立即投入武装起义，在农村、在偏僻的山沟开辟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没有可能从容地从理论上总结革命经验和探讨革命道路。

但是，革命难道能够等待理论准备成熟然后才去进行吗？革命实践在先。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党从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和理论建设，正是要从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从研究中国革命的条件、特点和规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而求得发展。当时，正是毛泽东从实践上和理论上代表了这个正确的方向。

然而，一些受教条主义束缚的同志却不能认识这个正确的方向。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在国外，在城市，在书本上，才能有马克思主义，山沟里不能有马克思主义。他们指责所谓“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否认理论”的“狭隘经验论”。

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从山沟里产生。它是从近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础上批判和改造近代资产阶级的理论成果而产生的，是在近代城市中产生的。从中国来说，它还是在外国产生的。外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也是在城市，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工人中传播的。毛泽东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是在城市，在同外国传来的新思潮相接触中，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到农村中、到山沟里去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必须同农村中、山沟里的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山沟里研究马克思主义当然有许多困难。然而，否认农村中、山沟里的中国革命实践，拒绝研究中国革命实践的这些创造性的经验，只是从书本上和外国决议上去抄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教条，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只能使它遭到挫折。

当毛泽东强调实践、强调调查研究的时候，他所要求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认为理论工作必须遵循这样的方向，并没有一般地否认理论、否认书本。相反，在同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下，他是重视理论，重视书本的，在山沟里和战火中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他是尽了可能去学习理论，学习书

本，提倡理论的教育和研究的。

在一九二九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在强调社会调查的同时，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在这个决议的“党内教育问题”一节里，在十项教育材料中，除了列为第七项的“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一项外，还有列为第八、九、十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以及列为第一、二项的“政治（形势）分析”，“上级指导的通告的讨论”。

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同时，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他还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写了一封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

在反革命“围剿”中，毛泽东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反杜林论》的中译本就是在1932年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他非常珍惜这些译本，在长征行军中都一直带在身边，没有丢失。

关于“狭隘经验论”的争论，给予毛泽东同志以极深的印象。他后来提到这场争论时说过：“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

关于毛泽东在陕北、在延安发愤读书的情况，有一些很生动感人的记载。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报道过：“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斯诺的访谈，是1936年十月间的事情。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给他早年的好友易礼容一封信。信中询问：“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李鹤鸣就是李达，信中提到的李的译著现在不能断定是哪一种。很可能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提倡党的干部都来读书。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②

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外面”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无，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③

毛泽东在陕北和延安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除马恩列斯的以外，还有苏联和中国学者的。其中李、雷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文字最多。从1936年十一月至1937年四月，在这本书的第三版上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一万二千字的批注，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划。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一千多字。后来，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又在这本书的第四版上作了一些批注。批注都用隽秀的行草字体。有对原著的扼要而精辟的概述，简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伸，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

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1936年十二月初版），毛泽东也作了许多批注。

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1937年5月出版后作者曾寄给毛泽东一本，毛泽东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他在书上作了很多批注，合计约三千五百字。1938年2月1日，毛泽东写“读书日记”，开头这样写着：“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以后逐日记了读书的进度。三月十六日记：“本书完。”

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论》（1937年一月再版），毛泽东也作了批注。1937年9月，还写了十九

页《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总共三千字。不久后写信给艾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空，我来看你。”

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同江西时期和长征途中比较要好一些的客观条件，“如饥如渴”地阅读当时他能得到的理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这种研究的特点，就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把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到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上，提到认识论和辩证法上来总结。他对所读的哲学著作的批注中，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特点。他写《实践论》、《矛盾论》和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对这些著作的阅读和批注，有许多就是写作《实践论》等的直接准备。

>写作《实践论》、《矛盾论》，并不是毛泽东研究哲学的结束，而是他研究哲学的新的开始。前面引的“读书日记”和《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就已表明了这一点。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给何干之写信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同样表明了这一点。

延安时期是民主革命中我们党在理论上达到成熟的时期。如果说，那以前我们党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的话，经过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进行的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系统阐明党的纲领和策略的理论建设工作，经过延安整风，党为指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从容地作好了理论的准备。

延安整风一方面纠正了“中国的主观主义者在脱离实践的提倡社会科学理论之重要性”的偏向，一方面也强调了联系中国革命实践学习和研究理论的重要性。整风学习文件中关于这方面的许多论述，是大家所熟悉的。整风前后，毛泽东在延安组织学习哲学，并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指出“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强调“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些情况，已有文章专门介绍②（②温济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是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的》，载《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4期。），这里就不详细复述了。下面再介绍几件关于组织编译和学习马列著作的事情。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的中宣部代部长凯丰：“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时提出：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的武装起来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凯丰：“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

总之，这里收集和介绍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批材料，目的是要用这些事实从历史方面来说明，那种认为《实践论》代表着“否认理论”的“狭隘经验论”倾向的观点是不合乎实际的。《实践论》从哲学上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指导和代表着我们党的理论建设工作的正确方向。

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龚育之)

在《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文中，介绍了毛泽东读理论书、特别是读哲学书的一些情况，包括他谈到这方面问题的几封信。这篇札记，是它的续篇，补充介绍其中没有提到的几封信。

关于思想方法论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以中央研究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名义，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根据理论与实际联系的研究方针，信中提出：“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

学习理论，学习哲学，“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这是我们党创造的一条很好的学习经验。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到贡献，就是充分地体现和发挥这种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掌握和运用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毛泽东更是特别强调这一点。他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矛盾论》，都是致力于解决党的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在延安整风中，尤其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这个问题。延安整风，首先是整顿学风。学风问题，按照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一文给的定义，就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延安整风，一般说是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从准备和从领导上说，则是一九四一年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作报告，鲜明地提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任务，尖锐地批评了党内盛行过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是过去党的领导上几次犯重大错误的思想根源），深刻地阐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搬用它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而是要学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在党的干部，首先是党的领导层中，引起很大的思想震动。随后，中共中央在七月一日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在八月一日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八月末，中央书记处议定要编辑马恩列斯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并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织思想方法的学习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九月初议定这个组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并确定王稼祥任副组长。接着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成员为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干部，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计划首先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和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到克服主观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九月二十九日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的。

“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看哪些文件呢？随信另单开列了要目，共七十篇，其中列为最低限度选读篇目的共四十篇。（这个篇目后来补充调整为八十三篇。到十二月，中央书记处编成《六大以来》这部大书，共汇集文件五百多篇，翌年十月，又编成《六大以前》，收文件近二百篇。这么多文件，当然不可能大家都读。一九四三年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一书，共选文件一百三十二篇，比这封信另单开列的多一些，所选文件的时间往前推到大革命时期，往后延到一九四三年。）

“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是为了在检讨历史时获得理论的、主要是思想方法的指导，把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到思想方法的高度上来。读哪些书呢？信中开列了四本，“请各同志首先看”这四本书。

第一本是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推荐这本书，不单是要求大家从中学习政治理论，着重是要求大家通过这本书来学习思想方法。的确，学习思想方法，不能限于读专门讲思想方法的书。通过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这类经济学著作和政治著作，读毛泽东的一些政治著作和军事著作，人们不仅可以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而且可以从这些具体运用的典范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学习思想方法的更好的途径。

直接讲认识论、讲思想方法的书，信中推荐了两种：“艾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新哲学大纲》是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辩证法唯物论》这个条目，米丁、拉里察维基等十二人分担写作，艾思奇、郑易里译。据艾思奇译序里介绍，书中第八章对于人类的认识过程的具体的阐明，“使我们对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的感想得到极明确的理解”，“是现阶段的一切新哲学著作里都不曾有过的”。《哲学选辑》是艾思奇从当时苏联和中国的几种“新哲学著作”中分别选取其中较为专长的部分编辑而成的，它的第四章便是选取的《新哲学大纲》的第八章。《哲学选辑》也是毛泽东仔细阅读和作了许多批注的一部哲学书。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六人合写的著作，李达、雷仲坚译。前篇介绍过，毛泽东曾两次细读这本书，作了许多批注。“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这一章，与《新哲学大纲》“认识的过程”一章内容相当，也是讲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的。毛泽东批阅这本书时，在这一章上作了不少批注，特别是联系中国实际写了许多批评“中国的主观主义者”、“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者”的话，说他们的一般是脱离个别（脱离实际）的，他们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导方面（决定方面），他们也带有形式主义性质，他们不注意具体特点，要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

点），他们在脱离实践的提倡社会科学理论之重要性，等等。这本书同当时苏联的其他许多哲学书一样，在批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时，往往把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直到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以后，苏联哲学界重新讨论形式逻辑问题，才纠正了这种偏颇的观点。毛泽东的《矛盾论》，原来也有“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其中也反映了这种混为一谈的情况。《矛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公开发表的时候，作者讲明“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删节，主要就是删去了这一节。

第四本被推荐的书是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河上肇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大纲》是他的流传很广的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著作，由陈豹隐译成汉文。推荐这本书的“序说”，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而是从思想方法的角度。因为这个“序说”是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出发点”和“研究方法”的。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高度评价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可是，在开列研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篇目时，并没有特别推荐斯大林为这个简要读本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是很耐人寻味的。斯大林这篇文章有许多精辟之处，但认识论在其中几乎没有位置，辩证法也讲得很缺乏色彩，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理论，规定“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思想科学”——这是一个很新颖的提法。提“思想科学”，恐怕不单是为了行文上与“政治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提法相比照而求得匀称，它本身也表明对哲学和对学习哲学要抓住哪个环节的一种看法。哲学当然不能完全归结为研究思想和思想方法，但突出对思想和思想方法的研究，的确很有见地。决定再一次强调：“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四月，毛泽东建议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编成。这是一本编得很有特色的书。后来，中央定出干部必读十二本，《思想方法论》是其中的一种。

关于社会发展史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给胡乔木一封信：“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四天之后，毛泽东给刘少奇一封信，送去一九三〇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恩格斯的《从猿到人》（郭烈夫编，成嵩译）。信中说：“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延安整风在一九四二年广泛展开以后，一九四三年曾插入一段审干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整风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毛泽东多次说过，整风后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读马列的书。从这两封信可以窥见当时中央领导人读书生活的一斑。那时读书受“延安能找到”的限制，在这个范围内，为找书读是作了最大限度的搜求的。

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历史唯物论的入门，这也是我们党创造的一条很好的学习经验。

两信提到的几本书中，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是出得最早的一本，一九二五年国光书店印行。是译，是写？原书没有说明。但称张为“编纂者”，从行文流畅以及偶有一两句联系中国社会史的话来看，可以判断不是直接翻译的，而是根据某一种或几种外国书编写的。书后附一详细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瞿秋白在他所译的郭烈夫书的附注里写道：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参看张伯简所译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这个附注说明，张这本书是当时受到注意的有用的书，很可能是据某一本外国书译写的。（一九二四年，民智书局还出版过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它是蔡在上海大学的讲义。）

瞿秋白译注的郭烈夫的书，一九二七年新青年社出版，书名是《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一九三〇年明日书店重新出版时，把书名改为《唯物史观的哲学》，译者改署为“屈章”。但这本书并不是专讲历史唯物论，而是通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郭烈夫从一八九三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一度是孟什维克，一九二〇年退出孟什维克，专门从事教学和研究。三十年代初他关于战争史的著作在报刊上受到批评。

赖也夫斯基的《唯物的社会学》，陆一远译，一九二九年新宇宙书店出版，是讲历史唯物论的。

毛泽东认为“十分精彩”的“恩格斯两篇短文”，都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一篇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篇是从《〈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节录的一段，另拟了一个篇名《人类进化的过程》。郭烈夫将这两篇文章，同他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长文放在一起，编成一本书。《从猿到人》这篇文章，在成稿之前，已有陆一远的译本，书名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一九二八年春潮书店出版。《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全译本，是杜畏之译的，一九三二年神州国光社出版。后来，于光远在延安重新翻译《自然辩证法》，先由解放社出了《从猿到人》这一篇的单行本，也将《导言》中的那段《人底进化过程》附入。于译本《从猿到人》，全国解放初曾广泛印行。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自然辩证法》中译成汉文最早、在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篇。

我听过于光远说过，毛泽东在延安曾提议在干部教育中要学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这个提议是很有道理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学习和研究自然界的发展，要学习和研究社会的发展。历史唯物论从社会发展史讲起，不是从几个定义、几条规律出发，而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叙述和分析中提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显然是较好的方法。同样，自然辩证法从自然发展史讲起，不是从几个定义、几条规律出发，而是从自然界历史发展过程和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讲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把自然辩证法、自然发展史、自然科学史以至技术发展史结合起来，显然也有很大的优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导言》不就是讲了一篇自然观发展史，并且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很概略地用辩证法观点描述了自然界发展的历史吗？

《从猿到人》，可以说是自然发展史的最后一章，同时，又是社会发展史的第一章，正好是自然发展史同社会发展史的结合部。恩格斯本来打算写一本《奴役的三种形式》（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这其实就是一本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本来是这部著作的导言。后来恩格斯放弃了写《奴役的三种形式》的计划，就把这篇导言手稿归入总题为《自然辩证法》的一束手稿之中。这个情况很好地说明了自然发展史同社会发展史的联系。

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在批评停止、悲观、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时，指出这些论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不符合上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和整个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事实。这段话可以作为毛泽东重视学习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一个印证。

毛泽东关于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建议，从延安以来就照着做了。后来中央规定干部必读十二本，就有一本《社会发展简史》，是根据一些外国书编写出来的。全国解放初期，在全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学社会发展史，学“猴子变人”（这当然是一种通俗但不确切的说法），形成热潮。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讲到，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他还说：唯心论者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艾思奇那时为适应这一学习需要而写的一本书，就叫《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这个学习对于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确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心投身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的解放和进步服务，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关于哲学通俗读物

毛泽东很重视哲学通俗读物。给胡乔木的信中说到他“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要找来看看，便是一例。这是指《人怎样变成巨人》这部书，它是讲人类发展史（包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用了生动的文学笔调（但还不好说是小说），作者是苏联的伊林和谢加尔。一九八三年，北京科普创作界还开过伊林的纪念会。

毛泽东几次提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前篇介绍过他曾经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给当时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去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他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并给他们和同他们在一起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

毛泽东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也很赞赏。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给李达的信中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李达的另一封信中又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一九六〇年，毛泽东写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林克一封信：“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

印行，一九五七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

哲学通俗读物的重要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这种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并要为他们所掌握的，它必须“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而哲学，又是探讨最一般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因此又比较最不易懂。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的重要任务。抓住思想方法论来学哲学，从社会发展史来学历史唯物论，就一个方面的意义来说，也可以说是有利于通俗宣传，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接触和掌握。文字表达和体裁形式的通俗化，也非常重要。一本《大众哲学》，曾经在抗战前到解放初的几茬进步青年中发生影响，就足见其重要性。

要哲学书为青年和群众所愿读，所爱读，单是文字表达的通俗易懂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科学地、准确地（而不是简单地、庸俗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探讨和分析当前人们所关心的从政治、社会、科学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新的实际问题。一九八三年通俗政治读物评奖，有几本哲学书得奖，都是值得称道的成果。

组织老一辈的、中年的和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努力写出更多“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具有吸引力而为群众所爱读的理论书籍；通过各种报刊和其他途径，热心地向群众推荐和评介好的书籍；运用各种形式（包括组织各种读书会，组成读书会网），在群众中开展和推进读书活动——这些，都是要我们认真去做的工作。

对几本哲学书籍的批注(田松年)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哲学领域里劳作最勤、收获最丰的时期。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和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前后，他在读过的许多哲学书上留下了大量的批注。

当时的延安，书籍奇缺，哲学著作就更少了。他读的哲学书，有经过长征带在身边的，有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提供的，有向周围同志借来的，也有别人赠送的。现在保存下来的他读过的一些哲学书，有的上面至少有两三个笔迹不同的人写的批语。毛泽东在到处寻找哲学书阅读。

毛泽东在延安阅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主要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此外，他还读了不少中外哲学和哲学史著作，如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米丁以及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著作。令人惋惜的是，经过战乱，他读过的这些书有一部分已经散佚，不可复得了。

系统研读哲学教科书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并且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书籍，有下列七种（八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第四版）①，《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②，《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④，《社会学大纲》⑤，《思想方法论》⑥，《哲学选辑》。⑦他还很可能在米丁等人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上留下批注，但他读过的这几本迄今都没有找到。

上述八本书中，批注多且重要的有五本。根据批注的内容、笔迹的先后、版本的日期及毛泽东本人在书后及“读书日记”中记载的批读时间等多方面综合考察，它们的批读顺序应当是：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这是毛泽东本人在该书末页的背面上写下的时间。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丁等著），一九三七年内，八月以前。

《社会学大纲》，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三月十六日，这是毛泽东在“读书日记”里记下的读书批注时间。也有可能在这之前，即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后不久就读到了此书，但目前留下的批注是这个时间的。

①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雷仲坚合译。上海笔耕堂1935年6月第3版，1936年12月第4版。

②苏联米丁等著，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初版。

③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4章第2节，博古译。中国出版社1938年12月初版。

④上篇：《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日本河上肇著，李达等译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11月第2版。

⑤李达著。上海笔耕堂1937年5月初版。

⑥艾思奇著。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1月第2版

⑦艾思奇编著。延安解放社1939年5月第1版。

《哲学选辑》，一九三九年五月该书出版以后。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从毛泽东读该书的批注内容来看，其中提到“三三制”、“三月参政会”等，因此，读这本书当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后。

五本书的批注，只有头两本，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在文字和内容上与《实践论》和《矛盾论》有直接的联系。

毛泽东的批注，可分为文字批语和读书符号两大类。在五本书篇页的天头地脚、边白中缝和段末行间，他总共写下约两万字的批语。其中尤以《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为最多，在一万二千字左右。这本书中最长的一条批语，有一千二百字左右。

这些批语，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提要、归纳、概括及发挥，有对原文观点的臧否和疑问，也有自己提出的独立见解。例如，毛泽东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原文提取和复述了这一句话：“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这表示他注意到这个观点，这句话后来也写进《矛盾论》里了。对于《哲学选辑》中的一章里所说的旧唯物论的历史局限性表现为三大特点：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历史观上的不彻底性，他批道：“只有两大特点”。似乎认为机械性实际上是形而上学性的一种表现，应归并到形而上学性之中。

批语中较多的，是他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写下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阅读了教科书上关于外的矛盾和内的矛盾，即后来他在《矛盾论》中表述为外因和内因关系的原理后，毛泽东用以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教训，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上的批注中说，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的发生影响。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

毛泽东抓住《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提出的“矛盾的主导方面”的概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发挥。他认为不仅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会互相转化。他据此在这本书第三版上的批注中指出：“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后来，在其名著《论持久战》里，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详尽地分析和对比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和双方的强弱程度，优劣形势随战争过程延长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抗战是持久的，并必将获得最后胜利的结论，对全民族坚持抗战到胜利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在所读的书上还留下了许多符号，它们有：△、○、一、×、√、斜线、方框、竖和波浪线、单杠线、双杠线甚至三杠线，还有顿点和问号。这些符号往往也反映出他在读书当中的某种意图和倾向，对于理解他的思想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问号，直接显示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怀疑或反对、深思与不解。《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中有一段话：“否定的本质，否定之否定的本质，都在于它是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发展中的动因。”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毛泽东批在书上的问号非常之多，有的一页多达四、五个。有些问号已被他用短斜线划去，这表示他后来已理解或肯定了书上的说法。

毛泽东的批语和符号，是用铅笔和毛笔写的；书上很多地方圈点细密，杠划不断，字句连绵；圈旁有圈，杠外加杠，字上叠字（铅笔字上叠写毛笔字）。毛泽东的这些批语和符号使人想见，他是多么认真仔细、逐字逐句地多次阅读了这些书，他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多么的刻苦精勤！

五本书上的批语向我们显示出的情况完全符合一般学习的规律：较早读的书上批语多且具体，往后读的书上批语较少且较原则；较早批语中的转述、摘要和说明的东西占较大的比例，后来的批语则研究性、独创性的见解逐渐加多，结论、命题式的东西时有所见；前面的批语对某些问题和观点的看法还显得不那么清楚和有把握，后面批语的思想则比较明晰、成熟些。例如，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里，毛泽东大体接受并沿袭了教科书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些说法；在《哲学选辑》的批注里他则发表了不少个人的见解。他认为，说一过程内部有质变三阶段是不对的，发生、发展、消灭是一个过程的事，每个过程都有这三阶段。每一过程对下一过程言是肯定，对上一过程言是否定，对再上一过程言是否定之否定。这就明确表示出他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讲的是过程与过程之间的转换变化，而不是过程之内阶段之间的变化发展。

毛泽东的批语，主要是写在几本哲学教科书上面的。由于教科书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基础性，他的批语也追踪到哲学的许多方面、许多观点和问题。各本教科书大多讲述着同样的原理、范畴和规律，他在不同书上的批注，有时也重复涉及同一个内容，使我们能够集中地了解他对某个哲学问题的观点，甚至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的变化发展。例如，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对、绝对问题，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中说，“一切过程矛盾的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任何过程如此”。在《哲学选辑》的批注中，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有了发展，变得更加全面和辩证了。他指出：“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对和绝对，在一定的条件下（时间的久暂）是互相转化的；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性或斗争性都能在事物发展中起支配性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个批注，有助于人们更完整、准确地理解《矛盾论》中的有关思想，澄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争论。

毛泽东的许多批语包含的观点和思想，是他公开发表的哲学论著中没有或少见的。如他总结哲学史上的众多派别、思想，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的批注中，认为可以区分为唯心辩证、唯心形式、唯物形式、唯物辩证四种。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儒家的“中庸”观念，他在《哲学选辑》的批注里指出其合理性在于肯定事物质的安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辩证法的一要素。但“中庸”整个地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害怕量变引起质变，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维持旧质不变，把旧质绝对化。所以“中庸”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关于认识的两个过程，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的批注里提出：“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这种运用矛盾问题精髓的原理来分析由认识和实践这对矛盾运动变化产生的两个认识过程的做法，也是十分独特的，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关于辩证法的一些范畴，毛泽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在《哲学选辑》的批注里认为，“根据即基本矛盾”，“次要矛盾与外的矛盾都是条件”。从矛盾的角度如此给根据和条件这对范畴下定义，是过去无人做过的。此外，对质量互变规律、过程和阶段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都有不少新看法。这些批语对全面、深入地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貌及内涵，是弥足珍贵的。

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两万字的批注内容来看，大致包括哲学基本理论、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上的问题。在哲学原理方面，批注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这两部分是毛泽东全部批注的核心和主体。在认识论里，关于认识运动的过程和阶段、主客体辩证关系、实践观，是批注较多的问题。辩证法方面批注较多的有：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规律，内因与外因、可能性与现实性、本质与现象、根据与条件等基本范畴。与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相联系，毛泽东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对各种机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其他错误倾向加以评析的批注，也有相当的数量。

继续探讨哲学问题

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泽东在读了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后，作了约三千字的辑录。从辑录可看出，他并非原文摘引艾思奇的观点，而是在文字叙述上有变化，内容上有增改。对艾文中“差别不是矛盾”的观点，他有不同看法，却十分客气地称是“略有疑点”，写信给艾思奇，准备登门面商。在给艾思奇的信中毛泽东还指出，“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艾思奇当时年仅二十七岁，毛泽东作为一个全党领袖，如此认真阅读一个青年同志的理论著作，充分表现出他谦逊好学的精神。

在《毛泽东书信选集》里还发表了毛泽东给张闻天、陈伯达的三封信，都是评论陈伯达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文的。其中论孔子哲学思想的一篇，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到二十二日前后很短的时间内看了三遍。这三封信共有四千多字，谈了不少对中国哲学史和哲学原理上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信中谈的中庸问题，两条战线斗争问题，质和属性的关系问题，与他在同年五月出版的《哲学选辑》上的批注，有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哲学批注和辑录等，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哲学遗产，它是毛泽东为革命发愤读

书的生动的历史见证，是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成长的一个记录和缩影，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宝库里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解放后，毛泽东仍然挤出时间，孜孜不倦地阅读各种哲学书籍和期刊。

毛泽东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时，非常注意该书对于华严宗思想的分析。该书认为，华严宗承认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有一点辩证法；但它又唯心主义地夸大、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这种联系绝对化，抹煞个别存在。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批道：“何其正确”。他还批道：“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岂非自相矛盾。”

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一九六五年内部讨论稿）的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他写下了一条较长的批语，表达了他对唯物辩证法体系的看法。他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他的以对立统一规律指导说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思想，在延安时期的读书批注中已有突出的表现，这里把他的这个思想明确上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提出来了。在这本书谈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的问题的旁边，他批道：“不必抄斯大林”。联系到延安时期他在博古译的斯大林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的批注少，疑问多，标出原文的要点多，自己的说明发挥几乎没有等情况来看，他对斯大林的这个哲学体系评价不是很高。

对于哲学期刊上的文章，毛泽东也时常留意。在读了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一九六五年第四期上一篇有关孔子思想的文章后，他在文章题目的上方批下“孔门充满矛盾论”七个字。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在读书批注中慨叹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严重，阻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理解和创新发展时说：“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①（^①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上的批注。）毛泽东通过发愤读书，理论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写出《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这样杰出的哲学著作，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读书学习的态度和方法，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毛泽东与自然科学(龚育之)

不能说，毛泽东是一个自然科学素养很高的人。这是容易理解的，完全可以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就是说，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人是历史造就的。不可以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苛求于前人。这篇文章里想要介绍和说明的倒是，作为一个求知者，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毛泽东对学习和涉猎自然科学是颇为注意的，对某些问题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就这些而言，应该说，还是他值得称道的长处。

“多向自然科学学习”

毛泽东向斯诺讲述过自己青年时代追求新知的经历，说他在湖南师范学校求学的五年中，“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这是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开新年大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须采用甚么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发言，赞成“俄式”方法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列宁的主义”）之后，在讨论会友个人的计划时，毛泽东发言：“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法补足。”这一年毛泽东二十八岁，“三十以内”，还有两年。毛泽东还说：“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这段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当毛泽东明确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和这条革命道路的时候，同时强调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必要。他并不以学生时代对自然科学不甚感兴趣为正确或无所谓，相反，

他要设法补足由于这种偏颇而造成的知识结构上的缺陷。现在我们不能详知，那两年中他在多大程度上挤出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时间。看来，紧张繁重的革命工作，首先是建党工作，使他不得不在读书方面继续作出“最痛苦的牺牲”。但是我们知道，终其一身毛泽东都注意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志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大概”。延安时期如此，①北京时期如此，直到逝世前几年，眼力很差了，他还收藏和阅读一些特地印成大字的自然科学书刊。②

①延安时期毛泽东搜集的藏书中有不少自然科学书籍，如商务印书馆出的汤姆生《科学大纲》，辛垦书店出的普朗克《科学到何处去》，奉斯《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物理世界的本质》等。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会前，毛泽东邀请商务的创始人张元济等同游天坛，曾向张说：他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

②如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自然辩证法》杂志等。

从一九二一年这一段话，联想到一九四一年的另一段话。那是毛泽东一月三十一日写给在苏联上学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的信中的话：“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这里讲了政治和科学的关系——谈政治要以学科学为基础；又讲了学科学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先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然后再学社会科学。撇开这段话可能针对的具体背景不谈，我认为，就一般意义而言，这个主张是很有道理的。从科学发展史来看，最先成为科学的是自然科学，然后社会科学才成为科学。对社会的研究早就有了，上升为科学，从总体说，是以马克思主义诞生为发端。先成为科学的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科学之发展成为科学，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都起了很大的影响。人们的学习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要大致地重复人类的认识过程，这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精神古生物学”和“精神胚胎学”的统一，合乎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统一的规律。所以，对于年纪尚轻的人，有意识地按照这个规律来指导他们的学习，是很有益处的。当然，这是我对毛泽东这一主张的一种体会。他如何形成这一主张，信中没有细说理由。一个可以想见的显著理由，就是系统地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如果年轻时没有获得或抓住机会，成年后便很难有时间和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许多人一样，是过来人。所以，他谆谆告诫年纪尚轻的人，要抓住机会潜心“多习自然科学”，频频督促我们的干部，要以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包括“学一点自然科学”。

进化论与救亡图存

毛泽东向斯诺列举年轻时代给他以深刻印象的西方著作时，提到一本自然科学书，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原始》。

严复译出赫胥黎宣传达尔文学说的著作《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于一八九八年出版，在中国知识界立即掀起巨大的波澜。被帝国主义“虎视鹰瞵”，即将遭到“瓜分豆剖”的中国（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兴中会宣言》中语），先觉者欲奋起救亡图存，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中，找到了警醒和激励国人的思想武器。所以，进化论在当时的中国，与其说是作为一种自然科学学说，毋宁说是作为一种社会学说，引起人们的注意，受到人们的欢迎。现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人们常常批评用生物进化学说来解释社会现象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我当然不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科学的。但是，像进化论这样重大的自然科学思想成果，不能不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不是说过吗？“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我认为，进化论对人们世界观、历史观的影响，是汇合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②中的一股潮流。

毛泽东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进化论的。他曾经说过，为了抵御帝国主义，“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这失败，不是作为自然科学学说的生物进化论的失败，这个生物学学说被事实证明为真理，是不败的；这失败，是朴素的进化论历史观的失败，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它以包括进化论在内的重大成就为其自然科学依据）在中国的传播和胜利。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前，关于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所有译作中，《天演论》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毛泽东无疑读过这部书。至于《物种原始》，是不是在他向斯诺所说的年份读过，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多说几句话。按斯诺的记述，那是毛泽东一九一二年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的时候读到的。但是，《物种原始》的第一个完全的中译本，马君武的译本，是一九二〇年才出版的。一九二〇年十月毛泽东起草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记载了临时营业一个多月销售出去的书刊清单，其中有《达尔文物种原始》，计售出十

份。这个时期毛泽东读到《物种原始》的全译本，是可能的，在这之前不可能读到。不过马君武译这部书，经过多年努力，在一九〇一年出版了《达尔文物竞篇》（即《物种原始》第三章），一九〇二年出版了《达尔文天择篇》（即《物种原始》第四章），一九〇四年出版了达尔文《物种原始第一卷》（即前五章，全书共十五章），这些部分篇章的单行本虽然传播不广，毛泽东读到过是可能的。当然也不排除误记的可能性。按斯诺的记述，毛泽东这一年读的书中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斯·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除卢梭的著作外，这里列举的都是严译名著。其中“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是《穆勒名学》（论理学、逻辑）的误记；“斯宾塞的《逻辑》”是《群学肄言》的误记。由此推测，“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也可能是严译赫胥黎《天演论》的误记。

毛泽东晚年还提到过达尔文、赫胥黎和《天演论》。

一九七〇年，他在一个批示中写道：“《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这两本书都是赫胥黎写的。他对《天演论》的这个评价。显然是依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说的观点：旧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不能贯彻唯物主义了。

一九七四年英国前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会见毛泽东时，送给毛泽东一张达尔文的照片（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的其他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

毛泽东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

希思点头，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说：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这里说的是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同攻击达尔文学说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

毛泽东钦佩达尔文的著作为世人所知，不仅是由于斯诺那本书的传播。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和谈话中，多次提到达尔文和进化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在这个讲话的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节里，他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遗传学与百家争鸣

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方针，有多方面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哥白尼日心说和达尔文进化论的经历、是过去时代的历史教训；遗传学的经历，则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教训。这个历史教训，发生在苏联，也发生在中国。

大家知道，李森科发动的、在一九四八年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上达到高潮的对遗传学中摩尔根学派的粗暴批判，是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批判中影响最大、最恶劣的一起。那次会后不久，这个批判随着报刊上的介绍和苏联专家来华讲学而在我国传开。我国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广泛组织了对李森科报告的学习，并在某种程度上仿效苏联的做法，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这种不正常情况，在苏联，在我国，都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以后才逐步得到纠正。

在这期间，毛泽东曾三度注意到遗传学的问题。

第一次是一九五〇年。当时，有一些人向中央反映，一所大学由于仿效苏联做法粗暴对待摩尔根学派学者，引起党和自然科学家关系的紧张。这所大学的领导人得知后，给刘少奇写了一个报告，为自己申辩。七月十五日，刘少奇将这个报告送毛、周、朱及中宣部和教育部领导人传阅。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道：“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这位同志“思想中似有很大毛病”。同一天毛泽东还批阅了反映同一问题的另一份材料，指出必须彻查这个学校的领导，“并作适当的处理”。查处的结果，解除了这位同志在大学的

领导职务，先在会议上后来又在报纸上批评了他对待知识分子和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

这是党中央纠正这方面错误的开端，虽然仅仅是范围和程度很有限的开端，但毕竟是有了开端。后来陆定一在阐述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由来时，曾提到这次批评。

第二次是一九五六年，即在提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的时候。

这里先讲一点背景。从一九五二年底开始，苏联科学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对李森科某些学术观点表示不同意见的批评文章。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的发表是有关系的。因为这篇文章批评了苏联学术界某些权威的“军阀式统治制度”、指出“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从而引起了苏联学术界气氛的若干变化。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的报刊进一步批评了李森科企图压制学术争论的错误行为，还陆续揭露了李森科学问作风的一些事件。苏共二十大后不久，李森科辞去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中国的刊物和报纸，对这些作了介绍和报道。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遗传学领域的这些动向。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东欧一位党的负责干部的谈话纪录，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观点的反映。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给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际春写了几句话：“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

一个星期以后，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十大关系”。在讲“中国和外国关系”的时候，他强调对外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对苏联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并说：“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学习苏联李森科那一套，就被举出作为盲目学习人家短处的一个例子。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发言之后，毛泽东再一次讲话，正式宣布：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他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再举了自然科学方面“像李森科这样的问题”作例子。

在毛泽东这些讲话和他给中宣部领导同志那封信的推动下，经中宣部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这年八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是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我国为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系统地纠正过去的错误而召开的一次影响很大、很好的学术座谈会。它同全苏农业科学院一九四八年八月会议形成鲜明的对比。^①

①1948年的会议，苏联出版了逐字记录，中译本由财经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1956年青岛会议的发言记录，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86年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书名为《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关心这方面历史的读者，如果对比着读这两本书，会感到很有趣味和引人深思的。

第三次是一九五七年春天。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作过之后不久，毛泽东读到遗传学家李汝棋教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这是李汝棋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谈会议收获和自己意见的一篇文章。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他还亲自代《人民日报》拟了一个按语：“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毛泽东替作者换上的题目。这个简明而精辟的论断，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概括，对百家争鸣方针的深刻阐述。

关于机床设计发展战略的讨论

毛泽东比较爱看《光明日报》，因为这张报比较注意登理论文章，能给他较多的关于学术思想的信息，包

括有关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信息。

除了前述的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上李汝棋文章的事例以外，还有一个事例，就是要求《红旗》杂志转载《光明日报》上关于机床设计的文章。

一九六〇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提交会议的文章中，有一批是结合当时技术革新的发展而研究和写出的。“蚂蚁啃骨头”（小机床加工大工件），“积木式机床”，是当时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成果。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就这个问题作了分析和研究，写了《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在会上已引起注意。会后，此文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请《红旗》杂志加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下面这封信。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信末原署“毛泽东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后来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

这封信当然给作者们很大鼓励。他们原来的文章，转载在《红旗》一九六〇年第二十四期上。他们按照信的要求写出的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红旗》在一九六一年第九——十期上予以发表，还加了一个按语。按语说了前面那封信的要求，说了这篇文章的论点还可以讨论，还有不同意见，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且表示希望：“如果每一个专业，每一个科学研究机关，每一个生产单位，都能用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的方法，抓住他们自己业务中的一个特殊性的矛盾，用一定的时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同志，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开始，到这篇文章的写成，共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那就可以预期，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将获得愈来愈多的成果，将出现更加繁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半年以后，在《红旗》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四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机床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综述，介绍了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这两篇文章和当时的讨论，有些关于矛盾的分析 and 议论，从哲学方法上说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是不是有搬弄概念的缺点？），但是主要的、实质的东西，是对机床发展方向的分析和预测。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文章所作的预测的科学性到底怎样，这是应该由机械学家们来判断的事情。最近有同志写文章，认为那两篇文章是我国从宏观上从综合上讨论技术发展战略问题的较早的文献，而这类研究正是现在应该大力提倡的。我觉得这个评论是有见地的。

毛泽东说，他“很喜欢读这类文章”，“还想懂得多一点”。这说明他对哲学研究同技术研究的结合。对技术发展的思路 and 战略的探讨，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和关注。

坂田文章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复刊

毛泽东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这件事，我知道以后，是很高兴的。因为于光远创办和主持这个杂志，我是参与其事了的。

一九五六年制定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十二年规划的时候，大家建议在哲学研究所设立自然辩证法组，并创办一个通讯性质的杂志。这两条建议当年都付诸实施了，于光远兼任这个研究组的组长，《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季刊）即由这个组负责编辑。创刊号上刊载的就是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草案及其所列项目的二十几份说明书。杂志办到一九六〇年年中停刊。当时整顿刊物，说哲学研究所应集中力量办好《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任务由《哲学研究》承担就行了。事实上《哲学研究》不可能完全承担，于是《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于一九六三年秋天复刊。

这个杂志发行量不大，开头不过二千份，后来也不过一万份。读者圈大致限于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一些对自然辩证法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哲学界多数人不大会注意。然而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我们最先是一九六三年底知道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科学小组的聂荣臻、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等同志到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谈话中，毛泽东问起这个杂志，说：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哪里出的？

于光远向毛泽东说明了情况，回来告诉了我们。停刊前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哪些内容引起毛泽东注意，不得而知。复刊后引起他注意的有哪些，很快我们就得到了信息。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在北戴河，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这次毛泽东又讲到这个杂志，特别讲到杂志复刊第一期上刊登的、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转译过来的日本学者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这篇文章，赞赏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根据我当时整理的谈话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①（①准确地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说的原话是：“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坂田引用的就是这句话（《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62页）。此外，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在黑格尔“有限性中包含着无限性”这些话旁边，还批了这样的话：“应用于原子和电子的关系。总之就是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哲学笔记》第114—115页）。恩格斯1867年6月16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早就指出过：分子、原子不是“可分性的极限”，而是“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各个关节点，它们“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9页）。可见，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物质分割的无穷系列、物质的不可穷尽性，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八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毛泽东又找于光远、周培源到中南海他的卧室，谈坂田文章，并且比较系统地谈了他对自然界辩证法的一些见解。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于光远作过一番描绘：

“到了颐年堂，毛泽东身旁的工作人员就把周培源和我领到了卧室。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第一句话是不无歉意地作了一句解释：‘我习惯在床上工作’。我就说：‘主席找我们来大概是谈坂田文章的事吧？’他说：‘对了，就是这个事。’于是我们就坐在离床不远的两把椅子上。坐定之后秘书沏了两杯茶就走了，整个谈话时间都没有进来。谈话时房间里只有三个人，安静极了。于是，毛泽东就长篇大论地说起来。一开头他说：‘今天我找你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毛泽东讲：‘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毛泽东又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学堂里解放出来。’毛泽东还说：‘认识总是发展的。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球就更加多了。……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的一大块地方现在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在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在毛泽东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插进去提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毛泽东回答说：‘你说的那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镊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镊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镊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我接着问：‘哲学书里通常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个看法行不行？’毛泽东回答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的阶级发展到自为的阶级。这时，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回答了我的两个问题后，他从天讲到地，从地讲到生物，从生物讲到人，就关于自然发展史的轮廓发表了一些想法，根本的思想是‘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说的人类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是指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生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这好象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产生的东西都有

它自己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代替它。’

“话题又转到物理学的新发现上来。毛泽东说：‘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①

①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363页。

当时，正在举行北京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会议。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接见与会的各国科学家时，同坂田握手，并说自己读过他的文章。这引起坂田的惊讶和喜悦。后来游颐和园，坂田向于光远询问，于光远向坂田说明了毛泽东从哪里读到坂田的哪篇文章，告诉他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非常重视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还告诉他，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就同钱三强谈过“质子、中子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问题，表示过“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的意见。）坂田很感兴趣，说：可惜他原来不知道毛泽东一九五七年讲过这些意见。如果早知道，他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坂田回国以后，多次写文章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

因为毛泽东对坂田文章这样重视，坂田又说过他那篇文章苏联译得不甚准确，我们找人从日文重新译出这篇文章，题目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听说毛泽东对人说过，这样的文章，专门名词、专门知识一般读者不懂，应该作些注释。我们又组织人作了一批注释。根据毛泽东几次谈话的精神，我们替《红旗》编辑部起草了一个较长的按语，连同译文、注释一起，在《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发表。随后在科学界和哲学界进行了一系列讨论，《红旗》一九六五年第九期还发表了一个讨论专辑。

这些活动，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起了较好的影响。因为它着眼于引导，要求把哲学的探讨同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是离开这种具体研究去谈玄。

当时我国有一群理论物理学家，致力于基本粒子的研究。毛泽东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从物理学家那里来的，反过来又影响这群物理学家去认真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他们把这种粒子称为层子，建立了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这些成果在当时是站在前沿的工作。在这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夸克”大致相当于“层子”。从那时以来，这方面研究工作取得长足的进展，“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

杨振宁、李政道、格拉肖、“毛粒子”

毛泽东同于光远、周培源谈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后来，他有机会同杨、李本人讨论了粒子可分不可分和宇宙守恒不守恒的问题。

七十年代以后，中美关系打开了，杨、李等许多海外华裔学考纷纷回国探亲、访问。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接见了来访的杨振宁，陪同杨来见毛泽东的是周培源。杨在海外报刊上多次谈到毛同他这次谈话的情况和内容。

毛泽东在谈话中间问到哥本哈根学派现在怎么样了，又问到光量子能不能分？杨答：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毛表示，他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那么一万年后，科学家干什么？又问现在坂田怎么样了？周说坂田在一九七〇年去世了。毛又说到公孙龙和惠施，说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到“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白马非马”，等等。杨说：在国际上，对基本粒子可分，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基本粒子有构造，但观察不到；一种认为能观察到，不过现在还没有看到。

周把话题引到杨、李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的原理。杨说：宇称守恒，简单他说，就是左右对称。在原子核里头，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守恒的，但是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毛问：宇称守恒又不守恒，是吗？并说自己是搞政治的，不懂科学，称赞杨对世界是有贡献的。还两次讲到不要讲什

么“万寿无疆”的话，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又接见了来访的李政道。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李在《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发表过回忆文章。

毛泽东请李讲讲李的那个发明创造。李说：我们没有什么发明，就是通过实验得出结果，通过结果求得了解，又想能不能另外做一些新的实验来校正原来的想法。实验的结果又修改想法，反复不断地进行。从实验开始，引出理论，进行解释和猜想，又进行实验。陪同接见的朱光亚说：你讲讲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吧。李说：那就是，宇宙是不是绝对对称？比如，有正电子、负电子，正质子、负质子等等。但后来理论就脱离了实践，说宇宙一切都是绝对对称的。一九五六年我和杨振宁看到一些新的实验很难解释，就问那时的理论是不是有根据，发现很多没有根据。我们做实验。发现从前的绝对猜想是错误的。很多事实表明，正负、左右是不对称的。

毛说：我这的肩膀就是这（右）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左）好，这边差。

李说：常常说，人有不大对称的。有时期宇宙，比如从人开始，是不对称的。比如，心是在左边。

毛说：心是左的，胃是向右的，从胃到小肠是向右的。

李说：但是心不对称，不等于自然界都不对称，大多数是对称的，人的心在右边的也有，不过人数很少，大约占一百万分之一。但是现象不对称，不等于基本原理不对称。

毛问：平衡跟对称是一个意思吗？李用铅笔作了演示。毛又讲到宇宙，空间，时间，是运动的，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了。难道微观世界是有限的吗？我在这里想，可能也是无限的。

李说：我们追求科学真理是无穷的。我们说，原子构造是无限的，一时看到的有限。朱说：但是一个时候叫了“基本粒子”。李说：是粒子，但不是基本。这倒不是我们叫出来的，在我们以前，有人就叫作是“基本粒子”。我们认为错误了。这只是一种相对的了解。现在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基本粒子”完全不基本。

毛说：希腊人说，那个原子是基本，是不可分割的。现在分得一塌糊涂。现在好多问题闹不清楚，比如：光学，太阳发出来的光，它的结构怎么样呢？

李说：我们觉得是电磁场的波动。

毛问：内部结构呢？

李说：我们知道光子走的时候，是正电子和负电子偶的结合，然后下面是正介子和负介子偶的结合，再下面又是正介子和负介子偶的结合。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也是复杂的。

毛又问：电子呢？李作了解释。毛再问：外围电子呢？李又作了解释。

毛又讲到牛顿的宇宙力学要用一个外面的力来推动宇宙，第一次推动，以后就自己动了。讲到第一个提出宇宙演化的是德国的康德，他的学说叫星云说。后来法国的拉普拉斯发展了。讲到英国的培根、达尔文、莱伊尔都是了不起的学者，莱伊尔是搞地质学的。达尔文是搞生物学的。

有趣的是，毛还讲到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科学大纲》，讲到自己年轻时读过那本书。第二天在飞机场，李政道收到毛让人给他送来的一本一九二二年版的《科学大纲》，作为送别的礼物。

同这样两位有伟大贡献的理论物理学家畅谈这门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在以“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为主题的叙述中，这件事是值得记的。还有一件值得一记的事情是，毛泽东逝世后，一九七七年夏威夷开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说了这样一段话：

“有好多次，科学家都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然界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但却又发现还有更深更简单的结构。格局总是这样：建议把一种实体看成是基本的，然后就观察到这种实体还有许多不同的变种，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猜测的分类法，最后终于认识到，这种实体只是由更为基本的部分组成的复合体。

“这样，定比和倍比定律以及气体的行为向人们证明了原子的存在，接着就确定了四十多种类型的原子，发现了元素周期表，并成功地预言了许多当时未知的元素。后来，卢瑟福证明了原子是由电子和原子核组成

的，又过了二十五年，有关原子结合的动力学也搞清楚了。

“不久，人们认识到，不同的元素有不同的原子核。实际上，就是相同的元素，它们的原子核的质量和放射性也还可稍不相同。原子量和原子序数的有规律的行为导致了一个过于简单的理论，就是所有原子核都是由质子和电子组成的。只是随着中子的发现和同位素的引入，一个恰当的原子核结构的图像才出现了。

“很快，又发现了上百种的强子，它们和质子及中子一样，同样可称为是基本的，而‘八重法’的近似有效则提供了强子有结构的线索。我们被引导到带色的夸克和量子色动力学，把它们作为强子结构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所剩下的真正的基本粒子的候选者只有夸克和轻子了。但是，实验已经揭示存在五种不同夸克和五种不同的轻子，或许将来还会发现更多。我们究竟还要找到多少种夸克和轻子，才能看到有规律性存在的信号，才能察觉还没有想到的更深结构的线索呢？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统一。”

这个建议并不是对粒子命名的一个具体建议，这个建议表示了一个科学家对一个哲学家的深刻见解的敬意。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作为革命领导人和国家建设的领导人，毛泽东也多次强调过自然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过为了建设必须学习自然科学。

一九四〇年在革命根据地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是发起人之一，在成立会上发表了讲话。“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些名言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提出来的。一九四二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本书中，毛泽东把聚集在边区的科学技术人员，称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里面就包含要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毛泽东一再号召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④强调学习苏联，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照搬苏联经验，有严重的消极方面。但是，把学习科学技术的任务同学习马列理论的任务相并列，反映了形势的发展和认识的前进，是有重大积极意义的。

一九五五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他说：“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后，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一九五六年党中央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重要论点：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胡耀邦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讲话中，特别引用了毛泽东这个论点。

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要求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并且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他关心和支持中国“两弹一星”的研究，关心和支持中国石油的勘探，关心和支持中医药宝库的发掘，用诗意的浪漫，想象着纸船明烛送瘟神，巫山高峡出平湖……

他也深感自己需要学习发展生产力的自然科学知识。一九六二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

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聂荣臻等同志向毛泽东汇报新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两段极重要的话：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

历数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解放后强调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的时候，都是他把注意力比较地着重放在经济建设上的时候。如果一直按这样的指导思想贯彻执行，我国经济发展和科学发展当会另有一番气象。可惜的是毛泽东未能贯彻始终地坚持这些正确思想。相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却反而越来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在大抓所谓阶级斗争的时候，这些重视自然科学的思想就被冲淡了，搁置了。这种情况虽有起伏，总的趋势是越演越烈，直至演变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建设，也严重地损害了科学发展。这是历史的悲剧。现在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而也就把科学发展摆到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来。只有在这时，毛泽东重视自然科学的那些正确思想，才能恢复它的原貌并获得新的发展。

附记

为了说明毛泽东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思想。在这里还想说几句。一九六五年讨论坂田文章的时候，我写了一篇《谈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说了这样的意见：

“《庄子·天下篇》记载的‘辩者’关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是以朴素的形式，从量这一个侧面，说出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个光辉的思想。但是，如果不限于抽象的量的侧面的考察，而深入到具体的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那么，这个说法就不能充分说明‘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了。

“‘半’，是个量的概念，‘一’分为两‘半’，事物在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量上小了一半。“量的分割，到一定的阶段，引起质的变化。“且不说棰失去一定的长度，就丧失了棰之为棰的性质。当物质的分割达到分子时，就到了一个质的关节点。进一步‘分’，就使分子分解为组成它的各种原子。原子不是半个分子，而是同分子在质上不同的东西。“原子进一步‘分’，就分解为电子和原子核。电子和原子核都不是半个原子，而是同原子在质上不同的东西。

“如此类推。

“物质的无限可分，并不是无限地、单调地重复某种特定的‘分’的形式。

“在物质分割的每一个新的关节点上，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去探究前所未知的‘分’的新性质、新形式、新规律，使自然科学不断地有新的发展，这正是唯物辩证法所要求于自然科学家的。唯物辩证法根本不容许把某种已知的刻板的公式，强加于自然界、强加于自然科学。

“研究原子的‘分’的新性质、新形式、新规律，使经典物理学发展到量子物理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

“‘基本’粒子的‘分’，虽然现代物理学还没有把它研究得很清楚，无疑却预示着将会出现崭新的性质、形式和规律，研究它们，将会把物理学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现在有些同志怀疑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以为无限可分说的是同样的“分”的形式的无限重复。现在，对“夸克”的研究的发展，提出了“夸克幽闭”的假说，按照这种假说，单个的自由的“夸克”不可能从幽闭它的空间中释放出来。有些同志据此认为，这就是“物质可分”的极限。在我看来，第一，幽闭说还只是假说；第二，这个假说的提出本身，即已显示出在这个关节点上的“分”，具有全新的、为过去所不

了解的性质和形式。这正好说明了物质的不可穷尽性和深远的无限性。

毛泽东与逻辑学(高路)

阅读逻辑学书，关心有关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这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侧面。

逻辑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世界上第一部逻辑学著作便是用《工具论》来命名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方法、工具的掌握和运用。他重视哲学，爱读逻辑学书，提倡学习逻辑知识，也是出于对“工具”的考察和获取的愿望。

在逻辑学领域，毛泽东求贤问业，切磋琢磨，钩深致远，还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伦理学、论理学与《穆勒名学》

说到毛泽东早年读逻辑学书的情况，最值得一说的首先是关于读《穆勒名学》的事了。

一九一二年、青年毛泽东利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读了很多书。据斯诺《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时他读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a book on ethics by John Stuart Mill）。这本书很可能是《穆勒名学》的误记。

误记出在伦理学与论理学之间。伦理学是关于人类社会道德现象的科学，也称道德哲学。毛泽东早年读过泡尔生的伦理学书，还作了很多批注。论理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学，它是关于思维（及其表达）形式的规则的科学。当时的学术界，把这门科学称为论理学，把形式逻辑称为“形式论理学”。

西方的逻辑学传入中国后，对于Logic这个术语，曾有过多种译法。最初是参照中国古代的名家和名辨思潮，译作名学、辨学，《名理探》、《穆勒名学》便属此类。“论理学”是日本人的译法。中国学术界借鉴了这个译法。三十年代初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大都采用这个译法。那时也有译为“理则学”的，孙中山就十分推崇这个译法。①（①孙中山：“凡以论理学、辨学、名学而译逻辑者，皆如华侨之称西班牙为吕宋也。……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0页））以上都属于意译。直接音译为“逻辑”，是章士钊首倡。②（②在梁启超办的《国风报》第29期上，章士钊署名民质发表了《论翻译名义》一文，第一次倡议将英文的“Logic”直译为“逻辑”。）

但是，到三十年代，学术界还未普遍采用。斯诺记录那次谈话所使用的是英语。在英语中，伦理学（ethics）与论理学（Logic）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对中国人来说，则只有一字在发音上有平仄的差别。听者辨音不准，就可能造成误译。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今译弥尔、密尔），史称小穆勒。他确有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小穆勒在其父老穆勒即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精心培养下，一生涉猎的学术领域较广，著述甚丰。他不仅是古典归纳逻辑的集大成者，还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但是，在毛泽东所说的时间（一九一二年）以前，穆勒著作的中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穆勒名学》（原名为“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直译应为《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最先由金陵金粟斋一九〇五年出木刻本；另一种是《群己权界论》（原名为“On Liberty”，今译为《论自由》），这是一部社会政治方面的书，最先是由商务印书馆一九〇三年出版。这两部书均为严复所译，在辛亥革命前后流传颇广，影响也很大，它们都可能被毛泽东读到。

也许是由于与我们同样的判断，有的译者把斯诺《西行漫记》中那句话，已经订正为《穆勒名学》了。

①（①见亦愚译，急流出版社1949年版的本子，第95页；香港现代出版公司印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123页。）

在辛亥革命前后，逻辑学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严复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这两部书当时很负盛名，可是能读的人并不多”。十九岁的毛泽东读了《穆勒名学》，增长了逻辑知识，掌握了思维的逻辑技术，也形成了时刻检查自己思维和表达的逻辑性的良好习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瓚写信，谈论四种常见的“论理的错误”，包括以感情论事，时间上以偏概全，空间上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他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虽然他说的四种错误并不都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逻辑错误，但这反映了他注意从逻辑学的角度辨别正误，反思、发现自己的不足。

三十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

延安时期，毛泽东“发愤读书”，读得最多的要数哲学书了。当时他精读并作了大量批注的主要是三十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也没摆脱苏联学者的影响）。一九三〇年苏联哲学界开展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出版的哲学著作，都是把形式论理学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否定的。直到一九四〇年为止，这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读到的哲学教科书，都专设章节批评形式论理学尤其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毛泽东无形中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

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过多次，在上面的批注也最多。该书在谈到否定观时有这么典型的一段话：“辩证法的否定，和形式的，形而上学的论理学的否定，在哪一点上不同呢？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这里存在着一个未加任何论证的等式：形式的论理学=形而上学的论理学=形而上学。通过一个算术中的“等量代换”，结果一切本应对形而上学说的话全都转给形式论理学了。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用毛笔写了一段批注：“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这些话若作为批评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是十分中肯的，但对于形式逻辑来说，就不合适了。

在毛泽东于一九三七年七、八月份写的《矛盾论》中，原来有一节讨论“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其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解放后着手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写信给田家英等人，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后来《矛盾论》正式发表时，论形式逻辑的那一节全部删去了。

《矛盾论》发表时所作的“删节”，表明毛泽东的认识前进了。人类对形式逻辑性质、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深化、发展的过程。三十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引起的对形式逻辑的误解，则是人类这个总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是一个必经的阶段。^①毛泽东个人恰好经历了这个认识阶段。

（^①亚里士多德创立形式逻辑这门科学时不自觉地混进了对思维内容的探讨。他“预设”了主词存在，因而在叙述中往往把主词与它所指代的事物混淆在一起。经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歪曲利用，越来越多地把对思维内容的研究扯了进来。这种形式逻辑，与黑格尔开始的赋予思维方式含意的“形而上学”，确实不容易区分得很清楚。正是在对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及辩证法之间关系的认识的推动下，对形式逻辑的性质、对象的认识才逐步明确起来。在与形而上学的比较和区别中，形式逻辑安分于“形式”了。

在古希腊文中，“辩证法”（指相互争辩诘难的方法）一词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而“逻辑”一词来源于“逻各斯”，它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作为客观事物规律的辩证法倒是同一个意思。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辩证法著作命名为《逻辑学》，可能取此意。有些现代逻辑学家（如罗素）批评黑格尔搅乱了逻辑学，但他们自己却没弄清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的认识发生变化，可能与苏联学术界一九五〇年开始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有关。从他读书接受观念来看，时间也许还早些。这要追溯到一九三八年他读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了。

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

写作《矛盾论》之后半年，一九三八年春天，毛泽东读了刚出版的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学》。

那时，毛泽东刚读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三月二十四日，《战争论》读到第一百一十一页。他在三月二十五日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毛泽东为了读刚收到的潘著《逻辑与逻辑学》，放下原来正在读的书，这说明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似乎不亚于对战争理论的兴趣。一天读九十三页书，打破了他这一段时间读书进度的记录。按照他的“读书日记”的记载，这前后的几个月中，他每天读书的数量一般是二十至三十页，最多的一天也只读了五十五页。

接下去，毛泽东只用三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学术著作。^①

^①在毛泽东的“读书日记”中，3月26日记：“潘书，P.94—174”。27日记：“P.175—204，完。”28日记：“《战

争论》P.112—122”。

《逻辑与逻辑学》不像哲学教科书那样只附带地谈一下逻辑的性质，而是一本成体系的逻辑学书。毛泽东说它“颇为新鲜”，大概是指它把逻辑学分为方法和技术两个部分。该书的篇章结构基本上也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两部分。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方法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思维历程。形式逻辑被当作逻辑术，技术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为观察法、统计法、推演法。

潘书关于方法和技术的区分，在观念上有了新的转机。形式逻辑虽然“从方法的地位降而为技术”，只是“充当一名技师”的角色，但它毕竟有了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虽然潘书在对形式逻辑性质的叙述中还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之处，②但它把逻辑区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的观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它那自相矛盾的体系也集中暴露出了当时把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错误。后来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嘱咐重印逻辑专著，潘书也被作为“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著作”收入《逻辑丛刊》，于一九六一年重印。这个重印本，毛泽东一直保存着，现在我们在毛泽东故居的卧室中还可以看到它。

②按照潘书的观点，形式逻辑只配充当思维技术的角色，不够充当思维方法的资格，不属于思维方法，而辩证法、形而上学才是思维方法。那么应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形式逻辑既不是辩证法，也不是形而上学。按照这个结论，就应该纠正当时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现象。可是潘书却没有作出这样的推论。它时而说形式逻辑涉及的“只是思维形式”，不涉及思维的内容；时而又批评“形式逻辑是把一切自然都当作静止的东西来观察，只去认识它的形状（Being），不知道它有‘行为’（Doing）”，把事物“看作各自独立的东西”，看作“一成不变的固定形态”（《逻辑与逻辑学》，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0—21页）。

“颇为新鲜”这个感受，是毛泽东对潘书的褒奖，也反映出毛泽东的思想倾向性。如果说爱森堡、李达等人当时把形式论理学混同于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抛弃形式逻辑的话，那么潘书试图在方法和技术这两个名义下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则是树立起了逻辑学的权威。这个新见解是潘梓年独立思考的成果，用他本人的话说，“是敢想敢说的成果”。它在中国近现代逻辑学史上，起过承前启后的作用。

周谷城、王方名的文章

建国初期，我国大学中使用的逻辑学教科书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这时在苏联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逻辑观点又支配了我国的学术界。

自从一九四〇年斯大林提倡干部学习形式逻辑，苏联的逻辑学领域开始复苏了，各种观点竞相著书立说。直到一九五〇年以前，占优势的仍旧是三十年代哲学教科书观点的延续，即认为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有阶级性、有党性，因而否认形式逻辑，只承认辩证逻辑。一九五〇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逻辑学界也展开了讨论。由于上述观点与斯大林批评的马尔的语言学说相类似，在这次讨论中处于被批评的地位，在《哲学问题》杂志关于逻辑问题讨论的“总结”中，甚至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斥为“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者”。继之而起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承认形式逻辑，但认为它与辩证逻辑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其代表性教科书，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很快被译成中文，成为流行的教科书。

毛泽东读了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一书，不同意它对形式逻辑地位的看法。毛泽东有个特点，在他自认为不懂或不甚懂的科学领域，格外谨慎。对于逻辑学，直到后来他读了很多专著、论文，已形成了自己一套逻辑观之时，仍旧很谦虚，自称“无多研究”，还“不敢有所论列”①。因而，在一九五六年以前，他对《逻辑》一书为代表的逻辑观没有随便品评。

一九五六年，《新建设》二月号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该文提出了新的见解：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这种“主从”说，对于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是一种挑战。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中国五十年代那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就以对周谷城的这个观点的不同看法之间切磋的形式拉开了序幕。周谷城的文章一登出，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开会。当谈到批评要有说服力时，毛泽东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

毛泽东的赞许态度，对周谷城本人也流露过。当时参加讨论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和周谷城“商榷”的。毛泽东鼓励周谷城，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辩论。他们之间还有下面这么一段有趣的对话：

周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告诉他：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好。

毛泽东说：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

周说：我没看见。

毛泽东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这次谈话的地点在上海。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叫人给周谷城寄去了几本刊物，有关地方还折角作出记号。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毛泽东接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在谈到哲学界正在讨论的形式逻辑问题时，毛泽东说，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还说：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

上面提到的毛泽东和周谷城在上海的谈话，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以前。在这之前，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上与周的观点相似的文章共三篇，分别登在当年的第一、二、四期上，均署名“求实”。这三篇文章，对三个流行的逻辑观点提出质疑。第一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是“初步规律”的说的质疑。第二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是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质的规定性的说的质疑。第三篇是对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方面的质疑。毛泽东对这三篇文章相当欣赏。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王方名都在场，此外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人。这次聚会在周谷城和王方名之间，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毛泽东从中撮合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作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次谈话，除了论及各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在当时学术界的气氛中，毛泽东强调这一点，有特别的意义。它包含着对周、王二人勇于探索的理论勇气的鼓励，也包含着对逻辑学界的期望。当时周谷城的逻辑观点在讨论中的处境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很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当然，赞成他的主要观点的逻辑学专家是有人在的，不过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讨论。坚持“高低级”之说、并在讨论中批评周谷城的“主从”说的作者们，主要是靠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结论，具体说是引恩格斯的一个比喻。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使用“固定不变的范畴”比喻为“就好像是逻辑的初等数学”。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又说：“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

比喻对于帮助理解是有益的。但比喻只具有某种相似性，它毕竟不能算作精确的论证。逻辑学毕竟不是数学。严格说起来，它们研究的对象之间是不可比的，这属于另外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周谷城来说，面临着这样一个更高层次的严肃的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持什么态度？何止语言有层次性^③，科学理论也有层次性。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就会联结起来。知识是一个系统，它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可以互相转化的。这也是一个辩证法。

毛泽东是富有洞察力的。他准确地把握住了争论的焦点。他强调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正是从科学态度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指出方向。这样，他既从根本上指出了学术讨论应该坚持的原则性的立场。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倾向，也起到了保护学术讨论中占少数却比较正确的一方。这是哲人的智慧，政治家的艺术。

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问题还在争论之中”，出于对学术讨论自由的维护，对专家学者的尊重。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避讳什么教条。在私下里，他就和周谷城说过。他夹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mal 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杭州，毛泽东更明确地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他还举例说明，各个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管前提的思想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

在五十年代后期的逻辑学讨论中

毛泽东关于形式逻辑性质的正确见解，来源于认真地读书（逻辑学书籍和论文）和思考。在逻辑学讨论中，他始终密切注意各种观点的文章，跟踪阅读，广收博览。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给机要秘书高智写了一封信：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1956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1957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到）找来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新建设》1956年全年各期，1957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据高智回忆，毛泽东当时是在研究形式逻辑。“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分别指《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刊登的马特《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六月十四日刊登的周谷城《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马特的文章是对讨论情况的综述，但带有倾向性，而且把争论看作“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批评周谷城、王方名的观点“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附带说一句，在那次讨论中，马特是坚持斯特罗果维契观点的主要代表。周谷城的《六论》与马特的文章是针锋相对的。

周谷城的文章刚登出，毛泽东就请周谷城从上海到北京中南海来共同讨论逻辑问题。六月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专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讨论移到《人民日报》上展开这个新情况十分关注。他认真读了这两篇文章，并把这两天的报纸收藏起来，留待仔细研究。

毛泽东借《新建设》和《哲学研究》，显然也是查阅有关逻辑学方面的文章。有关逻辑问题的讨论最初是在《新建设》上展开的。毛泽东要该刊一九五六年第一期，可能是想了解讨论开始前的情况。在他这张条上开列的刊物中，关于逻辑的文章，《新建设》上有十五篇，《哲学研究》上有两篇。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在毛泽东开列的一张索书条上，要该年“一至六月的《哲学研究》”，可能是继续查有关逻辑学的文章。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向其他同志推荐《哲学研究》一九五九年第一期和第十二期，一九六〇年第一期和第三期。毛泽东还建议政治局委员人人都订一份《哲学研究》。当然，这一时期，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的讨论、感兴趣的主要是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文章。这期间的《哲学研究》上面有关讨论逻辑问题的文章，可能他也都看到了。

在这次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邀集有关人士谈逻辑问题。前面已经分别提到，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以前在上海和周谷城谈过一次，同年四月十一日和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等谈过一次，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晚上和周谷城又谈一次。除了这些之外，毛泽东还多次召集理论界的有关人员聚谈当时讨论中提出的逻辑问题。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聚谈过一次逻辑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毛泽东还举了很多例子进行说明）；一是形式逻辑是普遍适用的，没有阶级性。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再一次聚谈逻辑问题。参加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周谷城。从下午五时四十五分一直谈到晚上十一点半。

此后的几年中，毛泽东一直关注着逻辑学研究的进展。

朱波的两篇文章

一九六五年十月八日上午，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光明日报》今天有篇文章，谈逻辑的。他指的是朱波的《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一文。该文既不同意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客观事物规律等同起来，又不同意把它与客观事物完全割裂开来，而认为它反映的是思维的确定性，它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确定性。这种观点是动脑筋思考了的，比那些把形式逻辑“规律”等同于事物规律的庸俗化做法前进了一步。这个问题到今天也并非都弄清楚了。问题就出在这“规律”二字上面。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等，是对思维活动及其表达形式的规范、戒律，并不是思维本身具有的内在必然规律。若思维自然而然便如此，学逻辑知识就成了多此一举。事实上恰好相反，人们的思维只有经过训练才能达到逻辑上的自觉。在日常思维活动中，违反逻辑的现象屡见不鲜，怎么能说是“规律”呢？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和道德一样，是一门规范的科学；它是人类自觉、文明的象征，是思维对思维本身的规范，因而是人类思维本身反思的产物。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刊登了《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署名邵友勋，其实还是朱波所写。该文提出，充足理由律能否作为形式逻辑的一个规律，要看对它如何理解：要求推理前提真实可靠这样意义上的充足理由是不存在的，要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具有连贯性、论证性（前提与结论之间有逻辑联系、前提是推出结论的理由）这样意义上的充足律是有的，它属于形式逻辑的一个要求，也与形式逻辑一样，没有阶级性。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杭州的那次谈话中，当有人提到朱波这篇文章时，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毛泽东这里说的“理由”，即推理的前提、论证的论据。人们常说的充足理由律是相对于推论和证明而言的，它包括两方面的要求：（1）理由（即前提、论据）的内容真实；（2）理由能必然地推导出结论，换句话说，推论的形式正确。①（①对这一条逻辑要求的表述，各书还有些细微的差别。）一个推论或论证的真实正确要靠这两条共同做保证。由于形式逻辑是撇开内容，仅从形式方面来研究推理论证的，而真实与否是认识的内容问题，涉及到作为前提的命题的思想内容，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否认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是完全正确的。①（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至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坚持认为要保留充足理由律的看法，是一家之见。现在，逻辑学界比较多的人不赞成这种见解。）至于把“充足理由律”仅限制在形式方面。仅理解为结论必须在形式上逻辑地包含于前提之中。能否继续保留在形式逻辑之中呢？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②

（②在现代符号逻辑（亦称“数理逻辑”）中，推理是一个公式，正确的推理是形式上常“真”的公式（叫“重言式”），其前提（前件）和结论（后件）之间是一种包含关系。这种逻辑上或形式上的“真”，即指结论的外延包含于前提的外延之中，前提是推导出结论的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即充足理由。朱波的文章把原来“充足理由律”的两条要求分解开，实际上是区分（内容上）真实性与（形式上）正确性的思想的应用。形式逻辑要求推理和证明在形式上正确，即具有形式上的“真”。若把“充足理由律”作这种理解，当然是可以承认的，也是必须承认的。因为逻辑只管也要管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但是，“充足理由律”毕竟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术语，重新作约定，新酒装进旧瓶，另一派还在原来的含意上使用着这个术语，不免发生混乱。更何况现在已有了“有效性”、“重言式”等更为精确的术语了呢？）

毛泽东那段话是否有认识论上的含意，即他是否也否认理由在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上有一致的标准呢？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是持否定观点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与本文主旨无关，不再详细分析。这里只从原则上指出，要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毛泽东否认的是价值判断中存在各个阶级共同的充足理由。如果误以为对于事实判断各个阶级也有权自立标准，各行其是，那么在理论上势必导致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

《逻辑学论文集》与《逻辑丛刊》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信中谈到：“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提议编印逻辑论文集和专著，并不是在这封信中才提出的。根据章士钊一九五九年五月为重版《逻辑指要》所写的序言来推断，早在五月份以前已分别着手做这两件事了。章士钊在这份后来未用的序言（手稿）中说，“近日”中央政治研究室逻辑组和人民出版社哲学组的同志为重印《逻辑指要》的事宜“见访，并提示校勘质疑若干条，知两君已于鄙著浏览有素……自后，余自行拎阅一遍，稍有增改”。五月份章士钊已把《逻辑指要》全书校改完毕。逻辑学文章篇目的“搜编”自当也已基本完成，送毛泽东阅览。当时这两件事是由两个单位分工做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分工负责收集、编辑逻辑学论文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工负责挑选、编辑逻辑学“专著”。姜椿芳当时任编译局副局长，编辑逻辑学论文集的工作即由他负责，“书目搜编”可能指的就是搜集编印的论文篇目。

毛泽东说逻辑学论文篇目的“搜编也是用了功的”，大概指其搜集的篇目数量上齐全，编排上既照顾到了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又照顾到专题性。在此之前，《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过一本《逻辑问题讨论集》，于一九五九年四月出版发行。但这个集子“并不是把所有的逻辑文章都选入”，甚至有些争论中的文章“也未收入”。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学研究的全貌、争论的背景，只读这个“讨论集”是不够的，因而需要另编一套“论文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收入了一九五三年以后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共一百五十篇，分为六集。其中第三、第四集是两个专集。第三集收入的主要是苏联译文，第四集收入的主要是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这套论文集一九五九年八月印出，可惜始终未公开出版。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担负起了挑选“专著”的任务。他们编的一套《逻辑丛刊》，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套书共十一本，分别是《逻辑与逻辑学》（潘梓年著）、《逻辑》（金岳霖著）、《逻辑指要》（章士钊著）、《新论理学》（张子和著）、《名学纲要》（屠孝实著）、《名理探》（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穆勒名学》（穆勒原著，严复译述）、《名学浅说》（耶方斯著，严复译）、《辨学》（耶方斯著，王国维译）、《论理学纲要》（十时弥著，田吴炤译）、《逻辑史选译》（齐亨等著，王宪钧等译）。①（①这十一本“专著”是从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逻辑书中挑选出来的，它们都是较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影响较大的。）毛泽东一直把这套重刊的逻辑书保存在身边。

毛泽东不满足于看逻辑学论文，他还希望系统地看全部“专著”；他不满足于只了解“近几年”的讨论情况和各种见解，还希望了解中国“近数十年”的研究概况、认识的历史发展；他不仅对西方的逻辑感兴趣，也想对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有更多地了解。一九五八年他就和周谷城说到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最好把古今所有的逻辑书都搜集起来，印成一部丛书，还在前面写几句话，作为按语。为“写几句话”的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收入了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周谷城的一封信。信中说：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

周谷城在逻辑学方面的“大著”是论文集。一本是以周谷城的逻辑学论文为主体的论文集《形式逻辑与辩证

法问题》。它以周谷城一九五六年那篇文章为开卷篇，一批一驳，依次展开，共二十篇论文，其中周谷城的占十篇。另一本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收的全是周谷城个人的逻辑论文。“大著”指的是哪一本并不重要，“作序”一事多少有点误会。从周谷城方面说，既然毛泽东说要印逻辑丛书，这本论文集是否在列，他是不清楚的；毛泽东又说过在前面写几句话，周谷城以为毛泽东愿意写几句话。从毛泽东方面说，要他“作序的事”是就某本具体的“大著”而言的。他不愿作序，显然是为了维护逻辑界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维持逻辑学界“百家争鸣”的局面。

读报刊杂志上的论文，便于及时了解学科研究的前沿和最新成果。但对于系统地研究来说，查借不方便，随手翻阅也很麻烦。毛泽东组织人汇集专题文献，为逻辑学研究做了一项基础工作。

章士钊《逻辑指要》及重版序言

《逻辑丛刊》收入的十一本逻辑专著，现已确知其中有三本为毛泽东读过。前面谈到的《穆勒名学》和《逻辑与逻辑学》是解放前读的，第三本即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是解放后读的。在收入《逻辑丛刊》之前，毛泽东读了它的初版本。

据章士钊为此书所写（未用）的那个序说：“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蹶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越三月，公见召，以原书确于案。”毛泽东“慨然相谓曰：吾于此书已一字不遗者××阅一通。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夥矣，然大抵从西籍译得，不足称为专著，独子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吾意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这也是《逻辑指要》得以选入《逻辑丛刊》的原因之一。

《逻辑指要》的初版本，是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出的。其中有一篇自序说：“今岁二月，吾为国民参政会事，于役重庆，议长蒋公以精神之学教天下，审国人用智浮泛不切，欲得逻辑以药之，而求其人于吾友张君劢，君劢不审吾学之无似，为之游扬。公遂虚衷自牧，不耻下问，并督为讲录，俾便览观。……于返港之明日，伸纸吮笔，纵其所之。”毛泽东既然知道章士钊的著述，这些情况也不会一无所知。“学问之事，庸何伤！”表明在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只能历史地去看待。人民需要继承、吸收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成果。章士钊在逻辑学中有独到之处的。他早于一九一八年就在北京大学讲授过逻辑学，影响很大，曾先后几易大教室仍坐无隙地，一时传为佳话。《逻辑指要》即根据这些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的。该书“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虽然对有些史料的分析不乏牵强之处，但它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了一个真理，即“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他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谬论，在中国近代逻辑学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

毛泽东对《逻辑指要》的评价是中肯的。“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这是难得的褒奖。《逻辑指要》的价值，与其说在逻辑理论的创新方面，不如说在中国逻辑研究的开拓方面。当然，草创也难免于粗糙，空前的东西并不绝后。章士钊后来曾说它“是一部逻辑发展史匆遽而紊乱的速写”。“花香不在多”。就这些已足够“宜于印行”，“为今日参考资料”。

毛泽东十分关心章士钊《逻辑指要》的重版事宜。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接着附上了为其代拟的一篇“说明”。当时毛泽东正在感冒病中。信中说：“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

从毛泽东代拟的“说明”来看，章士钊在六日的信中较详细地谈了自己修改《逻辑指要》的情况。毛泽东代拟的“说明”，从文体上来说，是一篇十分精彩的“重版序言”。它既谈了重印旧作的由头、修改情况，又联系到当时学术界的背景，谈了对旧作的态度。总共不过二百四、五十字，容纳了这么多的信息，字字着意，句句含理。

过了一周，六月十四日，章士钊重新写出了“重印说明”。除前面加了一段有关该书写作经过和一些自我评价性的话外，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说明”的内容，有很多还是原话照抄上的。一九六一年正式刊印的《逻辑指要》，采用的即是这份“说明”。

毛泽东到了晚年，读逻辑书的兴趣仍旧很浓。他让有关方面把有的逻辑学书印成大字本来读。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一本《近代逻辑史》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此书印成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

《近代逻辑史》是苏联巴·谢·波波夫所著，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中译本。它正好满足了毛泽东希望了解西方逻辑学史的愿望。顺便说一句，《逻辑丛刊》重印了解放前出版的较为有影响的逻辑学专著，至于解放后出版的各种逻辑学书，毛泽东几乎搜集全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石仲泉)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潮流涌向全国。这两个运动掀起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纠正错误认识，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他在十一月九日发出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会议期间，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材料。毛泽东提议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十二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②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十九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七月二日，他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毛泽东的这番考虑是好的，可是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同志开展的错误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反右倾”高潮过去后，一九五九年冬，党中央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这年十一月初，刘少奇到海南岛，和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了学习这本书的读书小组，还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参加。

一九六〇年一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且肯定了读书小组的办法。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一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二月、三月、四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作。

二月中旬，周恩来来到广东从化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用了三个星期，将社会主义部分通读了一遍。

在刘少奇读书之后和周恩来读书之前，毛泽东本人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组织了

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①过去人们以为毛泽东有个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其实毛泽东本人没有写读书笔记。只是在边读边议时，他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谈话记录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作了归纳，加了小标题。这个本子在周恩来读书小组内作过宣讲，流传较广。后者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章节顺序，按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

①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林克，也参加了这一读书活动。根据林克日记所载，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在杭州开始读这本书，时间安排在每天下午，进度是每天边读边议十页左右，少则五页，多则十九页，除星期天休息外从未间断。到二月五日至九日，在广州读完了全书。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意见（以下有的简称“谈话”），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其中既有大量重要的经验，也含有在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误。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现在把毛泽东发表的一些重要意见介绍如下。

对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新认识

建国以后，党中央很注重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都对我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做过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有的简称“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主要有：

关于反对官僚资本

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到一九四九年底，我国基本上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怎样认识消灭官僚资本的性质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党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就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指出，没收官僚资本，“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括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还指出：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关于土改与合作化

我们党的土改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对于富农。在老解放区是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在新解放区土改时曾改为中立富农的政策，即要保存富农经济。但由于旧中国的富农经济不发达，其人数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耕地约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在《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不受侵犯的同时，仍规定了对少数出租大量土地的富农，应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再加上土改刚结束就逐步发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这样，富农经济实际上受到了很大削弱。到一九五四年，富农户数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一，在老解放区则不足百分之一。刘少奇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富农出租的那一部分土地已被分配”，富农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比一般农民占有的土地只多一倍，“富农经济已大大地受了限制”。①基于富农经济的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时多次指出：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是毛泽东对建国以后土改运动的新认识。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过程。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都只一般地指出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特点。在读“教科书”的谈话时，毛泽东对这些生产组织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个体经济上的集体

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对资产阶级采用定息办法实行赎买，是我们党创造的成功经验。怎样认识实行定息以后的企业的性质？一个时期内，在理论界有些不同看法。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他认为，一方面，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而言，一般说来，这是只剩下一个形式、一个外壳，因为资方在企业里虽有一定职务，实际上没有决定权；另一方面，就国家每年还用一亿二千万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赎买这个阶级而言，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这样的认识避免了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完全混同，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改造。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认为，不应当低估我国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尽管我国是个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落后国家，但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的意义却不限于我国。他说：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是不恰当的。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垄断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家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又说：拿我们有些省份的人口和土地来同欧洲有些国家相比，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末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毛泽东提出这个观点，并非要宣扬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因为他一贯强调马列主义应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外国朋友照搬中国经验。

思索建设道路，提出四化思想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关于读书的建议信中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他本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贯彻了这个精神。

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怎样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党没有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办法。苏联经验，有许多是适用的，也有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一五”后期，苏联经验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从一九五五年底起，我们党的领导人就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初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得那样兴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一年“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回顾这段历史过程指出：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全国解放后的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找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但没有提其他的具体措施。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正式通过总路线，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在这里，尽管毛泽东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为完全正确的探索成果加以肯定，而实践证明它在许多方面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认识党的领导人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巨大努力。

在“谈话”中，毛泽东继续对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进行思索，阐述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关于工农业并举的思想

这是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重新强调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过去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业，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农、轻、重”问题。在“谈话”中，毛泽东针对“农、轻、重”提出后的一些糊涂观点，具体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说：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

为最重要。在安排计划的时候，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这样，毛泽东就比较全面地说明了这个方针。

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思想。

一九五八年“共产风”刮起后，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左”倾观点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在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起不起作用的问题上发生了疑问。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和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内起作用而不在生产领域内起作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武昌会议期间，他看到中宣部内部刊物上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重要修改的材料上说，新版教科书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单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他赞同这个修改。新版“教科书”还认为价值规律既在流通领域、也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毛泽东也赞同这一修改，并在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的一个批示中，提出了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观点。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上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对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早在一九四五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已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曾多次提及现代化问题。一九五四年九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①这可以说是对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表述，它主要体现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用“现代科学文化”代替“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体现了一个好的思想，即后者可以包括在“现代工业”之中，而新加的“现代科学文化”，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体现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现代化的国防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的这个提法，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我们目前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思想。^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后来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们国家在本世纪的奋斗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也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任务。

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毛泽东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试验”，虽然发生了严重失误，但是在领导全党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他却认真地思索和研究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以下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从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出发，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与列宁相同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能分为两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分阶段的构想，目前已为理论界广泛承认。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继续发挥了这个思想，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加以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因此，他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

毛泽东还分析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情况。他说：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就所有制而言，在发生变革后的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变的，而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则总是不断改进的。“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关于按需分配的情况，他认为这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否正确，可让历史去检验。但是这些想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一些构想一样，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还是有价值的。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问题。

这也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早在一九五六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和《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接触了这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明确指出，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其次，他根据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很多发展阶段的思想，继《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谈到这个问题之后，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变化也是社会革命。他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里讲的“革命”的含义是明确的，与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两回事。

从经济学谈到哲学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早出版于一九五四年。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针对这本书的未定稿而发表的意见。因此，这本书的主要骨架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早定下来了。毛泽东对这本书很不满意，但并未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书中有许多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管有多少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

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辩证法。他说：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他还具体分析这本书缺少辩证法的表现，认为它不从分析矛盾出发，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是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不仅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评，对于理论研究工作也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在读这本“教科书”时，既然从哲学角度加以评论，也谈及了不少哲学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继续得到了发挥。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这一观点，他提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鉴于苏联“教科书”的弊病提出的。这不仅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比较好的方法，也把对基本矛盾问题本身的认识深化了。

关于认识过程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中阐述过认识的过程问题。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比较多地论及了这个问题。他倡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原本是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但是，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缺点错误的暴露，他感到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并非易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中的错误，使他对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有较深的感受。因此，在这里，他从谈建国以来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体会的角度，就认识过程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他还特别强调，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他随后写的《十年总结》和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代

会的讲话中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就是这些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关于部分质变论。

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这个思想不是毛泽东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①，但是他很早就把这个思想运用于革命实践。一九五八年初，他把“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部分的质变”的思想，作为工作方法提出来。包含了他对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这次读“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从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方面，说明了这个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普遍性原理。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①三十年代初，苏联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已提出了“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的思想。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读这本书的中译本第三版时，在这些处作了批注。指出：“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的变化就是飞跃”。“一切客观过程都如此”，“这一认识却要紧”。李达在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论述了“部分的质的飞跃”的思想。毛泽东读李达这本书时，注意到了这些思想，在这些处划了杠杠、圈圈，但无批注文字。艾思奇在1939年编的《哲学选辑》的附录《研究提纲》中，明确地使用了“部分的质变”概念。毛泽东当年读过这本书，但在这些处既没划道道，也无批注文字。）

为了具体说明这个思想，毛泽东举了好多例子加以论证。在自然界方面，他举蚕为例，认为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过程可看作四个阶段，它的变化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都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拿人本身来说，毛泽东认为人从生到死。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在死之前，既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这几个明显的生长阶段，就是部分质变。人死是最后的质变，这个质变就是通过以往的不断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还举合作化为例，认为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

毛泽东分析这些例子后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在社会领域，还有个主观能动性问题的。如果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会很快来到。

毛泽东对部分质变论的这些阐述，使这个在哲学界沉寂了二十多年的问题，自此以后获得了新生。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哲学家们广泛地承认了这个思想，许多哲学教科书都以专节论述这个思想。这是毛泽东对这个理论的重大贡献。

正确地对待毛泽东的“左”倾观点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工作指导方针的“左”的倾向在不断发展。在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〇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的谈话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左”的观点。例如，政治方面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庐山会议是两个阶级的较量；“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具有客观必然性，等等。这些问题已有历史结论，不必赘述。在这里，着重指出以下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些“左”倾观点。

关于“穷是动力”的问题。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我们国家一为“穷”，二为“白”，“穷就要革命”这样的话。这是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的。“大跃进”以后，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被引向极端，变成了“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以为农民会富得很快，当收入超过工人后，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就很困难，因而，主张人民公社“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广大农民并不富，不存在农民收入会很快超过工人的趋势。有的地区宣传二年、四年过渡是刮的浮夸风。从理论上说，趁穷之势过渡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仍然是否认差别，怕富了不革命，因而想让穷队、穷社去共富队、富社的产，尽管当时在大力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读“教科书”时，一方面提出要划清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这种观点。这也说明了那时对“左”的错误的纠正，不是在指导思想上的根本纠正。当时，外国评论认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说：“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后来讲的“富变修”，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变富、人民致富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这种错误，才产生了我们

党的富民政策。

关于价值规律与计划需要的关系问题。

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一方面比斯大林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另一方面仍不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把它和计划需要加以割裂和对立。例如，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外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为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发的，并把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斗争从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解释。它反映了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大跃进”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已由历史作了结论。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花了几十亿元，动员几千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恶果，在随后的困难时期显露出来了。这一事实正好说明，经济工作不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不能不受历史的惩罚。多少年来，在这样错误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

关于物质鼓励问题。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据列宁讲的物质利益原则，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要重视物质鼓励即“物质刺激”的积极作用，虽然在有些论述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从基本方面看，这里的论述是符合社会主义时期的客观要求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评论，既讲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如承认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要注意防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等；但是，他的主导倾向却是在反对“物质刺激”，片面夸大精神鼓励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问题上：一是反对实行计件工资，认为计件工资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关心个人的收入。二是基本否定物质奖励制度，认为“教科书”说的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会使生产增加的观点，是“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还批评“教科书”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等等。在实行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奖励制的具体工作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倾向，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和不断将这些方面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完善化，再加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干预，一些令人忧虑的消极现象是不难克服的。但是，毛泽东的批评夸大了物质鼓励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不当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他对这两个问题所采取的基本否定态度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实际上不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不认为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会起积极作用。无论外国的或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都已证明，这种观点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其他“左”的观点，这里不一一论列了。

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点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才对这些“左”倾观点有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对于毛泽东的“左”倾观点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今后还要继续克服和消除。但是，正如毛泽东本人说过的那样：不要把错误引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我们对待毛泽东的失误也应当取这种态度。从实践上说，正确地总结教训，有了前车之鉴，可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从理论上说，这是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史、党的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对毛泽东的失误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对于从这个历史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这是不应当忘记的。

附记

本文前面提到的关于毛泽东读“教科书”的“笔记”问题，一九六〇年三月七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曾说：“送上胡绳同志在我们学习时作辅导用的笔记二本，请阅。这里头的话，都是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现在用笔记形式写出，我们已告诉参加学习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信中讲的笔记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误传为毛泽东本人写的“笔记”。

读鲁迅著作(徐中远)

终身的爱好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毛泽东十分爱读鲁迅的著作。还在延安时期，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他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这说明在写此信之前，毛泽东已经读过一些鲁迅的著作，但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他还没能系统地读到鲁迅的著作。

一九三八年八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鲁迅全集》。书是在上海出版的，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到达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鲁迅全集》特印了二百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这套“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五十八号，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黑色一样的布料包角。这套书印装别致，做工精细，色彩协调。

毛泽东收到《鲁迅全集》之后，把书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尽管当时战事忙碌，环境简陋，但他总是忙中找闲，在低矮的窑洞里秉烛夜读。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放着三卷《鲁迅全集》，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爱读鲁迅著作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同读其他著作一样，常常用笔在书上圈圈划划，一边读，一边划，文章读完了，书上也划满了直线、曲线、圈圈、点点、三角、问号等多种符号和标志；同时还留下一些简明的批语。

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有的错字是容易识别的，有的就不那么容易。例如，《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钉梢》这篇文章里的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首词中的“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如果仅从词义来看，看不出是一个错字。从词律的音韵平仄看，显然是错了。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将“从”字改为“是”字，原词，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所载，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一九八一年新版《鲁迅全集》已改正。张泌的词在唐代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毛泽东对他的词在延安时就记得这样准确，这说明毛泽东对唐诗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他读鲁迅著作仔细的程度。

经过较为系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的了解更多了。后来毛泽东在著作、讲话、谈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称赞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一九四〇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文协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为大会题词。毛泽东的题词，一则是：“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另一则就是：“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

（①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还解释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1944年1月24日，山东省文协曾给中央总学委打电报，询问《讲话》中解释“千夫”的那句话是否有误，要求“请问明毛主席电示为盼”。2月8日，毛泽东在回电中坚持他原来的解释，并说：“鲁迅虽借用‘千夫指’古典的字面，但含义完全变了。”）

毛泽东对于那套精装别致的《鲁迅全集》十分珍爱。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在那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不少的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可是这套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到南海居住之后，有一天，他在书房里阅读这套《鲁迅全集》，一边翻阅，一边饱含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和敌人交火。这些书都是分给战士们背着，他们又要行军，又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些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出访前夕，他亲手挑选了几本鲁迅的著作带走。在赴莫斯科的途中，他有时还读鲁迅的著作。

到了莫斯科，有不少外事活动。可是他还利用零星时间阅读鲁迅著作。有一天，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地，离

开饭的时间不到半小时。这时，他就拿出一本鲁迅的著作读了起来。开饭的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把饭菜放在桌上，他都顾不上吃。工作人员走到他身边，轻声催他吃饭。他说：“还有一点，看完就吃。”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他用笔在书上圈圈划划。还自言自语：说得好！说得好！一直把二十来页书看完才吃饭。他一边吃，一边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只收著作、未收译文和古籍），并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著作也很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单行本上的许多篇章，他反复读了多次。看一次，他习惯在书上画一个圈；看两次，就画两个圈。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把新版的《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正在翻看的书，就是新版《鲁迅全集》。

毛泽东对鲁迅的每本集子以及许多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编的，什么时候出版过，都很注意。他在阅读时差不多在每册封面上都写有批注。例如，《且介亭杂文》一册，他在封面上批有：“一九三四年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编”；《彷徨》一册的封面上批有：“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等等。《二心集》中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原书副标题上只写了“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他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即在“三月二日”前添加了“一九三〇”。《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副标题上只写了“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他在“八月十二日”前添加了“一九三一”。

到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年近八十高龄，精力、体力等都远远地不如以前了，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读鲁迅著作的兴趣未减。一九七二年九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本）。这本书共有二十九篇鲁迅手稿，都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得到这本书后，一方面读鲁迅的手稿，一方面欣赏鲁迅的墨迹。毛泽东生前很爱欣赏名家字画和那些书写名人诗词、著名警句、格言、楹联等等的名人墨迹。鲁迅的这本手稿，都是在“语丝”稿纸上，用毛笔写的行书体墨迹，字迹清楚，运笔流畅自如，所以毛泽东常常翻看。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往下看。一边看，一边还不时地用笔在手稿选集上圈圈划划。

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生病以后，用放大镜看书越来越困难。工作人员建议把鲁迅著作印成大字本。他说，国家目前还很困难。印大字本又要花钱。后来，有关方面一是为了毛泽东等老同志阅读鲁迅著作的方便，二是可以馈赠外宾，三是便于长久地保存鲁迅著作，于一九七二年特意将五十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这套线装本由北京、上海两地排印。因全书印刷的工作量大，不能一下子印出来。印好一卷，出版社就先送给毛泽东一卷。他收到一卷就看一卷。当时出版社并没有按原全集的顺序送，哪卷印好送哪卷。因为是线装本，字又较大，毛泽东看起来很方便。当时，他对这种新印的线装大字本读得很快，常常这卷看完了，下一卷出版社还没送来。就这样先后延续了几个月，全书才印装完毕。他收到全套的线装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时，也差不多又读了一遍。在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的许多册的封面上，他同样划了一些红圈圈。在书中划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了“1975.8再阅”。

《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是篇谈文艺批评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文艺批评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一下把整个苹果部抛掉的作法。鲁迅指出，“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很错误的。鲁迅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谆谆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文艺作品。毛泽东赞同鲁迅的见解。一九七五年，他在病中还叫工作人员给他读这篇文章。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的内容时，他高兴得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放着这套新印的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有纸条，有的还是翻开放着的。这套书同其他大字本书一起伴随着毛泽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几年路程。

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

鲁迅的小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璀璨的明珠。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大批被压迫、被剥削、被蹂躏、被污辱的穷苦人民的形象，控诉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制度，鞭挞了人民群众中的消极落后的精神状态，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对鲁迅的小说非常熟悉。他经常谈论鲁迅小说中的主人公，特别是阿Q。他曾说过：“《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他在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多次提到《阿Q正传》，教育全党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准许别人革命，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

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他还提倡写文件要像《阿Q正传》那样通俗化、口语化。

毛泽东尤爱读鲁迅的杂文。鲁迅在他三十多年的创作行程中，先后写了六百多篇约一百三十五万字的杂文，出版了十六本杂文集。这些杂文，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造成的黑暗和罪恶，反映了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潮流，是二三十年代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结晶，是中国文苑中的奇葩。

毛泽东读鲁迅的杂文著作，十分用心理解、思索，还时有发挥。在《花边文学·正是时候》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少，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毛泽东读到这段话时，在“吃饭”后面添加了“夺权”两个字。这样就把“旧家子弟”的本质更深入地揭示出来了。

毛泽东也经常运用鲁迅杂文中的思想和言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主张。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这个大会上发表了《论鲁迅》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用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的“打落水狗”的思想来教育人们。他说：“鲁迅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和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重要讲演。在这次讲演中，他多次引用鲁迅杂文里的话。譬如、洋八股，这是五四运动以后由一些浅薄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这也是一种八股。”毛泽东运用鲁迅的思想和言论，针对当时文风不正的实际情形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还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批评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就在这个报告会上，毛泽东把他亲自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分发给每一个与会的人。这本《宣传指南》里收入了鲁迅论创作的一封信，即《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为了便于和推动人们的学习，毛泽东在讲演中专门对《宣传指南》作了解说。鲁迅谈创作有八条，他详细地解说了四条，指出：鲁迅说，文章写好后“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宣传指南》是延安整风运动二十二个必读文件之一，并被编入《整风文献》。

毛泽东为什么爱读鲁迅的杂文，爱运用鲁迅杂文著作中的思想和言论呢？我们知道，鲁迅的杂文，具有很强烈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特别是鲁迅后期的杂文，是我国三十年代“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文化战线上的最真实的历史记录。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在谈到红军到了陕北，还处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情形时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

鲁迅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压迫和残害，不能直言不讳地阐明和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多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并且在斗争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时曾说：“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①后来毛泽东还说过：“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②他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认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阅读和书写鲁迅的诗

毛泽东也爱读鲁迅的诗。鲁迅的诗和他的文一样，是鼓舞人们前进的号角。它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七卷中收进的鲁迅的新诗、旧体诗，毛泽东都曾用心地读过。一九五九年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诗作，不少诗的题目标旁都画了圈。一九五九年三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全集共收诗四十七题五十四首。这本诗集，毛泽东从头至尾读过，有的诗篇他读过多遍，不少的诗他能背下来。诗集中有一首叫《湘灵歌》的诗，是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鲁迅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

湘水女神。据史书记载：“湘灵，舜帝的妃子，在湘水里溺死，成为湘夫人。”鲁迅借用这个神话中的传说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憎恨，以及对死难者的哀思。毛泽东在读完这首诗的末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后，在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就是唐代诗人李贺。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

毛泽东还很爱书写鲁迅的诗。他生前有一段时间，每次练习书法，差不多都要书写鲁迅的诗句。他为什么这样爱好书写鲁迅的诗句呢？一次他在书写鲁迅诗句时曾这样说过：书写鲁迅的诗句，既可以进一步理解诗的内容，又可以进一步了解鲁迅。平时有友人请他题字、题词时，他也常书录鲁迅的诗句赠之。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最爱书写。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延安时，他就书写过鲁迅的这一诗句。一九五八年，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后，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登台接见的时候，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当晚，他书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第二天，叫工作人员将此题词转交给了红线女。毛泽东在书写的鲁迅诗句前面写了一段类似小引的文字：“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最后落款：“毛泽东，1958年12月1日”。

外国朋友来访时，毛泽东也常书写鲁迅诗句相赠。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祝贺国庆节代表团十名成员、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代表团十名成员等共二十四名日本朋友时，非常高兴地将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的著名诗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书赠给日本朋友。他对日本的朋友们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鲁迅的这首诗。还特意让郭沫若帮助翻译一下。郭沫若在《翻译鲁迅的诗》中说道：“鲁迅这首诗，是在去世前不久，写赠给一位日本的社会评论家新居格的。新居访问中国在上海拜访了鲁迅，鲁迅写了这首诗赠他。其用意是：当时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难中正在酝酿着解放运动；希望来访的客人不要以为‘无声的中国’真正没有声音。”（新居格（1888—1951）是日本作家和文艺评论家，1934年来中国旅行，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并向鲁迅求字，鲁迅便把这首新作书赠给他。）

（郭沫若将这首诗译成白话文：“到处的田园都荒芜了，普天下的人都面黄肌瘦。应该呼天撞地号啕痛哭，但是，谁个敢咳一声嗽？失望的情绪到了极点，怒气充满了整个的宇宙。谁说这真是万籁无声呢？听！有雷霆的声音在吼！”）

毛泽东那奔放流畅、刚劲潇洒的书作，既充分表达了对日本朋友的笃厚情谊，也真挚地表达了对诗作者鲁迅的敬仰和思念。后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白土吾夫说过：“四十年前，鲁迅写那首诗给日本友人，十五年前毛主席书赠鲁迅的诗给日本朋友们，这些，在今天都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日本人民团结起来，走同中国友好的道路，继续前进。尽管在斗争的道路上有曲折，但我确信，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鲁迅、毛泽东都已离开了我们，然而他们诗书合璧的佳作却成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史上的丰碑。

古籍新解，古为今用

——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逢先知)

一

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这也是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即使在井冈山时期，有机会他还要读点古书。他自己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我在井冈山时，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①（①毛泽东1938年5月3日对抗大三期二大队的讲话。）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当时有些农民误认为打土豪便是共产主义，但从中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读古书的兴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丝毫不减。

在延安时期，读书的条件好一些。他托人买了两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蔡东藩著）①（①毛泽东1937年1月31日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除自己阅读，还向别人推荐。从他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给谢觉哉的信里可以知道，他当时还有《容斋随笔》和其他笔记小说。范文澜那时送给他的一套《笔记小说大观》，后来带到了北京，现还存放在毛泽东故居。

进北京以后，根据毛泽东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我记得在一九五二年，给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这就是一些人熟知的毛泽东经常阅读并作了大量圈、划和批注的那部《二十四史》。《四部备要》对中国的主要古籍收辑得比较齐全，据我了

解，不说全部，恐怕绝大部分，毛泽东都读过了。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所说杂书，也都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书籍，如《智囊》、《笑林广记》之类。毛泽东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等，他也通读了。关于毛泽东读史的情况，在我的登记本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要《宋史》，我们送去《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十一月二十三日，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二十四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他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有计划地阅读史书，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嗜爱中国古书，但并不特别要求读古版本的书（这里说的古版本，不是指影印的古版本；影印的古版本他还是很喜欢的，如影印宋《楚辞》等）。在他的藏书中，既无宋版书，也极少明版书。他不是古董鉴赏家和收藏家，也不作烦琐的考证，而对于古书内容的研究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许多方面实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

毛泽东从阅读大量的古籍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

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首先要对中国文化遗产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曾作过很好的说明。他说：

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①（①对于孔孟之道，毛泽东也不是全盘否定的。1943年，他曾针对那种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直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什么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全盘否定孔孟之道，那是毛泽东在晚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去整理，重新出版，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

这就是毛泽东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取的根本态度，也可以看作是他阅读卷帙浩瀚的中国古籍所得出来的基本经验。

根据我长期接触毛泽东读古书的情况，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的记载，我认为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我在这里把它称作“古籍新解”；一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

二

毛泽东读古书，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涉、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期间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先后写了两大段文字，重申并发展了上述重要观点。他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又说：“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

级斗争史。”

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书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都是很有兴致阅读并加以肯定的。例如，他在读完白居易《琵琶行》之后，带着感情写下这样的评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他对《聊斋志异》中的《小谢》一篇也写过内容相似的评语，说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毛泽东对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不少新鲜见解。例如，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①（①这里所说的国家，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②（②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他认为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毛泽东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也充分肯定了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同时又指出，书中的两位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现代青年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①（①周世钊：《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这段话是1951年秋，毛泽东与周世钊等人谈话时说的。）毛泽东对《西游记》及其作者颇为称赞。他对《西游记》第二十八回一段文字写的个批语说：“‘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这个批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毛泽东在善恶问题上的辩证观点。

毛泽东对于凡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他很推崇和赞赏战时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唐朝中期实行政治改革的二王（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八名士），明朝那位大胆揭露假道学的思想家李卓吾，清朝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魏源、龚定庵、林则徐，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很爱读他们的著作和传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以及记载他们政治活动的历史资料，他是经常要看的。康有为的这两本书，在学术考辨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但在思想上对封建传统思想加以涤荡，对守旧的顽固派给以打击。因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起到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为维新变法作了舆论准备。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和有关《苏报》案的材料，根据我的记载，毛泽东就要过四次：一九五八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七月，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月。毛泽东对章太炎和邹容的英勇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字，深为敬佩。为表示对这两位革命家的怀念，毛泽东在《革命军》一书扉页的邹容肖像旁边，挥笔书与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糍。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章太炎和邹容。他说：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小，大概三十几岁。

毛泽东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毛泽东喜欢阅读历史上那些起过进步作用的、对旧势力旧制度具有反叛性格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著作以及他们的传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道路、开拓新世界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一贯鼓励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清理中国古代文化。在这方面，凡有成绩者，皆鼓励之；凡有不足者，加以劝说；凡违反者，给以批评；而对于世界观已经固定的老先生们则不强求之。一九四〇年，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上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读了讲演提纲，十分高兴，称赞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一九四四年毛泽东读了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的书稿后，致信李鼎铭，一方面称赞作者“经营此书，费了大力”；又一方面指出该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而贬抑其整个运动”的缺点。同时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力量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并以商量的口吻表示，企望作者能持这个新的历史观点对书稿加以改造。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读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下部以后，写信给章士钊说，此书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

毛泽东阅读中国古书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人，也完全不同。

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天，毛泽东与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②从毛泽东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读古书，特别是读古代史书，其着眼点是为了今天，这就是古为今用。

我们看到在《毛泽东选集》中引用了很多古籍，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新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答三记者问时，用东汉朱浮写给彭宠的一封信中的两句话：“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批评蒋介石对共产党搞什么限制“异党”、“异军”等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而不利抗战的反动行径，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批评我们有些部队、机关、学校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生产活动，是因为他们“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

在一九四五年七大闭幕词里，毛泽东用“愚公移山”这个古老的寓言，比喻和激励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决心，起了极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今天我们党仍然用这个寓言来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四化和进行全面改革而奋斗。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毛泽东借用元朝人萨都刺《登石头城》一词中“天低吴楚，眼空无物”，说明国民党四分五裂，众叛亲离，日暮途穷的状况。在同年八月十八日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用李密《陈情表》的两句话“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刻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国人民革命高潮中彻底孤立的形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借用韩愈的《送穷文》，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的意志和愿望。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

一九五九年六月，正当由于“大跃进”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时候，毛泽东在一次个人谈话中说，我们过去八年的经济建设都是平衡的，就是去年下半年刮了七八个月的“共产风”，没有注意综合平衡，因此产生经济失调的现象。他接着引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又引用曹操批评袁绍的话：“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供吾奉也。”毛泽东当时引用这些话是要说明，我们做经济工作应该有清醒的头脑，胆大心细，多思慎行，统筹全局，责任分明，不然，就会造成损失。

毛泽东多次讲过卞和献璞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二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把他的右脚砍掉了。卞和坚信真理，坚信自己献的是好玉石，第三次再献上去，被确实证明了是块好玉。才取得了信任。毛泽东讲这个故事说明，要使人们相信真理，抛弃偏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甚至还要作出某种牺牲。

毛泽东引用宋玉的《风赋》告诉我们，做一个领导者要善于辨别政治风向，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就要引起注意，当然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毛泽东以南北朝梁将韦睿的事迹教育我们的干部。《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

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大意是说，韦睿这个人，豁达大度，古来所无，其在职位，必有政绩，对部下十分爱护，与将士同甘共苦，自身非常艰苦朴素。在这段记载的旁边，毛泽东写了一句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语在《韦睿传》中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将在前线”，“不贪财”，“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这些称赞韦睿的话，不也就是我们的干部应当学习的吗？

毛泽东还以东吴大将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教育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应当努力读书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他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念书，他接受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籍，写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批语。《智囊》中有一段讲唐太宗用兵之道的，略谓：“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对此，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并对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有所评价。他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而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批语，还有如：“先退后进”；“中间突破”；“有强大的战斗后备队”；“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胡柳陂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等等。

在阅读战争方面的历史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不杀俘虏。据《新五代史》记载：梁将王彦章被唐庄宗俘获，庄宗劝其投降，王不从。遂被杀。此处毛泽东批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在读《三国志》时还有类似的批语：“杀降不武。”“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毛泽东用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事例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在《毛泽东选集》中屡见不鲜，此处不再赘述。毛泽东还以梁鸿不因人热的事例^①教诲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鼓励他们要有志气，要靠自己艰苦创业，不要仰仗他人。

①不因人热的事例，见《东观汉记·梁鸿》。梁鸿，东汉人，少孤家贫。一次他的邻居做完饭，要梁鸿趁着热灶热锅接着做饭，梁鸿说，“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他又自己点起火来做饭。

以上谈到的，仅仅是毛泽东古为今用的一些例子，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要做到这样自如地运用典故、成语，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无可讳言，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诗、古语，也有失之偏颇的，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历史论据，伤害过自己的同志，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毛泽东不仅喜欢读中国历史书，也喜欢读外国的历史书和著名政治家传记。他对外国历史也是比较熟悉的，这里不来详说。

四

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毛泽东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毛泽东曾要我们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我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五十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以后，他又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两次要《楚辞》，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楚辞中，毛泽东尤爱屈原的《离骚》。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离骚》是一篇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对于光明和理想的追求，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正是这些，吸引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直到晚年。

毛泽东爱读唐诗。我们为他收集了各种唐诗选本，仅《唐诗三百首》就准备了好几本。后来又买了一部《全唐诗》。在唐诗中，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主要喜欢他们的浪漫主义的风格。特别是李白，这位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作气派宏大，感情充沛，具有神奇

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魅力。除“三李”以外，毛泽东也比较喜欢初唐四杰的诗，对这四位诗人，特别是王勃，有较高的评价。他在读《初唐四杰集》一书时写的一段批语中说道：“这个人（指王勃——引者）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一，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在宋词作家中，毛泽东崇尚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在艺术风格上开创了词坛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豪放派。苏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一扫晚唐五代词家柔靡纤弱的气息。辛弃疾继承了苏东坡豪放的风格，又熔铸了南宋初期爱国诗人的战斗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辛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是很确当的。辛词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苏东坡。《稼轩长短句》是毛泽东经常放在身边的一部书。毛泽东还指名要过南宋的一些爱国词人（包括诗人）如陆游、张孝祥（其词集名《于湖词》）、张元幹（其词集名《归来集》）、洪皓（其诗词集名《鄱阳集》）等人的作品。他们的诗词的共同特点是，爱国主义的内容和豪放的艺术风格。

中国的古诗词，历来分婉约、豪放两派。毛泽东更喜欢哪一派的词作？对两派的词作有何评论？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书写的范仲淹两首词及读后评论，可以得到明确答案。

范仲淹的两首词：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毛泽东写的评论全文：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这篇文字是非常珍贵的，从中不仅可以了解毛泽东对中国古诗词和范仲淹这两首词的重要而颇有意味的见解，更可以了解毛泽东的心情、性格和爱好。

毛泽东读诗词的范围非常广泛，他能全文背诵的诗词不计其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他读《五代史》时，想起自己早年读过的一首诗《三垂冈》，因记不起作者名字，于二十九日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出，并将此诗的全文一字不差地凭记忆写下来附上①。信中说：“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①毛泽东当时凭记忆写下来的《三垂冈》诗，全文如下：“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诗后注明：“诗歌颂李克用父子。”该诗中的“犹”、“下”二字，有的版本为“且”和“畔”。毛泽东所抄写的，与《随园诗话》引用的版本相同。

从上面列举的毛泽东喜爱的诗词，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毛泽东的诗词，从艺术上说，继承了这些诗人和词作家的优秀传统。

在古文方面，毛泽东既喜欢六朝的骈文，也爱读唐宋八大家和其他一些人的散文。对六朝的骈文，毛泽东虽然认为它不如初唐的新骈，但他还是喜欢读的。收入六朝骈文的《六朝文絜》和其他六朝人的各种文集，是他经常要的。骈文的特点是字句整齐，语言精美，对仗工切，有一些相当好的写景抒情文章。在唐宋八大家中，毛泽东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柳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柳宗元是一个革新派，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又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进步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更增添了柳文的光辉。相对说来，毛泽东对于韩愈的评价差一些。他认为，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

毛泽东经常称赞一些好的古文，并向别人推荐阅读。他说，秦朝李斯的《谏逐客书》很有说服力，西汉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等等。

毛泽东通过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也在文风上吸收了它们的优良传统。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语言大师，写出大量文字优美，词汇丰富，说理透辟，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红学”一家言(龚育之、宋贵伦)

毛泽东很喜欢读《红楼梦》，自己反复读，也劝人反复读。他多次谈过应该怎样读《红楼梦》，笔者之一有机会听到过一回。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找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除了几个别的人，还有吴江、邵铁真、龚育之。根据龚育之当时的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这段话从《红楼梦》谈到“红学”，本文也就分这样两个部分，进一步介绍毛泽东的一些有关论点，并简单地谈谈我们的看法。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

毛泽东对《红楼梦》评价极高。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①这里提到《红楼梦》，固然有幽默的成分，确实也是引以自豪。《红楼梦》足以卓立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而无逊色。如同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是他们各自民族的骄傲和世界人民的骄傲一样，《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我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

把《红楼梦》当故事读，是读小说的初浅层次。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进到了读小说的较深层次。

怎么叫做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呢？我们体会，头一个意思，是要了解《红楼梦》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红楼梦》中的思想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进步要求。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①

“人民性”一词，毛泽东不多用，但在这里用了。“人民性”的含义，同《新民主主义论》中用的“民主性”（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民主性的精华”），大致是一个意思。

《红楼梦》作为“民主文学”，它的“人民性”或“民主性”，表现在哪里呢？人们对此作过许多讨论。毛泽东说得很有分寸：“不满意封建制度。”仅此而已，没有夸大和拔高。不满意封建制度的什么？方面很多，人们也有详细的论列。毛泽东着重的是作者、书中人物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封建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的同情；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妇女的尊重；是作者、书中人物在黑暗和丑恶中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

毛泽东把《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①（①毛泽东1961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这对于理解《红楼梦》之成为“民主文学”是很重要的。他还说过：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②（②毛泽东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又一个意思，是要通过《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的衰败，来了解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衰败。

把点明金陵四大家族（贾、王、薛、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第四回，以及《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作为《红楼梦》全书的总纲，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卓有见地的。“脂戚本”第四回总批有一首七绝，头两句是：“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这也是有识之语，但还没有用它来总括全书。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也就是一部四大家族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其实只写了一个家族——贾府。从一家看四家，从四家看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宦之家”。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里说得好：“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①从贾家的衰落，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

贾府衰败的原因，冷子兴作了评论。毛泽东有一次提到这一点。他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②冷子兴还说过，贾府这个大家族“今日的儿孙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就是说，一个家族垮下来，首先在于这个家族的人垮了下来。安富尊荣养成一代又一代无用的膏粱纨绔。贾府的爷们，哪个不是如此！唯一一个有思想、有才华、有个性的，却是这个家庭和这个制度的逆子——贾宝玉。这样的家族，这样的阶级，还能有什么前途呢？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封建家族的逆子，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要反对封建制度。毛泽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③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①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还有一个意思，是要通过《红楼梦》来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

早在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好书，现在许多人鄙视这部书，不愿提到它，认为它只是描写了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②一九六一年在同刘少奇等同志的一次谈话中，刘少奇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毛泽东也说：《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③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他的表侄孙女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④

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当然要读理论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封建社会作科学的分析；当然要读历史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许多历史事实。但是，读这些都还不

够。还要读《红楼梦》这类描写封建社会生活面貌的文艺作品，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封建社会得到许多细致的生动的形象的了解，而这些，从理论书和历史书中是不容易得到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生活，毛泽东首先着眼的是阶级斗争。《红楼梦》反映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有它的局限性。它没有直接描写农民和他们的斗争。它主要写了封建大家族的内部及其周围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性质和情况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要人们注意对贾府的人口作阶级的分析。三十多个主子，三百多个奴隶，他们之间既有鲜明的阶级分野，又处在极其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之中。毛泽东要人们注意对书中令人瞩目的几十桩人命案件作阶级分析，这些人命案件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但都暴露了封建统治的残忍和罪恶。简单地贴阶级标签是不能深入历史的，但分析历史、分析《红楼梦》描写的人物和事件的钥匙，的确是阶级分析。离开这个钥匙，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不可能分析清楚。

②毛泽东1963年5月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③毛泽东1964年8月24日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

①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22页。

②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的演讲。

③毛泽东1961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

④毛泽东1965年与王海容的谈话。

同时，毛泽东注意的，也不止是阶级斗争。比如：

他注意到了《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问题。他说过：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①

他注意到了《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过：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②

总之，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个视角。恩格斯就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列宁也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②这不就是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当作历史读吗？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重要的视角当作唯一的视角，而排斥其他。比如，艺术的视角，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的视角，以至于版本的沿革，作者及其身世的考证，同外国作品的比较等等，也都是阅读《红楼梦》、特别是研究《红楼梦》必不可少的视角。在各自的视角里，都可以有所发现，作出有价值的研究。各种视角的综合，才能对《红楼梦》作出全面的研究。

这里还要提到，毛泽东自己，也不是只限于历史这一个视角。他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也很欣赏。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他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并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例如：在“三反”的时候，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在一九五七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在访苏的时候，用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毛泽东要求理论文章、政治演说也要注意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引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语言是途径之

一。《红楼梦》大概是毛泽东最常引用的。这也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特点。

对“红学”作历史的评价

毛泽东在北戴河的谈话谈到新旧“红学”，虽然语焉不详，但对“红学”的发展作出历史的评价，勾画了一个轮廓。

“红学”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旧红学”；由胡适、俞平伯在二十年代开创的“新红学”；建国以后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新红学”。“红学”从何时算起？也许可以说，从有《红楼梦》，就开始有“红学”，脂砚斋是第一个“红学家”，虽然由于他和曹雪芹关系亲近，读到过曹雪芹在不断增删中的草稿（包括后来佚散的那部分稿子），并且预闻了《红楼梦》的创作，“脂评”本身已经成为“红学”研究的对象。以后还有许多评点派的红学家，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蔡元培是新文化的一名先驱，作为红学家，却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属于“索隐派”。“索隐派”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比如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这是荒唐的。毛泽东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就是指“索隐派”而言。胡适批评“旧红学”，建立“新红学”。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三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前两方面的工作有开拓性的意义，至今还在延展之中。“新红学”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有两个著名论点，一曰《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一曰《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这里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许多可批评的东西。

一九五四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第九期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不久，在十月十日《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都是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毛泽东详细阅读了这两篇文章，杠杠、圈圈划满了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他在批语中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廿六岁”；在文章的四五处毛泽东也划了问号。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作者谈到了贾府衰败的原因：“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批注：“这一点讲得有缺点。”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大家都知道的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由于这封信，在文艺界、学术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并发展到对胡适的政治、学术和哲学观点的全面批判。

平心而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的“红学”研究的新问题、新任务。如果说，“红学”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是二十年代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的建立；那么，“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应该说是五十年代以李、蓝为开端的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红学”的建立。

但是，学术批评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说理论争。这就不利于对以前的“红学”作全面的、有分析的历史评价。这个历史教训是需要认真汲取的。

应当指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个报告中，陆定一特别讲到两年前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对他的批评是有错误和缺点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①这是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自我批评。这一历史事实，也许还不为一些青年朋友所知晓。

一九八六年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会上讲话。他说：“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①

应该说，三十二年前的那场批判的是非，已经有了明确的历史结论。

毛泽东北戴河谈话中谈到的其他几个红学家，这里作一点简单介绍。吴世昌，是当时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

一位红学家。他的研究主要也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证方面，但在这方面的许多具体问题上，他同胡适的观点有尖锐分歧。

王昆仑，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的《红楼梦人物论》一书，脍炙人口，所以他同时又成为引人注目的红学家。他的这部人物论，写在全国解放以前，这时重新修订，逐篇在《光明日报》上登载，显然已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

何其芳，当时是文学研究所所长，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了一篇长序，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一篇力作。他在许多问题上与李希凡的观点有分歧。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之间，在学术问题上也要进行百家争鸣。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所有这些红学家，从胡适到何其芳，都称为新红学家，对他们的“红学”研究给予不同程度的积极评价。当然在他看来，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所以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他积极提出自己对《红楼梦》的基本观点，这也不妨看作是以一家之言参加百家争鸣。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民主的和谐的气氛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红楼梦》，而又容纳各种层次和各个方面的研究，允许和鼓励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平等批评和自由讨论，才能促进“新红学”的健康发展。

“文化大革命”后期，曾经掀起了一个所谓的“评红”的热潮。这期间传出了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若干说法，如说《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写爱情是为了掩盖政治。这显然是偏颇之论，并且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那是“红学”研究在一个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这里就不予介绍和评论了。

毛泽东读报章杂志(逢先知)

毛泽东有时把读报看得比读书更重要，更紧迫。“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这是从延安时期流传下来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毛泽东如此重视读报，我自己是有亲身体会的。大概是一九五一年。有几次因为没有把当天收到的报纸及时送阅，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我要看新闻，不是要看旧闻。”这个尖锐的批评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鞭策着我后来的工作。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读报纸杂志的习惯。他曾经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主办的《民主报》、《民报》的热心读者，后来更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这些报刊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新青年》，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井冈山时期，因受敌人严密封锁，读报十分困难。在战争中要打胜仗，就要知己知彼，读报纸则是了解敌情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毛泽东常常为看不到报纸而焦急，苦恼。一九二八年，有一次他专门派出一个营去打谭延闿的家乡茶陵县的高陇，搜罗了一批报纸上山，战斗中还牺牲了一些干部和战士。一九二九年，下井冈山到了赣南闽西，可以看到报纸了，情况大为改善。毛泽东为此而高兴的心情，可以从当时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反映出来。报告说：“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由于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广州的报纸，到瑞金县可以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状。”有时毛泽东还把读到的报纸新闻及时地摘报中央。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率红军占领了漳州，五月二日即将四月二十六日以前上海、香港、汕头等地的报纸新闻，摘要电告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摘报的内容，从国际形势到国内形势，从中日战事到中苏关系，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情况到国民党对付红军的军事策略，以及打下漳州以后，在国民党内部引起的惊慌和帝同义蠢蠢欲动的消息，共十六条，写得提纲挈领，简明扼要。

如果说，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嗜读报刊是为了增进知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末，在紧张的战争岁月，以更加迫切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报纸，则是直接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正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刊物比较容易收集到，毛泽东订阅的报刊多起来了。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四十年代初期，他订阅的报刊，至少有三四十种。②

②根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史敬棠回忆，订阅的报纸有：《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益世报》、《新华日报》、《新蜀报》、《时事新报》、《商务日报》、《新民日报》、《秦风报》、

《工商日报》、《两京日报》、《前线日报》、《新工商》、《大刚报》、《新中国日报》、《光华日报》、《国家社会报》等。刊物有：《世界知识》、《群众》、《经济建设季刊》、《人与地》、《中农月刊》、《财政评论》、《四川农情报告》、《农业推广通讯》、《中国农村》、《四川经济季刊》、《中国农民》、《新闻周报》、《文化杂志》、《经济论衡》、《西南实业通讯》、《国论》、《新经济》、《民主周刊》、《文萃》、《中苏文化月刊》、《国讯》等。1941年3月1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请他们订阅一批报纸书刊，在上述目录中以外的，还有《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

延安《解放日报》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的。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一直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不仅亲自为它撰写社论，还直接计划安排组稿工作。他读到报上的好文章、好新闻。立即通知各报转载，广为传播，有时读到一篇好作品，可以兴奋地一口气读到天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世界战争的全局在胸，要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阅读国内报刊的同时，还天天阅读专门刊登外国电讯的《参考消息》（后改名《今日新闻》），有重要新闻随时批给其他中央同志和有关同志传阅。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毛泽东的一批珍贵的手稿，是他在1942年十一月至1943年一月间，为研究国际问题而专门摘录的外国电讯稿，按十六个国家分类。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阅读的报纸杂志数量更多了，范围更宽了，不只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还有文学的、自然科学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至讲琴棋书画之类的报刊文章，都在他喜爱或涉猎之列。他每年订阅的报刊，包括出版社赠送的。都在百种以上。在一九五六年他开始考虑适当摆脱一些政务、用更多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后，从1958年起，我们又给他增订了全国各主要高等院校出版的综合性的学报或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报。

毛泽东阅读报刊也是有所侧重的。每天必读的报纸有：《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海《解放日报》、《天津日报》等。经常看的杂志主要有：《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新建设》、《文史哲》、《经济研究》、《红旗》、《学术月刊》、《文艺报》、《诗刊》、《文物》、《科学画报》、《大众科学》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现代佛学》等，有时还翻阅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某些刊物。他最喜欢读的是有关哲学、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所以对《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哲学》、《史学》等专栏特别有兴趣，而对《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比较缺少理论文章和学术文章提出过意见。一九六四年，他说过：“《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又说：“《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人民日报》最近组织一些学术讨论，这样做好。”后来《人民日报》加强了理论方面的内容，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说：“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毛泽东对报刊上有争论的问题尤为关注。有时为了研究一个问题，还召集有关专家和人员共聚一堂，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交谈和讨论。

从一九五五年起，我国学术界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一九五六年达到高潮，这个讨论引起毛泽东浓厚兴趣。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前面的文章已有叙述，这里不再多说。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哲学界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的讨论。^①（^①应当指出，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的讨论，后来引到政治问题上去整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这是错误的。）凡属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毛泽东几乎都要看的。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他曾邀集一些同志谈论发表在一九五六年第二期《哲学研究》的《对“矛盾的统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该文对苏联《简明哲学辞典》关于同一性的解释^②（^②《简明哲学辞典》指出，不能把“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现象”认为是同一的。）提出不同意见。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讨论的综合介绍，当即要我们把文中提到的分别刊登在《新建设》、《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上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全部找给他。

对苏联哲学界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文章，毛泽东也很注意。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他要看这方面的文章，我们收集了一批送给他。当时苏联有一位哲学家写信给毛泽东，并寄来他的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重视。

同阅读书籍一样，毛泽东阅读报刊也常常写一些批注，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还批给别人看。例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里发表了《如何评价〈文赋〉》一文。作者对陆机

《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进步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观点。毛泽东将此文批给一些同志看，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毛泽东还注意根据报刊文章中的合理意见，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九五八年全国掀起了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运动。对于应不应该消灭麻雀，科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赞成，认为利大于弊；有的不赞成，认为弊大于利；有的认为利弊相当。在刊物上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各抒己见。毛泽东要我们把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收集起来送给他。我们还整理了一个简单材料附上。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些材料。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接着，三月二十四日他在天津会议上重申了这个改变，说：这两年麻雀遭殃，现在我提议给麻雀恢复“党籍”。科学界的意见，对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在学术上，毛泽东比较注意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自由讨论，认为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即使有人对毛泽东的著作提出不同的观点，他也同样认为应当允许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一九五六年，来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意见。有同志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此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立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一九六五年，高二适写了一篇与郭沫若争鸣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为这篇文章的发表问题写信给郭沫若，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几天之后，高二适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毛泽东把报刊作为了解国内情况和学术理论动态的重要渠道，同时也通过报刊了解国际情况和国际知识。一天几万字的《参考资料》是他每日必看的重要刊物，像读书一样地圈点批划。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内部刊物，是他制定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有重要内容的，常常批给别人去看或印发会议。他除了看重要新闻，对《参考资料》刊登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也很有兴趣。他说，这些回忆录里写了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很值得看看。

毛泽东对国外情况的熟悉，常常使得一些著名外国记者为之惊讶。一九六〇年斯特朗在回忆她一九四六年同毛泽东的那次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毛泽东对于纷坛复杂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和观察国际动向的敏锐性，同他认真地、一天也不间断地阅读和研究大量国际问题资料，是分不开的。

忆毛泽东学英语(林克)

学英语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于一九五四年秋到毛泽东办公室担任他的国际问题秘书，前后有十二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我除了秘书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帮助他学习英语。从那以后，二十年过去了，但毛泽东学习英语的生动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最近我查阅了毛泽东生前阅读过的英文书刊，访问了一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并查阅了我当时的笔记，以便使我的回忆和叙述更真切一些。

“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学习，并主张把学习本国语言和学习外国语言，学习现代汉语和学习古代汉语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一九五八年一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初期，他重申了这一建议。在七十年代，他还提倡六十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他的学习受到很大限制。全国解放以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学习英语成为他的一种爱好。

一九五四年，我到他身边工作时，他已年逾花甲。他第一次同我在一起学英语是在同年的十一月，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他在游泳后休息时，想读英语，便让我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当时我的心情有些紧张。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当我谈到我的籍贯是江苏，童年生活在保定，“七七”事变后才举家迁到北京时，他便谈到保定有个莲花池，原是为北洋军阀头子曹锟修的花园，进而谈到曹锟用五千元银一

张选票的手段收买五百多名“猪仔议员”，贿选总统的丑史。毛泽东神态安详，谈笑自若，使我紧张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

毛泽东那时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很多，我们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入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九六〇年出版以后，毛泽东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阅读这一卷的英译本。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林克同志：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十二月十七日，他又写了一信，说：“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此外，毛泽东还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一些讨论形式逻辑文章的英译本。

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英译本时，毛泽东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英译本的文字比一般政论文章的英文要艰深些，生字也多些。但是，毛泽东不畏困难。一九五九年一月，一位外宾问他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他对我也说过，他“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还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带着字典，学习英译政论书籍

毛泽东说话，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我领读，他跟着读。有时，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请我听他的发音是否合乎标准，并让我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以便他掌握发音要领。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在我领读、解释字义和解释语法结构之后，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就补注一次。只是，由于他年事已高，视力减退，已不能用蝇头小字，而是用苍劲的大字作注了。

学英语离不开字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备他经常查阅。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都带着字典。考虑到他的工作繁重，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我常常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但是他往往还要亲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标和注解。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自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他多次要过各种辞典和工具书，如《英华大辞典》（郑易里、曹成修主编）、《汉英字典》（美国出版）、《英汉字典》、《现代汉英辞典》（王云五校订，王学哲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汉英大辞典》、《综合英汉大辞典》增订本（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八年出版）、《汉英分类词汇手册》（北京外国语学院编）、《汉英时事用语辞汇》等。对当时收集到的汉英辞典，他都不满意，曾希望能出版一部好的汉英辞典。至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盛谷人编，世界书局一九三五年出版）和《英汉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一九三九年出版）等。

为了学习英语的生活用语，毛泽东还阅读过《基础英语》和《中国建设》等。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间，他还要人把《初中英语》、《中级英语》课本、《英语学习》杂志、外语学院编的《英语》修订本、北京大学英语系编的《英语教材》和《英语语法》等图书送给他。

毛泽东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他非常熟悉，学习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句型变化和句子的结构以及英语词类的形式变化上。有些文章和经典著作，他学习过多遍。《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开始读第一遍；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开始读第二遍；一九六一年十月九日开始读第三遍。他反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记忆和加深理解。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的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他工作实在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广泛谈论其他问题

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毛泽东很喜欢谈论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面广，远远超过了语言的范围。即使在学习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时、他也十分注意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特别是当前的实际。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他读到英文本《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时，他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共产党宣言》序言中还有另一段话：“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以中国的情形来看也是这样，从清朝的康梁保皇派到袁世凯、北洋军阀时期的研究系（后来的政学系）、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张作霖、青海的五马……都被历史的进程扫掉了。唯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存在下来。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他读英文本《矛盾论》时，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具体分析了农业合作社存在的六大矛盾及其解决办法。他说：第一个矛盾是国家与农业社之间的矛盾，其中包括国家计划与农业社机动性的矛盾，农业税、价格与农业社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农业合作社与生产队之间的矛盾，农业社管理委员会权力太集中是民主办社的障碍，解决办法是给生产队一些有利于搞好生产的权力，例如，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开支）制度，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农副业生产管理、施行增产措施的权力；第三个矛盾是农业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矛盾，解决办法是农业社的积累与社员的收入要有适当的比例；第四个矛盾是穷队与富队之间的矛盾，解决办法是各负盈亏；第五个矛盾是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矛盾，解决办法是贫农不要占中农和富裕中农的便宜，对他们的意见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否则不利于贫农与中农的团结，不利于生产；第六个矛盾是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定期公布财务账目，干部参加生产，遇事及时同群众商量。后来读英语时，毛泽东还谈到，分配制度是关系到五亿农民的大事，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说是一盘棋，甚至半盘棋都谈不到。整社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整社是整不好的。

毛泽东在学英语时常探讨历史问题。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刊登了一篇论柳宗元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对我们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在这之前，毛泽东还谈到翦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他还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同年五月，毛泽东还谈到，他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他说，蒋介石集团本身的变化可以不写，但是蒋介石登台后的军阀战争要写进去。孙中山当临时总统，蔡锷反袁世凯，蒋桂之战，蒋冯阎之战等等都要写进去。

毛泽东还谈到他自己写的几首词的主题思想。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学英语休息时说，《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念奴娇·昆仑》这首词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的。

《菩萨蛮·黄鹤楼》是描述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潮起伏的苍凉心境。《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他还谈到《浪淘沙·北戴河》一词写作的缘由。他说，李煜写的《浪淘沙》都是婉约的，没有豪放的。因此，他以《浪淘沙》的词牌写了一首豪迈的词。

毛泽东在学英语时还经常纵论国际形势。他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对世界历史知识的熟悉，使他常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对未来表现出明晰的预见性。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戴高乐当政之前五个月，毛泽东就非常注意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他说，要继续进行观察。一九五八年五月戴高乐当政时，国际大多数舆论认为，欧洲的政局将向右转。但毛泽东明确认为，戴高乐当政有利于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一种特殊的休息

毛泽东学英语，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他常常说：“要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这里的学习固然是指读书，但也包含积极休息的意思。他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休息。一九五九年一月，他接见巴西外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

毛泽东经常在刚刚起床，在入睡之前，在饭前饭后，在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在多次攀登北高峰之后，他曾诵诗一首：“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在攀登莫干山时，他口诵《看山》诗一首：“翻身跃入七人房①（①指汽车。），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
上，随时都挤时间学英语。有时哪怕只有个把小时也要加以利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他先后
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的工作
很紧张，但在旅行中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二十一日，他巡视长江流域的湖北、安
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沿途参观工厂、矿山、学校、公社，大部分行程是乘汽车，每天都要乘车
六七小时，途中十分辛苦，即使如此，学起英语来仍很有精神。

使人难忘的是，即使在飞机上的短暂时间或者出国访问期间，他学习英语的兴致丝毫不减。一九五七年三
月十九日十一时至十二时，由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书写了元人萨都刺的《徐州怀古》词后，即学英语。
三月二十日十三时至十四时，由南京飞往上海途中，他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学英语；当飞机飞临镇江上空
时，他书写了辛弃疾的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楼有怀》，并向我解释了这首词的意思和词中的典故。这一
年十一月，他到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有时早上天色未明，他就让我同他一起学英
语。在会议期间，他的英语学习没有中断过。

毛泽东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也常常以学英语作为一种调节。例如，一九六〇年五月六日
至十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十二国、拉丁美洲八国等四批外宾后，多次以学英语作为休息。同年五月
二十七日，他在上海会见蒙哥马利，两人谈得很融洽，休息时又读了一会儿英语。

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逢先知)

毛泽东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历来反对死读书，
读死书。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
学习。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

读无字的书，即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这个思想，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的头脑里就已经
萌生。一九一四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整理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有这样一段话：“闭门求学，
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一九一七年夏，他邀同学肖子
升，利用暑假，以“游学”方式，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益阳、沅江、安乡五县农村，广泛接触社会生
活。一九一八年夏，又和蔡和森到湖南益阳、沅江、岳阳、汉寿等县农村进行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一九
一九年，他评论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思想界，在肯定其进步意义的同时，又指出那时的思想界“很少踏着人
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一九二〇年后，当他刚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所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比
起他的同代人如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是较少的。但是由于他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
会的了解，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能够很好地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
中的问题。在这个根本上，他是出类拔萃的。

毛泽东一生中做了大量社会调查，这对于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
革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大革命时期，他通过调查研
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作出了科学分析。在井冈山时期，通过农村调查，制定了井冈山土地
法。三十年代初，通过寻乌调查，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城镇商业、地主、富农的情况，提出一些解决富农问
题的政策。通过兴国调查，得出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占有情况的基本概念，解决了贫农、雇农的问题。通过
一系列农村调查，逐步形成了一套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正确政策。他还做了其他方面的一些调查，包括革
命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但是为了寻找一条
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曾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做了一次系统的经济问题调查，写出
《论十大关系》。六十年代初，为了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解决经济困难问题，亲自组织调查组，分赴浙
江、湖南、广东做农村调查。在这个基础上，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召开广州会议，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
作条例，为继续扭转困难局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大作用。

在这次广州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段他在作战中间做调查的故事。他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
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
查研究。在反对第二次“围剿”兵少的时候，很不好办。那个时候，我跟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
了一天，在山上一看，看到了左平，看到了很多地方。我说，彭德怀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一军团打
正面，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

毛泽东在总结他做调查研究的经验的时候说：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做周密的调查，是了解情况的最
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又说，他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

到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毛泽东在向社会做调查这个大学学校里学到许多无法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

毛泽东重视读无字的书，强调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是根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毛泽东常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军事家，并不是因为他读了多少兵法书，更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指挥打仗是靠《孙子兵法》，靠《三国演义》。据毛泽东说，那时他还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毛泽东所以成为伟大的军事家，最主要的是他有丰富的领导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他是从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人民战争的规律的，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毛泽东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如果没有他亲身经历的战争中的胜利和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长征，能写出来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为了系统地总结战争经验，军事理论书籍是不可不读的，他曾说，因为要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倒是逼他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①从一些材料来看，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一些军事理论书籍，包括《孙子兵法》等，主要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不仅是他个人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全党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他曾说过：一九二一年建党后，经过了十四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些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是写不出来的。^②

毛泽东在他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证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反复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

他常讲《史记》上写的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说明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际经验是不行的。战国初期，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幼读了不少兵书，谈起兵法，头头是道，连他父亲都难不倒他。但是赵奢认为赵括不能当大将。后来秦国攻赵，赵括接受兵权，打起仗来照搬兵书，结果被秦军围住，赵军四十万全军覆没。赵括自己也被射死。毛泽东还说，刘邦为什么能打败项羽？因为刘邦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屈原如果继续当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因为丢了官，才有可能接近下层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往往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才得来的。

毛泽东还进而说明，仅仅从读书不读书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他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当然，毛泽东也强调了没有文化的要努力学习文化，也讲过吕蒙读书的故事，讲我们的军事干部都要读书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

毛泽东认为，社会和自然界是一个大学校，那里面的东西——无字的书，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他说，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他的三民主义，不是从学校的书本里学的，而是在学校外面的大学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学问也不是在学校的书本里学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²⁶¹到的，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所看的事，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打仗，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和英国劳工运动，还了解了中国革命，后来写了许多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①

中国有两位杰出的古代地理学家深为毛泽东所称赞，一位是明朝的徐霞客，一位是《水经注》作者北魏的酈道元。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称赞徐霞客和酈道元？除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主要是因为他们经过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并且有新的发现，敢于否定书本上已有的定论，提出自己的科学论断。特别是徐霞客，二十二岁出游，三十年间，足迹及于十六个省区，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越过千山万水，克服千难万险，对祖国的山川源流、地形地貌、岩石洞壑、动物植物，直到民情风俗等等，做了大量调查和观察，给后世留下珍贵的地理资料 and 知识。他对金沙江是长江的源流的发现，否定了《禹贡》的“岷山导江”的定论，推倒了陈陈相因的旧说。徐霞客这种追求真理的实践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就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召开的那次广州会议上，在讲到做调查的时候，毛泽东说，他很想骑马跑跑两条大江（指长江、黄河）。一九六四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真的准备要去实现他的这一愿望，骑马沿黄河而上，直到黄河源头，对黄河两岸做一次系统的社会调查和自然考察。他还准备组建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地质的，搞历史的等。这件事以后虽然没有实现，但却说明了毛泽东追求实际知识、在广阔天地里读无字之书的强烈愿望，至老不衰，当年邀同学少年游学的赤子之心犹在。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送毛岸英上劳动大学的动人故事。毛岸英长期住在苏联，对中国的社会情况不大熟悉。他回国不久，毛泽东让他跟一个劳动模范一起劳动，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后来，又派他去参加上改，学习阶级斗争知识，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的特点；建国后，又让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接受战争考验。毛泽东一方面鼓励毛岸英用功读书，一方面鼓励他广泛接触社会，接触实际，接近群众，经受锻炼，学习实际知识的本领，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对毛岸英的这种要求、实际上也是广大青年的期望和要求。

早在四十年代，毛泽东在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又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践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毛泽东提出的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作者：徐中远

第01章 《红楼梦》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红楼梦》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红楼梦》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是写“四大家族”，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生命。《红楼梦》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读了《红楼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叫封建社会。

《红楼梦》（初名《石头记》）是毛泽东最爱读的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之一。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中，在谈到《红楼梦》时，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至多呢？他没有说。这说的是1964年8月18日以前，那么，从这往后，他还有没有再读《红楼梦》呢？如果有的话，又读了多少遍呢？读者对这些一定是很想知道的。这里笔者先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王行娟在她著的《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记述：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有时毛泽东写累了便放下笔，同贺子珍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谈论中，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一些争论。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一听，就反驳她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

《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他们就这样谈着谈着，不觉东方已经发白，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这段文字可以表明，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也就是早在1928年之前，就读过《红楼梦》，而且读得很为仔细，对书中的内容、人物、故事情节等都极为熟悉。

井冈山斗争之后的岁月、长征路上、延安时期，毛泽东有没有重读过《红楼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进城之后的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据当时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逢先知（从1950年冬到1966年夏，给毛泽东兼管图书报刊近17年）和我们的记载，毛泽东先后多次要过《红楼梦》。

50年代和60年代，逢先知的记载是这样的：1958年7月1日，主席要：《诗韵合璧》《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古诗源》《初唐四杰诗集》《楹联丛话》、《续楹联丛话》《西厢记》（戏本——王实甫本）

《红楼梦》（送原本《红楼梦》）

《金瓶梅》（送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注：于上午8时交高智。高智是当时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61年9月28日送主席：《文选》（胡刻大字本）共24册。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台湾中央印制厂影印）共2册。

1963年2月6日，主席要：《脂批红楼梦》《英语学习》杂志全套（7日送）

1966年夏往后，直到70年代，关于毛泽东要看《红楼梦》，我们的记载如下：1966年11月20日，送主席：《渔洋山人分甘余话》1—2册《钢罍斋随笔》（六、七）2册《越漫堂詹詹录》1—2册《狂言》1—2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4册1967年4月2日，送主席：《红楼梦》（2函共20册）

《清史稿》（9函共131册）

1968年7月11日，送主席：《红楼梦》（120回本）1—24册《红楼梦》（80回本）上、下册《红楼梦》（120回本）1—4册《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下册1969年9月28日，送主席：《红楼梦》道光壬辰版1—24册《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24年版2函16册1970年6月27日，送主席：《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1—4册《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2年版1—2册《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26年版1—16册《石头记》（120回本）4函32册《增评补图石头记》（120回本）4函32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商务印书馆影印）1—8册1971年6月9日，送主席：《增评补图石头记》（商务印书馆版）1—16册《增评补图石头记》（道光壬辰刻本）1—16册1971年6月10日，送主席：《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戊戌石印本）1—16册1971年8月4日，送主席：《红楼梦》（道光壬辰刻本）1—24册1972年5月24日，送主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1—4册1973年3月9日，送主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1973年4月4日，送主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1973年5月26日，送主席：《红楼梦》等4种新版古典小说各1部以上多次送给毛泽东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除少数的读后让我们退还有关单位外，大多数都一直放在他的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我们在整理翻阅他故居里的全部图书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的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红楼梦》，还有各种平装本《红楼梦》。笔者曾作过一次统计，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不同版本的线装本《红楼梦》一共有20种之多。这20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毛泽东生前有没有一一读过，我们还不能肯定。但这些书，每次都是他自己提出要看，让我们去借或购买来的。

这20种《红楼梦》是：《增评补图石头记》（木刻大字本）4函32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1函8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6回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函8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80回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函8册《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1—12册《戚蓼生序本石头

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2函20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1函8册《原本红楼梦》有正书局版《红楼梦》道光壬辰年版1—24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下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乾隆甲戌16回本）中华书局1962年版1—4册《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适评）1961年版1—2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俞平伯评）中华书局1962年版1—4册《全图增评石头记》上海求志斋光绪戊申年版1—16册《原本全图红楼梦》1—16册《绘图评注石头记》（王希廉评）道光壬辰版1—2册《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台湾中央印制厂影印）

1—2册《增评补图石头记》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1—16册《增评补图石头记》道光壬辰年版1—16册《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戊戌年上海石印1—16册还有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内有关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平装本《红楼梦》。

以上的统计，还是很不完全的。这些不同线装版本的《红楼梦》，差不多都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游泳池住地卧室里还摆放两种：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8册）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1—32册）本。这两种，他都有圈划。我看到，放在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和卧室里的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有的是用黑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划，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这些都可以说明，晚年的毛泽东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在这之后，又至少10次向我们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他晚年的书库里、会客厅里、卧室里一直放有20多种不同版本的线装大字本的《红楼梦》，书就放在他身边，随时都可以翻阅。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如果要问，毛泽东生前读《红楼梦》究竟读了多少遍，这是他本人也很难说清楚的。反正书中的主要内容，从场面描写到人物对话，从情节到结构，从人物到主题，甚至一些诗句、警句，以及大观园内的许多生活细节的描写，例如，像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的描写，贾琏从尤二姐那里回去的时候，说“跨马认镫而去”的话，等等，他老人家都记得很熟，常常脱口而出，自如引用。毛泽东生前常同人谈起《红楼梦》的一些细节的描写。如1951年秋同老同学周世钊的一次谈话中就谈到，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环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描写。类似这样有关《红楼梦》具体细节描绘的谈话是很多的。这一小小的侧面，也能说明毛泽东对《红楼梦》读得很熟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爱读《红楼梦》？笔者认为，第一，因为他推崇《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他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很为欣赏。毛泽东认为，《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他在他写的文章和与人谈话中多次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来说明现实问题。例如，在1957年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特别是王熙凤说过的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很感兴趣，在提倡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时候，曾多次引用这句话。1958年，在成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还用丫头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作者曹雪芹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通过对清朝乾隆时代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由盛到衰的真实生动的细腻的描绘，成功地刻画了几十个封建统治者和数百个奴仆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通过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对叛逆者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描写，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同类作品中更为突出。毛泽东爱读《红楼梦》，这与《红楼梦》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独到的艺术成就是不能分开的。第二，是因为《红楼梦》在揭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的同时，体现了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及其作品《红楼梦》，同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一道体现了古代的“民主文学”的传统。

【1958年8月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载《红旗》1958年第7期）一文时加写的话】所谓民主性就是“不满意封建制度”，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对宗法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特别是妇女，表示了莫大的同情。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说贾宝玉是同情被压迫的丫环的。1962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而《红楼梦》就不同，写有点希望么。例如对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的逆子的描写，虽然他没有能够逃脱被压抑而最终走向虚无的悲剧性的命运，但作者曹雪芹的民主倾向和萌生的深情希望渗透在字里行间。这是《红楼梦》区别于其他古典爱情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之所以爱读《红楼梦》，这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是要通过读《红楼梦》来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红楼梦》所描写的是清乾隆年间，金陵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曹雪芹的笔下着重描写的只是贾府一个家族。透过贾府一家，看到史、王、薛各家，从贾、史、王、薛四家看到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宦之家”。就如同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中所说

的：“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曹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3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2页）通过读《红楼梦》，就可以从贾府衰败过程中一系列真实、形象、生动的片断画面来加深对封建社会的认识 and 了解。早在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毛泽东就提出，这是一部好书，现在许多人鄙视这部书，以为它写的是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毛泽东在1965年对他的表孙女王海容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1981年薄一波也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直到1973年12月21日，在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他又从《红楼梦》创作的动因和构思的角度，谈到它的历史主题：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贾雨（假语）材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红楼梦》除了具有上述的这些特色外，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他这样说：“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要认识和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当然重要的是要读历史，读理论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了解封建社会。但是，仅读这些书还不够，还应当读《红楼梦》这类描写封建社会阶级关系、人际关系和统治者与奴隶等人们生活面貌的文艺作品，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好、更细致地了解封建社会。事实证明，许多的文艺作品读后，能使人收到读理论书、读历史书收不到的效果。毛泽东爱读《红楼梦》，大概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吧。

毛泽东曾对《红楼梦》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是这样说的：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毛泽东这里把《红楼梦》作为我国文学的代表作，作为我国文学的主要的成就，固然是以幽默的语气谈及的，但他确实也从内心里因此引以自豪。《红楼梦》是我国文学的成就，也是世界文学的成就。其作者曹雪芹如同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法国的巴尔扎克、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托尔斯泰等一样，是他们各自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对于这样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名著《红楼梦》，毛泽东一直是读了又读，爱不释手。

毛泽东是怎样读《红楼梦》的呢？在管理图书过程中，我们知道，反反复复地读，是毛泽东生前读《红楼梦》的一种方法。他不仅自己反复读，而且还多次劝身边的同志、劝其他各方的同志要反复读。毛泽东是怎样反复读《红楼梦》的呢？这里先向读者介绍两则小故事。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起床之后，入睡之前，饭前或饭后，常到住地附近去爬山，他老人家游兴很高，一边爬一边与陪同在身边的同志谈笑风生。他对摄影师侯波说：“你现在看什么书啊？”侯波说：“《红楼梦》。”侯波当时很年轻，她的话音一落，毛泽东便接着问：“看得懂吗？”侯波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人熟了，说话也就比较随便了。因此，侯波随口答道：“看故事呗。”毛泽东对侯波的回答没有直接表示肯定或否定。毛泽东说：“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侯波回答说：“我一遍还没有看完哪。”“一遍没看完也没关系。”毛泽东看了看身边其他的同志，又接着说：“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把《红楼梦》当作故事看，这是看小说的初浅层次。对一般文化的读者也“只能看看故事”罢了。

还有一次，时间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指着在座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著名将领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①毛泽东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面对许世友，露着笑容。许世友以善战著称，习文不足，他对毛泽东给予的评价心悦诚服。

毛泽东的目光离开了许世友，提高话音对大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大声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听到许世友的话，毛泽东很高兴，说：“不怕啊！你就当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彭程、王芳：《中国七十年代政局备忘录》，《长河》1989年第1期）

上述的两则小故事中，对读《红楼梦》，毛泽东都说“要看五遍”。在其他的各种场合，他还多次说过“《红楼梦》最少要看五遍”。他是这样要求别人的，实际上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多次听他说过：“《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一遍又一遍地反反复复地读，这是毛泽东①《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刘元海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绛、灌，分别是西汉的随何、陆贾、周勃、灌婴。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她的妻子吕后逐渐掌权，大有以吕氏取代刘氏之势。吕后死，周勃与陈平采取措施除了诸吕，迎立刘邦之子代王刘恒为帝。周勃对巩固汉刘政权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读《红楼梦》的一种方法。直到晚年，他还常将身边放置的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参考读。其中有的版本，他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因为他读得多，所以对书中的人物、故事等都很熟悉，许多精彩的内容、富有哲理的语言，还有许多的诗句，他都记得烂熟，能脱口而出，引用自如。从50年代开始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陈秉忱生前曾多次向我们谈及他的这一特点。陈说，在“三反”的时候，毛泽东常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陈还对我们说过，毛泽东在访苏的时候，还用林黛玉说的一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报告、谈话、讲话中看到，毛泽东很习惯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故事、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思，引用最多的大概就是《红楼梦》了。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反复读《红楼梦》，不是仅看书中的故事、语言艺术，而更重要的是看阶级斗争，看政治斗争，看社会历史。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种主要方法。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红楼梦》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过：“《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中，毛泽东又说，《红楼梦》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1967年10月12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不了解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小说了，它进到了读小说的更深层次。也是对读小说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人的读小说，只注重小说本身的人物、故事等情节的描写。如果把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等内容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透过小说描写的字里行间看到一定的社会、历史，从历史的视角来读小说，这对读者的要求也就更高了。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是什么意思呢？笔者的理解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应当弄清楚《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把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思想与历史背景紧密的联系起来，把书中的内容当作形象的历史来读。通过阅读，透过故事，明白事理，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

对《红楼梦》的写作背景，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的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把曹雪芹和小说中的人物与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也是形成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命运的历史背景，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对封建社会来说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必然要影响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这部大作时的思想倾向，使其形成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因此，1964年8月，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刘汉民编写《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封建社会制度必然要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红楼梦》则是借一家一族的衰败展示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客观必然性。封建制度的“天”是无法补的，曹雪芹主观上想“补”也是不可能的。作者主观上的希望和封建社会家族必然衰败的客观结果的矛盾，《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等萌生的新的希望和他们无法摆脱封建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的束缚还是以悲剧性命运告终的矛盾，这两方面的矛盾在《红楼梦》中通过一件一件的具体事实和一个个的故事、一场一场的人物活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从文学作品的意义上来说，《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佼佼者。从时代背景思想内容上来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26页）“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它又是一部历史小说和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所以，毛泽东一直把《红楼梦》当作“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来读。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第二个意思，是通过读《红楼梦》来了解封建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的阶级斗争的情况。《红楼梦》不是直接描写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的专著，它主要描写的是封建社会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内部的冲突及其周围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曹雪芹创作这部小说时，

在取材和构思上，并非是着眼于阶级斗争。但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其阶级等级和身份也就是“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是泾渭分明的。“四大家族”衰败过程中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小说中也是很为明显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读《红楼梦》，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对《红楼梦》里写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多次谈及。早在井冈山时，他就说过：《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贺子珍的路》，第115页）在延安时，毛泽东一次与身边的同志谈读《红楼梦》时，他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1954年3月10日，毛泽东又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中还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是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页）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后在岸上休息，问在身边的薛焰：“最近读过些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说：“这是一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一听，便认真地对薛焰说：“搞公安就不要看？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条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说到这里，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又接着说：“这里面有你们学习的，书内有四大家族，知道吗？。。”（薛焰：《光辉的形象，亲切的教导》，《广州文艺》1977年第5期）

说到《红楼梦》第四回中的“护官符”和这部书中写阶级斗争的事，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他又很有兴趣地把第四回的“护官符”背了一遍，引以为证。对《红楼梦》第四回中描写四大家族的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他记得很熟，和身边的同志谈《红楼梦》时，他常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笔者还看到，毛泽东在读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这几句话的天头上，他用黑铅笔划了三个大圈。在这几句话后：“雨村。。细问这门子，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护，俱有照应的”这一段文字旁边，他用铅笔都一一划了圈。毛泽东所以把第四回看作是《红楼梦》全书的纲，大概也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和统治秩序的形式和法宝，封建统治者就是利用这一法宝来剥削、欺压平民百姓，来剥夺和占有奴隶们用汗水和血创造的财富。这个“纲”最能体现作品的主题并能引导读者透过文字的表面看到问题的实质。抓住了这个“纲”就是抓住了“阶级斗争”，就是抓住了作品的主题，就等于掌握了理解整个作品的钥匙。所以，毛泽东读《红楼梦》很关注这个“纲”，他与人谈《红楼梦》时谈得最多的大概也是这个“纲”。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谈《红楼梦》，来理解《红楼梦》，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独到之处。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还有一个意思，是通过读《红楼梦》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也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读《红楼梦》。《红楼梦》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细节的描写不是很多，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谈到：“《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中，当然也包括经济的统治。封建地主阶级对平民百姓和奴隶们的剥削、侵占等主要的表现也应当是在经济方面。然而，《红楼梦》中“写封建剥削只有一两处”。这是因为作者曹雪芹的形象构思和艺术描绘的着重点不在这个方面。尽管作品中关于经济问题的描写不是很多，但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也都一一注意到了。对于这一点，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有关谈话中有所谈及。根据当时有关人员的记录，毛泽东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读文学作品，对类似这样的话，人们一般是不太关注的。读《红楼梦》时，除专业研究人员外，一般人员对上述有关土地买卖的话也是不会关注的。然而，毛泽东却注意到了有关的话，还能够随口背出来。由此可见，毛泽东读《红楼梦》与读马列著作、读历史著作、鲁迅著作一样，是一丝不苟的。说到毛泽东从经

济这个视角来读《红楼梦》，笔者再介绍一点至今还鲜为人知的情况。我们管理的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中，有一本《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作者在本书卷首语中说：“这是一本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本书第七章新索隐（三十三）对《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红帖上贡物曰‘玉田胭脂米二石’。”第七十五回，“贾母问有稀饭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贾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姐儿吃去。”作者对其中提到的“胭脂米”做了考证。作者一共摘引了四种古籍中的有关记载，这里笔者照原书抄录如下：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云：浙、闽总督范公时崇随驾热河，每赐御用食馔，内有朱红色大米饭一坛，传旨云：此本无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两根苗，穗迥异他禾，及登剖子，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御园，今兹广获其米，一岁两熟，祇供御膳。

此康熙时人记康熙时事；后如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六页十一亦云：康熙二十年前，圣祖于丰泽园稻田中，偶见一穗，与众穗迥异，次年命择膏壤以布此种，其米作微红色，嗣后四十余年，悉炊此米作御膳，外间不可得也，其后种植渐广，内仓存积始多。世宗时河东总督田文镜病初愈，尝以此米赐之，作粥最佳也。

记此最详者当属康熙《御制文集》四集卷三十一页十，有一段云：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谷种，岁至九月始刈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谷种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岁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四十余年以来，内膳所进，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中略）曾颁种与江、浙督抚织造，令民间种之，闻两省颇有此米，惜未广也。朕每饭时，尝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永宪录》卷一页三十二一条云：其供御膳曰御稻米，出京师西山，颗粒长巨味香，更有一种可长成树，每年结实，其色鲜红，品又□（缺字）御稻上。是年（按康熙六十一年）冬曾以示大臣，分赠之，则往籍所未闻者。——乃种于御苑——云：树上天生者白如粘米，与朱红分两种。

当然是“一云”之说分红白两种为是，因康熙自记赠督抚织造者即红米，而非树上生也。《张文端公全集》卷七页五十二云：“集畅春苑，谢赐御谷种。公同诸大臣具奏恳恩颁给广种，奉旨每人给二石，赴瀛台领讫，具奏谢恩。”可见织造曹家确曾与诸大臣领此米种，雪芹非夸又明。然观其一年之间，仅获二石，红粥一碗，丰餐凤姐，则其珍罕亦可见矣。景梅九《石头记真谛》卷上页七十一云：“惟御田胭脂米为丰润县所产，据友人云：‘共四十八顷，其米长寸许，红色，在前清纯系贡品，庶民不得尝云。’其意盖以此证明《红楼梦》所写为皇室也；不知曹家食用，多同内庭，已见上举。。。其米盖玉田种，后始产于御苑，雪芹作‘玉田胭脂米’，亦当日实名也。胭脂米，俗名‘红梗子’，色粉红，作粥饭入口有异香。”

对“胭脂米”这一段考证文字，虽然都是6号宋体字印的，字都很小，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划。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了，对与《红楼梦》有关的“胭脂米”这样的考证文字，看得这样仔细，看得这样认真，可见他对《红楼梦》中有关经济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毛泽东爱读这一段考证文字及其所作的种种圈划符号，这是毛泽东从经济的视角读《红楼梦》的一个佐证。总之，《红楼梦》包含的内容是极为深广的，既描绘了封建家族一段家庭和爱情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又写了封建家族内部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阅读这部小说，既可以看书中描绘一个个生动、细腻的爱情故事，又可以看封建社会的历史，看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

我们从毛泽东读《红楼梦》的实际情形和有关读《红楼梦》的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几十年中，毛泽东读《红楼梦》主要是把它作为“很精细的社会历史”来读的。通过一遍又一遍地读《红楼梦》，从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衰败的过程中，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认识和了解明末清初这一段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把小说当作历史读，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是这样读小说的。恩格斯早在1884年4月初《致玛·哈克斯奈斯》的信中就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463页）列宁也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历史上的著名的作家，其主要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这三部长篇小说，都是通过历史事件、家庭关系以及地主和农民间的矛盾，描绘沙皇俄国的社会生活。列宁把托尔斯泰看成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把他的小说都当作历史来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读《红楼梦》不仅仅是从历史这一个视角，他对书中典型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运用等也很有兴趣，很为关注。大概就是因为每次都是从不同的视角去读《红楼梦》的，所以，他每读一次，就有一次收获，越读越爱读。

毛泽东读《红楼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能随时结合书中的人或事，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来说明一些实际问题。例如，195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接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中有两个主角，我看都不太高明。贾宝玉是阔家公子，饮食起居都要丫头照料，自己不肯动手；林黛玉多愁善感，最爱哭泣，只能住在大观园的潇湘馆中，吐血、闹肺病。这样的人，怎么能革命呢？你们办学校，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需要坚强的青年，身体和意志都坚强的青年。”（《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说到毛泽东读《红楼梦》，这里笔者向读者介绍一点毛泽东批注《红楼梦》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的《红楼梦》，我们知道的线装版本就有20多种。毛泽东辞世后，在整理他的图书时，对这20多种版本的《红楼梦》，笔者都曾逐一翻阅过。其中只有两种版本用铅笔圈划过。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函8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4函32册，木刻本）。这两种《红楼梦》，有不少的文字旁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划了道道，有的是划了圈，还有的是似断句的标点。这些道道、圈圈、点点，都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随手所划的，圈划的时间大概是50年代中后期或60年代初期。除这两种版本外，其他的版本都没有圈划。圈划是阅读的标志。但是没有圈划的不能说他就没读过。因为我们知道，他读过的许多图书都没有圈划的标志。毛泽东很爱读《红楼梦》，也很爱谈《红楼梦》。可是，我们保存的毛泽东生前阅读批注过的上千册的图书中，批注的《红楼梦》我们没有见到过。是毛泽东读《红楼梦》没有写批注呢？还是写了批注的流失在外呢？现在还难下断语。

毛泽东生前不仅爱读、爱谈《红楼梦》，而且也非常关心《红楼梦》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工作。

说到毛泽东关心《红楼梦》的学术研究，我们还是从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谈起。这封信，毛泽东是这样写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导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135页）

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虽然没有公开，传达的范围也很小。但是信的精神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向理论界、学术界、艺术界宣布了。

这封信开头提到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54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第9期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篇是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都是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评论的观点的。

李希凡、蓝翎的这两篇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文章，毛泽东详细阅读过，差不多从头到尾作了圈划，一些地方还写了批注文字。毛泽东认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本文作者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写的批注是：“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文章中有四五处毛泽东还划了问号。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文史哲》发表后，《文艺报》第18期被指定转载时还加了编者按。《文艺报》编者按写道：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还写道：“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这个编者按，毛泽东逐字逐句阅读过。他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用铅笔重重地划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分别批注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李希凡、蓝翎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摘引了俞平伯的关于文学批评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

凉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4月出版的《红楼梦辨》中卷第21页，这段话是这样写的：“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不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俗语所谓‘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这一段话旁边写的批注是：“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李、蓝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读了这一段话之后写了一条批语：“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光明日报》发表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时，也加了按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这个按语，毛泽东读后很不满意。他在阅读李、蓝文章时，针对这个按语挥笔写下了一些批注：“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等等，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对《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两个编者按为什么都不满意呢？

主要是因为当时这两种报纸对《红楼梦》研究的新旧两种观点，对“小人物”和“权威作家”轻此重彼的不同态度造成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俞平伯撰著的《红楼梦研究》，棠棣出版社早在1952年就公开出版了。其《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他研究成果的基本总结，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也发表了。《文艺报》1953年第9号在“新书刊”一栏特意向读者推荐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推荐语中写道：该书“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而在这之前，即1952年11月，白盾写了一篇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题目叫《〈红楼梦〉“怨而不怒”的吗？》。这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寄给《文艺报》后，很快就被退回来了，该报的退稿信中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该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缺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等等。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他们起初是寄给《文艺报》的，被置之不理，后来在他们母校老师的支持下，才在校刊《文史哲》上发表。有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主要是因为“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实现。因为有这样的具体情况，再加上《文艺报》对批评俞平伯持保留态度，《光明日报》把李、蓝的批评文章仅仅看作“不成熟的试作”，所以，毛泽东读了《文艺报》和《光明日报》上述的两个按语很为不满，因此，在阅读李、蓝上述两篇文章，含情疾书，写下了上述的一系列批语。

50年代，或者说在这之前，毛泽东对《红楼梦》学术研究的关心，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关注，并非是只是读了《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与两报转载的李、蓝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笔者知道在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图书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红楼梦》著作。这三种著作是：《红楼梦辨》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论〈红楼梦〉》何其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这三种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毛泽东圈划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划，不少地方，除批注、划道道外，还划上了问号。后来，笔者在整理图书工作中，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划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他看起来很不方便。身边的同志根据他的要求和以往的做法，就将这部原一大厚本重新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这部《红楼梦辨》，毛泽东批注、圈划的情形是怎样的呢？这里笔者向读者简略地介绍如下。

重新改装本第一册，包括原书的：顺序引论上卷（一）论读书底不可能（二）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三）高鹗续书底依据重新改装本第二册，包括原书的：上卷（四）后四十回底批评（五）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中卷（六）作者底态度（七）《红楼梦》底风格重新改装本第三册，包括原书的：中卷（八）《红楼梦》底年表（九）《红楼梦》底地点问题（十）八十回后底《红楼梦》（十一）论秦可卿之死（附录）

重新改装本第四册，包括原书的：下卷（十二）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十三）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

（十四）《读红楼梦杂记》选粹（附录）

（十五）唐六如与林黛玉（附录）

（十六）记《红楼复梦》（附录）

（十七）劄记十则（附录）

毛泽东读得最多、批划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这里笔者就着重介绍这一册的批注和圈划情况。这一册的封面上，毛泽东的批注文字是：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毛泽东为什么说《红楼梦辨》的“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呢？我们还是先看毛泽东在本书“第六、第七节”上的批划情况吧。

本书第六节标题是“作者底态度”，就在这一节的第5页上，作者俞平伯写了这样一句话：“《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底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底性格，便可知道；并且还穷愁潦倒了一生。”毛泽东在“是感叹自己身世的”8个字旁边粗粗地划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第7页，在“一切叙述情事，皆只是画工底后衬，戏台上底背景，并不占最重要的位置”这句话旁边也划上了竖道，在与这句话相对应的天头上，毛泽东也用铅笔划了一个大问号。第8页开头的一句“《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毛泽东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划上了竖道，而且还划上了问号。第9页“或由于往日欢情悉已变灭、穷愁孤苦不可自聊，所以到年近半百才出了家”这一段文字旁边也粗粗地划上了道道，与这段文字相对应的天头上，也划了一个问号。第12页倒数第2行“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呢？“为十二钗作传”这6个字旁边，毛泽东用铅笔先划了一竖道，后又划了一个问号。第15页，“因此凡他们以为是宝钗一党的人——如袭人、凤姐、王夫人之类——作者都痛恨不置的。”毛泽东不赞成俞平伯的这种看法，在相对文字的天头上划上了一个问号。第15页：“既曰惋惜，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罢。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俞平伯的这段话，特别是前面的“痛骂”和后面的“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的说法，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在文字旁边都划上了问号。第16页：“况且那野史中，或诮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这一句话中的“或诮谤君相”、“或贬人妻女”10个字旁，毛泽东都划上了竖道，划上了问号。第17—18页：“既以为是人家底事情，贬斥诮谤自然是或有的；但若知道这是他自己底事情，即便有这类的事，亦很应该‘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啊。”这一段话旁边，毛泽东除划上道道外，也划上了问号。第18页，作者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从后四十回看宝钗袭人凤姐都是极阴毒并且讨厌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第七节“《红楼梦》底风格”。这一节，毛泽东划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划了七八个问号。如果说一个问号是表示毛泽东对原著的一个疑问，或者是毛泽东认为的一个错误之处，那么，这一节中毛泽东有疑问的或者认为有错误的地方就有30多处。这里笔者仅向读者介绍其中的几处。

就在这一节的开头，也就是这本书第21—22页，作者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划了两条粗道，然后又划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者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红楼梦》的极高评价：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等是相悖的。所以在这7个字旁又划道道，又划问号，表明他不赞成作者的评价的心理倾向。对这一小段的最后一句“不过是个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的评价，与毛泽东的评价：“《红楼梦》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等也是相悖的。所以，毛泽东在这12个字旁除划了粗粗的道道外，还连续划了两个问号，表明他对作者的评价是极不赞成的。

接着上述的这一小段，作者对《红楼梦》的一些评价，如：“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拾，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红楼梦》的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等等，这些评价，毛泽东也都用铅笔划上了粗粗的道道和问号。在这一节的第29页，作者写道：“《红楼梦》底篇章结构，因拘束于事实，所以不能称心为好；。。凡中国自来底小说都是俳优文学”，毛泽东对“拘束于事实”、“凡中国自来底小说都是俳优文学”等的看法，都划上了竖道和问号。对“都是”两个字，毛泽东大概是认为作者说得太绝对了，所以，他在这两个字旁又单独划了一竖道和一个问号。

第32页，作者写的一大段话：“《红楼梦》开罪于一般读者底地方很多，最大的却有两点：（1）社会上最喜欢有相反的对照，戏台上有一个红面孔，必跟着个黑面孔来陪他，所谓‘一脸之红荣于华衰，一鼻之白严于斧钺。’在小说上必有一个忠臣，一个奸臣；一个风流儒雅的美公子，一个十全的傻大爷；如此等等，不可胜计。。。雪芹先生于是狠狠的对他们开了一下玩笑。《红楼梦》底人物，我已说过都是平凡的。”从批划的几种符号来看，毛泽东对作者的这一段对《红楼梦》的看法是不赞成的。就在这一大段后边，作者还有一些看法和观点，如认为贾宝玉“不是社会上所赞美的正人”，“十二钗都有才有貌，但却没有一个是三从四德的女子；并且此短彼长，竟无从下一个满意的比较褒贬。”毛泽东在这些看法的文字旁边都划上了竖道道和问号。

第38页，作者认为《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作者还引了江顺怡的《读红楼梦

杂记》一书中的两句话：“《红楼梦》所记皆闺房儿女之语。。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毛泽东在“怨而不怒”和“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文字旁都划了竖道和问号。笔者根据批划的种种符号来分析，毛泽东对作者的这一观点是不赞成的。

第六、第七两节，毛泽东划问号的地方还有一些，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毛泽东说俞平伯著的《红楼梦辨》的“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七两节”。划问号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作者“错误思想”表现的地方呢？当然这还是可以继续探讨的。毛泽东的批注，也可以说是一家之言。学术研究是允许有不同看法的。红学研究已经形成了新旧红学家的不同观点。所以，对毛泽东的看法自然是可以继续讨论的。

除第六、第七两节外，后面各节，毛泽东也作了不少的圈划。这里，笔者仅向读者介绍如下的两处：第十节“八十回后的《红楼梦》”。第116页，原著作者写有这样一段话：“这个一年前的困难光景，到现在还是依然。宝钗底结局究竟原本是应当如何的，我可以说是无所知。依八十回底大势推测，宝钗似乎终于和宝玉成婚。但后来文情，有无局面突变这类事情发现，实在不能悬想。因为突变是没有线索可寻的，若线索分明，便不成为突变了。我想，如婚事将成，而局面突变，在文章上也是一格；但不知道八十回后有这么一回事吗？”

这一段话，原著上共有5行。就在这段话的上方，毛泽东划了一个大问号，在5行的顶部还画了一粗横线。这段话中的“因为突变是没有线索可寻的，若线索分明，便不成为突变了”一句旁边，毛泽东还划了一条粗粗的波浪线，句尾还划了一个大圈。问号、横线、浪线及圈圈等，都表明毛泽东对作者的说法是不怎么赞成的，至少是有疑问的。

俞平伯著的这本《红楼梦辨》，最后的附录，毛泽东也都看得很细。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似乎隐隐说前书（指《记红楼复梦》——笔者注）是‘寓意讥人’，是有‘违碍忌讳字句’的，虽不明说，却在对面含有这类的意思。这也可谓是妙解。可见《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

这一段文字，毛泽东读后，每一行都用铅笔划上了道道。这段话原书一共4行，在4行的顶部，还划了一横线，横线上还划了一个大问号。这问号、道道，与前面的意思一样，至少是说明毛泽东对作者的这种说法是不赞同的。《红楼梦辨》这部书，毛泽东批划的地方还有许多，笔者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红楼梦辨》是1923年出版的。1954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多年来，很多人研究《红楼梦》，并没有真懂。它是讲阶级斗争的。（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1979年第2期）陈秉忱曾对笔者说过，50年代年，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曾把精装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本一本重新改装过。（去掉精装本硬皮，把原一册分装成3册或4册，加上牛皮纸封面——笔者注）《红楼梦辨》的改装本式样与此也差不多。所以，笔者认为《红楼梦辨》改装本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批注的字迹，也像似50年代写的。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批读《红楼梦辨》的时间，笔者认为，是否应当在50年后期以前。因为在这以前，毛泽东已经批读过《红楼梦辨》和其他有关的研究、评论《红楼梦》的著作，对《红楼梦》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他看到1954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第9期和10月1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吻合自己红学观点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就很有兴趣。并由此于1954年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上面已经提到的那封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封信一开始就肯定李、蓝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后来，毛泽东一直很关注《红楼梦》的研究，有关研究和评论《红楼梦》的书刊，他是很爱看的。这里笔者再介绍两个例子：1962年4月14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了吴世昌的一篇题目为《脂砚斋是谁？》的文章。一个星期后，即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又发表了吴世昌的另一篇题目为《曹雪芹生卒年》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均选自吴世昌的《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这篇长文，“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的两节。“东风”副刊发表时在文后特意加了一个小注，说明这个情况。吴世昌当时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这两篇文章，连同文后的小注，毛泽东看得很仔细，看后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经与《光明日报》社的同志联系，真的确有全文。吴世昌的这个全文是刊载在《光明日报》社编印的一份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充一份。（黎丁：《毛主席和〈东风〉》，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难忘的回忆》，第236—237页）看了节选的文章，还一定要看全文，这说明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不是一般的关注。

说到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的关注和熟悉，还有一个事例，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那次谈话中，对《红楼梦》研究的发展轮廓，他还作过一段独自的评价。毛泽东是这样说的：《红楼

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1页）这段话从《红楼梦》谈到“红学”，谈到新旧红学家，这在当时的红学界，可能还是第一次。这次谈话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红学研究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之前，已经非常用心地阅读过这些红学家的著作和有关他们的“红学”研究与评论文章。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50年代改名《红楼梦研究》），毛泽东阅读批划的情况笔者在前面已经介绍了。

王昆仑的“红学”研究的著作有《红楼梦人物论》。他的这部人物论，是他解放以前的研究成果，1962年重新修订，在《光明日报》上逐篇连载，显然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36页）“何其芳也写了个序”，这个“序”是指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的一篇长序。从毛泽东上述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显然读过这篇序。何其芳还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力作：《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何其芳在本书的序中说：“《论〈红楼梦〉》是我议论文字以来准备最久、也是写得最长的一篇。从阅读材料到写成论文，约有一年之久。”本书毛泽东看得很细，从序到注释的文字，他看后都留下了许多批划的标志。

吴世昌对《红楼梦》的研究，主要是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证方面。其代表作是《红楼梦探原》和前面已经提到的《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他是当时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一位红学家。所以，毛泽东把他列入新红学之列。

蔡元培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先驱。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代表作有《石头记索隐》。他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属于“索引派”。所谓“索引派”，就是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他认为，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必然能在历史上检索出来。他研究的结论是：“金陵十二钗”写的就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这种研究《红楼梦》的思路毛泽东是否定的，毛泽东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

胡适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是《红楼梦考证》。他的“新红学”观点，毛泽东说“比较对一点”。所谓“比较对一点”，最主要的是“新红学”认定该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划清了考据同附会、猜谜的界限，把《红楼梦》的研究扭转到了着重考证作者生平、家世、版本和研究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上来。这样研究《红楼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所以，毛泽东把胡适和俞平伯、王昆仑、何其芳、吴世昌都称为“新红学”的代表。毛泽东读过的“新红学”和“旧红学”代表人物的著作，连同他读过的各种版本的《红楼梦》，现在都还收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毛泽东爱读《红楼梦》，爱读《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一直有他自己的看法，特别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读《红楼梦》，来研究《红楼梦》，来评价《红楼梦》，这在我国“红学”史上可能还都是第一次。毛泽东对新、旧“红学家”都曾给予评价，但是对他们都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是有看法的。所以，他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积极提出和阐明自己对《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把从胡适到何其芳这些红学家，都称为新红学家，但一次也没有谈及他自己。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红学家。

第02章 《水浒》

《水浒》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描写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古典小说。《水浒》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水浒》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水浒》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水浒》里梁山泊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水浒》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江青在学大寨会上的讲话是放屁，完全文不对题。

《水浒》是我国流传最广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它也是毛泽东很爱读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一遍又一遍地读过《水浒》。“那时，乡间能够借到的书，多半是些民间流传的旧小说。当他阅读《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这些小说的时候，常常被一些生动的斗争故事所吸引，一遍又一遍地读，一直要达到熟悉这些故事情节和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才放手。”（周世钊：《少年毛泽东的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说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爱读《水浒》等古典小说的事，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同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样说道：“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

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毛泽东自己曾回忆说过，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是《水浒》。对这部生动地描写农民起义造反的英雄群像的古典小说，他不仅自己爱读，在他主持新民学会期间，还建议过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

毛泽东对《水浒》这部小说的兴趣，可以说贯串了他的一生。

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岁月里，毛泽东常常津津乐道地谈论《水浒》和宋江造反的故事。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尽管生活环境非常艰苦，甚至饿着肚皮，《水浒》依然是他爱读的书籍之一。在长征途中，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毛泽东急于要找《水浒》一读。对此，当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黄友凤后来有过这样的一段回忆：毛主席喜好读书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在日行百里、饥困劳苦、战事频繁的长征途中也不例外。

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我们住进了一个地主的庄院。战士们高兴地聚在一起用歌声驱散着整日行军的疲劳。这时，主席走了过来，只见他环顾一下院子四周，把警卫员叫到跟前说：“小鬼，这家人看来蛮富有，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本《水浒》来，我想用用。”小战士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四处寻找起来。我们仍在院子里唱歌。突然，从主席房间里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大家惊诧地循声望去，只见那位找《水浒》的小战士提着个大水壶窘迫地站在主席面前，抓耳挠腮，主席单手叉腰，用爱抚的目光望着他，“我让你找本《水浒》，你给我找了把水壶，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尾嘛！”说完，主席自己又笑了。事后，主席专门把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叫在一起，就错水壶当《水浒》这件事让大家展开讨论，认识读书学习的重要性。

（《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这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然而它是毛泽东长征途中要读《水浒》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不少的书，特别是哲学方面的书读得尤多。也读过一些小说，例如：《南北宋》（上海大新图书社印行）、《昭君和番》（上海新文化书社版）、《康圣人演义》（大达图书供应社刊行）、《明末痛史演义》（赵焕亭著，上海鸿文书局1936年印行）、《崇祯惨史》（上海新文化书社刊行）、《施公清烈传》（周梦蝶校阅，大达书局1935年再版）等。延安时期毛泽东阅读过的图书，经过战争岁月的辗转，大部分都丢失了，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在管理图书工作中，对保存下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阅读过的图书是分外珍惜的。但从中笔者没有看到《水浒》这部小说。到目前为止，笔者也没有看到谈及延安时期毛泽东读《水浒》的材料，仅此，也不能断定：延安时期，毛泽东没有重读过《水浒》。

延安时期，毛泽东谈到《水浒》、谈论《水浒》的材料是不少的。他在讲话、报告和著作中，也经常引用《水浒》故事来说明深刻的道理，或者来印证阐发他的认识。例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中，曾以林冲打翻洪教头为例，来说明战略退却的必要性。他是这样写的：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曾借用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故事，来说明我们应当如何对付反动派。他把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他认为在野兽面前，我们“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他号召人们说：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中是屡见不鲜的。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丰泽园的书房里、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放有几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据逢先知同志当时的记载，1964年8月3日，主席在北戴河的时候，还要过《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他送给毛主席的是影印贯华堂原本。到了70年代，我们先后给主席送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按照当时登记的顺序，这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是：《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1——24册《水浒传》顺治丁酉冬刻本1——20册《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12册《五才子水浒传》上海同文书局版1——16册《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上、下册《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版1——4册《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66年版1——20册《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8册《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1——100册《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32册《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浒》，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线装大字本1——20册），他一直把它放在卧室里。

1964年8月3日，逢先知送给毛泽东的那部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贯华堂原本《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是毛泽东最喜爱看的版本之一。70年代，他还先后两次看过这部《水浒传》。一次是1971年8月3日，这天上午大约10点多钟，高碧岑告诉笔者，说首长要看《水浒》，要笔者赶快找出一部送去。高碧岑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一般干部。徐业夫生病后，组织上调他来接替徐秘书的工作。因为高秘书来到主席身边工作时间也不长，对主席读书的具体情况知道得也不细，所以这次主席要看《水浒》，他也不太清楚主席要看什么版本的《水浒》。我们给主席管理图书的时间也不太长。对主席读书的习惯和要求等我们更是知之甚少。不过《水浒》这部书笔者还是知道的，在学校里也读过。接了高秘书的电话后，我们很快在主席图书中找出一部平装本《水浒》。当时笔者头脑里想的只是“主席要看《水浒》，赶快找出一部送去”。所以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很快送到了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交给了高秘书。从游泳池回到笔者的办公室后，屁股在椅子上还没有坐稳，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来了。笔者一拿起电话，高秘书仓促的声音就传进了耳朵：“首长说他不是要这种版本的《水浒》，他要的是他几年前看过的线装本金圣叹批改的《水浒》。”当时，笔者只知道有《水浒》这部小说，不知道还有金圣叹批改的《水浒》。既然几年前看过，说明这部书可能还在他的书房里。放下电话，急忙到主席书库。因为主席要的是线装本的《水浒》，所以，笔者就径直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当时，主席的图书平装和线装是分开放放的。线装部分是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类，一类的图书大多放在一起。管理图书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这主要是为查找使用方便。《水浒》和《红楼梦》等这些历史小说，我们记得当时一共放了满满的两个书柜。为了查找方便，书柜外面我们分别都贴有标签，一看标签就知道柜内放的是什么书。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我们很快找到了放小说的书柜，打开书柜，从上往下一层一层查看。不一会就在这个书柜的底下两层看到了好几种版本的《水浒》。仔细一翻，还真有一种叫《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找到了主席要看的书，心中是很高兴的。在“毛主席用书登记本”上登记后，我们将它急忙送交高秘书。心想：“这下不会错了！”高秘书说：“你们送来正好，首长在等着看呢。”

第二次，是1972年2月1日，主席又要看《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实践，所以这一次就比较熟悉了。但是这一次又不同于上次。上一次主席指名要看的是这部书，看后也没再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这一次，笔者把这部书送给他之后，第二天晚上，徐秘书就告诉我们：“首长还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要找线装本，字大一些的。”毛泽东自己的存书中，还有几种版本的《水浒》，是线装本，但字都比较小。此情况向主席汇报之后，主席让我们再到北京图书馆或者其他的图书馆去找一找。

第二天，即2月3日，我们到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了一部线装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70回本，上海同文书局版，16册）字也比较大。巧得很，这部《水浒》也是金圣叹评点过的。我们又到首都图书馆借来一部《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2册）。后一种，主席翻看后第二天即2月4日就退回来了。前一种《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主席一直留在身边，默默伴随着他度过终身。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看过不少版本的《水浒传》，但是，他最爱看的版本，就要数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了。不过，主席对金圣叹“腰斩”《水浒》是不满意的，他说金圣叹砍掉《水浒传》的后半部分“不真实”。对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较详细地介绍。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因病逝世。1月8日，毛泽东亲笔签发了陈毅的悼词。1月10日下午，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的毛泽东穿着睡衣突然来到八宝山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从参加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又大病了一场。2月初，他身体还未康复，就要看《水浒》，看了《金圣叹批改水浒传》，还要看《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是受“武松打虎”、“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三打祝家庄”和“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等许多英雄的故事的吸引呢？还是对这位英勇善战、功绩卓著、大度豁达、爽直忠诚的诗友遭林彪一伙的迫害之死而心中不平、不安、不忍，同时又对陈毅深情地思念呢？是要看小说、读故事，重温历史呢？还是要借此消除心中的不安，调节一下大脑呢？这里笔者也是难于说清的。反正，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矛盾的，也是非常寂寞、孤独的。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喜爱读《水浒》，到了晚年，还兴味依然，一次又一次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水浒》。毛泽东在耄耋之年，多次颇有兴致地谈论《水浒》。直到1975年，因患老年性白内障眼睛不能看书了，在与身边同志谈到《水浒》的时候，他还侃侃而谈一番。

毛泽东对《水浒》为什么这样有兴趣呢？这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水浒》是一部与农村和农民的革命斗争有紧密关系的古典小说。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青少年时代差不多都是在农村度过的。走上革命道路以后,也是从解决农民问题开始的。1926年5月至9日,他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讲课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他关注和着重研究的问题也是农民问题。为了动员农民,组织农民,1927年1月,毛泽东在大革命高潮中用了33天的时间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在考察的基础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考察中,他看到不愿做奴隶的农民们纷纷起来造反、抗争的情景: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用绳子把劣绅们捆绑起来,牵着游乡;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他们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打翻了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被打破,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对一切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常”现象,毛泽东非常高兴地称之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毛泽东生在农村,长时期地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因此他很熟悉农村和农民的疾苦。他很憎恶当时那些草菅人命、欺压百姓等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理解农民,同情农民,对农民和农民运动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水浒》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描写反映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的小说。书中描写并且颂扬的一个个英雄人物,有打渔的,有种菜的,有打铁的,有卖膏药的,还有许多形态各异的被压迫的普通贫民百姓。书中的人物面貌毛泽东好像都似曾相识:他们反抗官府、劫富济贫的种种行为,毛泽东似乎也有所闻、也有同感、也曾有所实践;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谈话语,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愿望,毛泽东好像也都是眼见过、耳听过、心想过。对于这样一部与农村和农民有密切联系的古典小说,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和关注,这是非常自然的。毛泽东自己生前在谈到早年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对他产生的影响时说过:“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算是《水浒》了。“不过,《水浒》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9页)

第二、造反思想和反抗精神的共鸣。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具有造反思想和强烈的反抗精神。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有这样一段自我介绍:有一件事我记得特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了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进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认错。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下来了;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7—8页)

这段自我介绍,造反的矛头固然是对着他的父亲,但字里行间都显示出少年毛泽东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学校里,表现他勇于造反,敢于反抗,善于斗争的例子是很多的。

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从秋收起义到井冈斗争的岁月;从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诞生,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不失时机地用其智慧,奋力叩开关闭已久的中日、中美关系的大门,谱写出中日、中美关系历史上的新篇章。

《水浒》描写的是农民造反的传奇故事,书中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敢于反抗官府的诸多的英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如何由分散的单个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熊熊燃烧的燎原大火,直到最后完全被熄灭的农民反抗斗争的完整过程。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农民的起义,农民的反抗,都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必然结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水浒》中众多的农民造反,众多的英雄投奔梁山泊,铤而走险参加起义,这是“官逼民反”的历史必然,这是《水浒》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毛泽东所以爱看这部小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揭示的“官逼民反”的这一主题思想与毛泽东本人具有的强烈的反抗精神产生了共鸣。对书中许多的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等等,毛泽东是很敬佩和向往的。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编演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高兴地给编导们写了这样热情赞誉的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这出戏,是《水浒》的精髓,体现了作品强烈的反抗精神,受到毛泽东的赞誉,这是很自然的。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毛泽东还常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说成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1939年7月9日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

演讲)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谈自己的革命生涯,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还颇有感触地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最后他借用《水浒》的故事归纳成一句话:“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转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第58页)

第三,把《水浒》作反面教材。毛泽东晚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之余,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的岁月中,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水浒》。他不是为了寻求艺术的审美享受,也不是像少年时代那样追慕英雄造反的故事,而是把《水浒》作反面教材,通过阅读这部反面教材,使人们知道如何发展和保持我们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芦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1975年5月29日到9月底,在中南海给毛泽东读书)谈《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几部古典小说的时候,曾说过:“《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1974年在武汉读《水浒》时,毛泽东对张玉凤也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评〈水浒〉真相》,《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水浒》中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宋江招安投降,这是历史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历次农民起义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对于这一点,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就说过:“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5页)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夺取的政权,取得的胜利,能不能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不断前进,人民已经夺取的政权还会不会丧失,中国还会不会重蹈“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的历史覆辙,这是晚年的毛泽东极为关注而且一直在用心实践和探索的一个问题。在进城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饱含深情地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这段话,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一直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断地前进。那么,到了70年代,已确定为我们党的接班人的林彪叛国出逃,刘少奇早已含冤离世,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住进医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紧锣密鼓,他们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大力提倡“继续革命”,并要人们注意《水浒》中宋江的投降招安,导致梁山农民起义的彻底失败的这一反面教材,这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思想逻辑的。笔者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把《水浒》作为反面教材,其本意主要还是要人们从宋江招安投降导致革命失败的这一特定的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从而能够“继续革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

毛泽东把《水浒》作为反面教材来读,可能还有这样一个心理背景。我们知道,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接受招安,不是在当时客观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毫无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接受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的大好形势下自愿主动接受招安的。小说的这种描写,与毛泽东在60年代以后一直思考和忧虑的课题,是很为一致的。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而这一切,在当时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不少欺压迫害百姓大大小小的官僚,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毛泽东还联系到我国农民革命的历史,他注意到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在获得胜利以后,原来的革命者的革命热情往往就逐渐消退,革命意志往往就逐渐丧失,图安逸,求享受,直至最后完全违背原来革命的真正目标,以失败而告终。这样的历代革命的悲剧,会不会在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经过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的大地上重演?正是因为有这样特殊的心理背景,所以毛泽东把《水浒》后面的宋江招安投降的描写作为反面教材来读。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晚年爱读《水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部《水浒》,半个多世纪,毛泽东不知读过多少遍,也不知读过多少次,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等内容,他都熟记在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随口引用恰到好处。

毛泽东爱读《水浒》,这是很多读者都知道的。但是,毛泽东是怎样阅读《水浒》的呢?从少年时代到晚年,为什么他一直是常读不厌呢?对于这个问题知道的人可能就不是很多了。下面笔者就自己所闻所见,向读者作一简略地介绍。

据笔者所知，毛泽东阅读《水浒》，如同阅读《红楼梦》等其他的古典小说一样，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视角不同，对事物的看法、人物的分析、问题的研究等着眼点和结果就可能不同。由于阅读的视角不同，理解不同，收效不同，所以，常读常新，百读不厌。

那么，毛泽东是从哪些视角去阅读《水浒》的呢？

哲学的视角。从哲学的视角读《水浒》，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和评价《水浒》，这是毛泽东读《水浒》的一个重要特点。《水浒》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是小说中有许多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是毛泽东爱读《水浒》的一个重要原因。

《水浒》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是毛泽东很为欣赏的故事之一。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曾把这个故事上升到哲学高度来理解和评价。他在《矛盾论》中是这样说的：《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作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页）

1942年，毛泽东还指示延安平剧院根据他的这个论述创作了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建国后在一次省市书记会议上向人们谈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给人的启示时又说，“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了道路问题；“二打”分化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三庄联盟；然后是解决祝家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假投降，“三打”就成功了。（1959年2月在省市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陈晋著《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1957年11月上旬，在苏联莫斯科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将郭沫若、胡乔木及十来名工作人员请来一道吃饭。在饭桌上，在谈论三国和“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之后，毛泽东忽然问翻译李越然：“你读过哪些古书？”李越然回答：“《三国》、《水浒》。。”说到《三国》、《水浒》，毛泽东说：“《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他三遍，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水浒》里有辩证法，读《水浒》，主要是研究、理解故事里的辩证法，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水浒》的一大特色。

政治的视角。从政治的视角读《水浒》，从政治上来理解和评价《水浒》，这是毛泽东读《水浒》的又一个特点。

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从农村开始的。毛泽东最具独创性的工作，是从农民问题开始的。在进行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和关注农村工作和农民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农村问题和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早在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为了说明现实的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在讲课中反复用地主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来阐明中国的政治结构。当时，毛泽东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说明他的这个基本观点，当时他就举了《水浒》中农民造反起义失败的例子。他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即为农民利益，因为毛泽东在当时的表述中对无产阶级利益和农民利益还没有加以区分，他所表达的二者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笔者注），不容于现实社会，遂致失败。”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运用《水浒》故事来印证或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

《水浒》是毛泽东读过多遍并且十分熟悉的一部古典小说。他在讲话、报告和著作中时常引用《水浒》中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来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这一点，薄一波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建国以后，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掌握了国家政权，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形势下，《水浒》中英雄好汉们的造反斗争精神和行为模式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仍然还留有深深的印记。1956年2月20日，一次在听取工作汇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

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3页）1957年3月19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强调在新的工作中仍然要保持和发扬光大《水浒》中英雄们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他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0页）1959年夏庐山会议期间，一次在谈时社会上刮的“共产风”的问题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说道：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来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引注）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9页）毛泽东在这里把宋江等人取的不义之财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取的不义之财是一并加以肯定的。他认为这些做法是对的，都是义行。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农民们的集体财产如肥猪、大白菜等，要拿就拿，拿起就走，则是不对的。

毛泽东从政治的视角读《水浒》，事例是很多的。就拿重视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来说，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讲话就这样说过：《水浒传》里若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物，梁山的事就不行。又如，在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问题上，毛泽东也常常从读《水浒》中得到的启示。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他就联系到《水浒》。他说：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7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水浒》里物印象是多么深刻。毛泽东读《水浒》，别注意书中的一些细节和情节的描绘，善于从政治的视角分析人物和事物，从而有目的、有针对性引伸出一些有益于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工作方式、方法的视角。毛泽东读《水浒》，对书中的有关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的描写也是很为关注的。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经常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用《水浒》中谈及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来启发和教育人们，助人理解，使人受益。

1938年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在一次有关保卫工作中的讲话中，为了提高人们对做好保卫工作的认识，他不是侃侃而谈许多的大道理，而是用《水浒》中的有关故事情节，像讲故事一样来启发人们。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这像家常聊天似的，将深刻的道理寓于通俗的谈话之中，使人听起来感到亲切，入耳，入脑。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红军游击队里有的人在行动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往往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鲁莽处事，因此弄出许多错误。毛泽东把红军游击队里的这种人称为“李逵式的官长”。他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2页）

李逵是《水浒》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这里毛泽东把游击队里的这些人比作“李逵式的官长”，既有批评的意思——批评他们在行动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鲁莽处事；又有肯定的意思——肯定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的错误属工作方法的问题。这样的批评，通过《水浒》中李逵这个英雄人物来加以说明，寓批评于说理之中，这样就能使被批评者心服、口服，收到最佳的效果。我们从小小的事例中，也能约略看出毛泽东独特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政策和策略的视角。这是毛泽东阅读《水浒》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水浒》不是讲政策和策略的专著，但是，《水浒》中描写梁山农民的革命斗争，有的是很讲政策，很注意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很注意从政策和策略这个视角，采撷《水浒》中的有关的描写，融于我们的工作实际，启发和教育我们的同志。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其中的第七条主要是谈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他由此联系到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联系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秘密的斗争策略。毛泽东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

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什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61—162页）

说到毛泽东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阅读《水浒》，我们从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谈话中可以看得清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就用《水浒》上的例子加以说明。他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这里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三打祝家庄”，他颇有感触地说：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在谈到军队要尽可能扩大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这一政策时，他又想到了《水浒》里梁山泊的例子。他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哲学的视角，政治的视角，工作方式、方法的视角，政策和策略的视角，这是毛泽东阅读《水浒》的主要的视角。除这些视角外，还有社会历史的视角，经济的视角，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的视角，等等，这里不再赘述。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客观环境，不同的革命斗争和不同的工作实际，毛泽东阅读《水浒》的视角是不同的。《水浒》固然不是百科全书，但是，毛泽东能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去解释，去运用。因此，往往起到阅读其他政治、理论读物起不到的作用；收到阅读其他政治、理论读物收不到的效果。这是毛泽东阅读《水浒》的最根本的特点，也是毛泽东晚年爱读《水浒》的重要原因。

说到毛泽东晚年阅读《水浒》的事，自然就要说到毛泽东在1975年关于《水浒》的一段谈话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是这样的：《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写在前面。毛泽东的这段著名的谈话，不是毛泽东自己撰写而反复斟酌修改的关于《水浒》评论的专论，也不是“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意义”的最新指示，更不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的动员令。它是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平常的闲谈。据我们所知，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特别到了1975年下半年，他已经显得很衰老了。他说话已难听清了。那些日子，他日常的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看书，而且差不多都是倚在床上看书。看书看得时间太长了，工作人员就扶他在屋里走一走，或请他坐在会客厅沙发上休息一下。因为他终生酷爱读书，也很爱谈书和评书，所以工作人员扶他走动或陪他休息时，聊天和闲谈差不多也总是以书为话题，用书来引起他的兴趣，达到让他休息和调节的目的。这段有关《水浒》的谈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当时有关这段谈话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8月13日，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请来专门给毛泽东读书的芦荻老师来中南海已经两个多月了，由于经常给主席读书、和主席谈书，所以，她和主席也比较熟了，谈吐也就比较随便了。这天，芦荻老师和主席交谈中，她看主席谈兴很浓，就向主席请教了她曾研究和关注的《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我国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谈论这些古典小说，主席当然是很有发言权的，因为他读得多，了解的多。主席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小说，接着又侃侃而谈了《水浒》。和主席交谈，主席很喜欢提出问题。能提出问题，说明你入境了，说明你动脑了。主席也非常有兴致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芦荻来自教学第一线，又是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所以，她和主席交谈中，常向主席请教和提出一些问题，主席也很有兴趣回答她提出的问题。有时主席在回答之前，还常让她先说说对所提出问题的看法。在主席谈《水浒》中，芦荻借机向主席请教这样一个问题：“《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接着，主席便谈了上面这段后来发表的评论《水浒》的话。

毛泽东对《水浒》的这段谈话，当时没有录音，是芦荻后来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回忆整理的。对这件事，芦荻说：毛泽东评《水浒》，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意思。

既然是一次平常的闲谈，又“并没有别的意思”，后来为什么又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呢？风波又是怎样被平息的呢？

芦荻整理毛泽东上述对《水浒》的谈话，当天就传到了姚文元那里。这不足300字的谈话，引起姚文元的格外关注。他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在信中还提出把毛泽东的这次关于《水浒》的谈话和他的这封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宣传、理论、思想、教育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毛泽东的本来是一次平常的谈话，经姚文元这样与政治斗争与现实思想战线的斗争一联系，立即就成了开展评《水浒》运动的“最新指示”了。为开展评《水浒》运动推波助澜，姚文元在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还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量评论，几乎都是违背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把它算作“农民局限性”，这等于抹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起义和投降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因此，“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防修反修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姚文元的提示和引导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中央两大报刊先后发表评论文章。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题目是《评〈水浒〉》；1975年第9期《红旗》杂志短评的题目是《重视〈水浒〉的评论》；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题目是《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些文章紧按姚文元定的调子，大张旗鼓地弹唱起来：提出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以很快瓦解起义队伍的问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问题；提出评《水浒》是当前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等等。在姚文元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一场评《水浒》的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就这样一浪胜过一浪地蔓延开来了。

梦寐以求当女皇的江青，一看有机可乘，机不可失，最后也赤膊上阵了。1975年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她又别有用心地煽动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本来这次会议与江青没有什么关系，中央也没有通知她参加这个会议。可是她突然窜到大寨。会上，邓小平强调整顿，这是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江青则大讲评《水浒》，含沙射影攻击身患绝症一直住在305医院的周恩来总理，以及邓小平。9月17日，江青未经中央同意，就在大寨私自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清华、北大两校写作班子100余人谈话，又一次煞有介事地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江青还说：“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本来，这次会议主题很明确，可是江青偏要求在这次会上放她的与本次会议毫无关系的上述有关评《水浒》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使得会议难以正常进行下去。华国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针对江青的话说：“放屁，文不对题。”并指示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江青在学大寨会上的讲话是放屁！完全文不对题。”又对邓小平说：“江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你不必跟她计较。”（东方骥编《落日余晖——毛泽东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

这样，已经掀起的评《水浒》的一股逆流才告平息。

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水浒》，而且还劝别人读《水浒》。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时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1974年去武汉时，他还把他最爱读的那部影印线装本的《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带在身边，一边读，一边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说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论《水浒》。“如果抛开‘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背景，单只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来看，毛泽东对《水浒》的这些评论，和他对《红楼梦》的那些政治性评论一样，是别具慧眼的一家之言，

是从他自身的经验观感出发对《水浒》的一种评论。”（《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0页）也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是得当的，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的这些评论，“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70页）江青、姚文元之流，借机大做政治文章，完全是一种阴谋，妄图借机打倒周恩来、邓小平，让江青上台执掌大权，实现女皇美梦。

毛泽东不仅爱读《水浒》，而且也很关心对《水浒》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前，《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有关《水浒》的研究和评论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过。他的存书中，有一本《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编辑出版），这本书中茅盾著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毛泽东阅读的时候，还用黑铅笔在书上划了许多的道道。

据笔者的记载，毛泽东最后一次向我要《水浒》，是1975年8月22日，这一天下午，他指名要看《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一名《忠义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73年12月影印，每部两函20分册）。本来，这种《水浒》1973年12月14日我们已经送了两部给他存放在游泳池住地，可是，由于游泳池住地存放的书太多，当天他要看一时又找不出来，所以让我们再送一部给他。这时，他的一只眼睛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视力稍有恢复就要看书。这部《水浒传》大概是他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后要看的第一部书。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对《水浒》仍然是非常喜爱的。毛泽东这次要看《水浒》，是在与芦荻谈《水浒》后的第9天，而且是在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后视力稍有恢复的时候，是因为他对《水浒》的评论言不尽意呢？还是又有什么新的思考呢？反正他又一次要看《水浒》，而且要看的是100回本的。

说到这里，笔者又想到了与此有关的一件事。1975年9月8日上午，芦荻给我们打来电话，要找一本《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论文集》，说本书上有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芦荻还要我们找中央党校当时编的《关于宋江的历史材料》，教育部理论组编的《教育革命简报》增刊第8、9期（内部发行本），说本刊上有关于评论《水浒》的文章和材料。当天笔者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一本《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上有张政烺写的《宋江考》一文。中央党校编的《关于宋江的历史材料》和教育部理论组编的增刊也都分别向他们要来一份。晚饭后，书和材料一起交给了芦荻。1975年9月底，芦荻在离开中南海以前，她曾给主席医疗组的人员讲了怎样理解毛主席评《水浒》的课。她这次向我们借的书和材料，是她自己为讲课做准备的呢？还是主席要看的呢？还是主席另有什么意思呢？这些我们就不清楚了。

后来，笔者在毛泽东阅批过的书刊中，还看到过一本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1975年第11期）。这一期杂志上刊有署名为罗思鼎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篇文章的标题上方毛泽东用黑铅笔划了一个大圈，标题下面划了一条粗粗的浪线。本期杂志封面刊名上方毛泽东用红铅笔划了一个大圈。显然，本期杂志和罗思鼎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晚年毛泽东的注意。如果说毛泽东阅读过或者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过这篇文章，那也是1975年11月或者11月之后的事了。

第03章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三个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薄一波在《回忆片断》一文中写道：“毛泽东同志也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我国的不少古典小说他曾读过多遍，十分熟悉，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这些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三国演义》就是毛泽东很喜欢看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之一。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

本书叙述的故事是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开始，到王濬平吴结束。该书着重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其结构宏大，作者笔下描写的众多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叙述的故事文字通俗，情节曲折，虚（指作者的艺术创造）实相间，动人心魄，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的佳品。

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就说过，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爱看《三国演义》等传奇小说。对于这一点前

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除了他本人说的之外，我们从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读《伦理学原理》（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著）的批注中也能看出来。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第四章《害及恶》时所写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这段批注可以说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爱看《三国演义》。

如同《红楼梦》、《水浒》一样，《三国演义》也是毛泽东很为喜爱和很为关注的一部古典小说。

说到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喜爱，笔者先向读者介绍毛泽东自己曾讲过的一个故事。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转移到湘赣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毛泽东一到井冈山，立即带领部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在井冈山那段非常艰苦的岁月里，书刊是很稀缺的，毛泽东读书的嗜好是很难满足的。因此，一次打土豪的时候，毛泽东就特意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产了。”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对“抗大”三期二大队作的题为《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的讲话时，还津津乐道地给人们讲了这段趣事。在这次讲话大约五个月之后，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还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领开玩笑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毛泽东提倡读三部中国小说》，《山西日报》1984年1月9日）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是多么的喜爱。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和关注，同样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们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为这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古田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不是泛泛讲许多的大道理，而是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用这个故事来启发和教育大家。毛泽东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46页）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在讲话、谈话和做报告中，常结合《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来说明当时的实际问题。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到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在谈到审干问题时，他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很高度的原则性。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

建国以后，直到60年代，毛泽东还常引用《三国演义》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用他那独特的思维方法和独到的语言艺术，把自己置于听的人当中，平等相待，融为一体，因此，每次都能把深刻的道理用平常的言谈表达出来，收到新的效果。

1953年6月3日，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讲话中，在谈到必须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时，毛泽东向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故事。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说的：“《三国演义》中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一段通俗的故事，把要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干部不能搞论资排辈，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的重要道理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人物，其中诸葛亮是毛泽东非常推崇的，也是毛泽东在著作和讲话中常常提到的历史人物之一。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或像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我们的干部不要怕群众，不要脱离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页）《三国演义》里，作者笔下的诸葛亮能够呼风唤雨，料事如神，成了智慧的化身。对诸葛亮这样的人物，毛泽东的看法是：也不是“全人”，“总是有缺陷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

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说到50年代毛泽东在谈话、讲话中引用《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的事，当时任毛泽东国际问题的秘书林克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57年春季，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视察。3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书写了宋人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首词。写完后，围绕这首词的内容，毛泽东又讲了许多。在说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句时，毛泽东说是借引曹操的言语。接着，毛泽东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这里，毛泽东继而发挥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秘书工作》1993年第11期第26页）上面说到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的这句名言，毛泽东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很有兴致地一次又一次地书写。李锐也回忆说：“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笔者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号施令’，要‘三大元帅挂帅’，而引起经济形势的紊乱，他也不便于随意指责‘元帅’，搞乱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国演义》中蒋干过江的故事，那么‘元帅’会感慨得很：‘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我们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会议后期批彭德怀，他又用彭德怀比张飞：‘有张飞之粗而无其细’。可见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熟悉，时常信手拈来，皆成文章。”（《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7页）

《三国演义》描写的许多历史故事、战例，差不多都是取材于晋代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人们熟知的《三国志》，与司马迁著的《史记》、班固著的《汉书》、范曄著的《后汉书》齐名，合称为二十四史“前四史”。《三国志》中记载的三国时代的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通过历代“说书”艺人及其广大的听众的加工渲染，添枝加叶，使许多故事不仅流传广泛，而且具有了许多传奇色彩。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就是在这些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再加工、再创造。对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毛泽东曾有一段评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罗！”为了说明演义和真实历史的差别，毛泽东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37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7岁。”（参见陶鲁笏：《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载《党史文汇》1993年第9期）《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很爱读《三国志》。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中，这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两部书，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把它当作一部书来读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读“演义”，这是毛泽东晚年读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毛泽东晚年都读过多遍。这里，特向读者介绍一点笔者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建国以后，大约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离开北京中南海到外地去，总要带上一大批他爱看的或者是他常读的图书，《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史记》等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是必带的书籍之一。1958年11月到武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要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时，就带了《三国志》等一大批图书，会议期间，他在读《三国志·张鲁传》时还写了两段长长的批注。这在后面还要详细介绍。据陶鲁笏同志在《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一文中说，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即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本人，一共4人，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了一次座谈会，专门座谈陈寿撰著的《三国志》。35年之后，陶鲁笏回忆这次的座谈会时还很有感触地说：“原来我们都以为主席要座谈的是预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主席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在客厅坐定之后，一开头他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谈了他自己对《三国志》、《三国演义》和曹操等历史人物的看法。

说到毛泽东外出总要带上一大批图书的事，逢先知曾作过一次记录，这里，笔者把它照录如下：这里有一个书目，是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这是从当时我的登记本里照录下来的。读者可以从中间窥见毛泽东博览群书情况之一斑。10月23日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示要以下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全部。

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

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

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

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一些主要著作。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西洋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日本史。

《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朱熹：《楚辞集注》、《屈宋古音义》。

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絮》。

《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苏联一学者给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

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字帖和字画。

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8—20页）

从这份记录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博览群书的情形。记录中的“《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毫无疑问，包括《三国志》。《三国志》是毛泽东很爱读的、也是批划最多的史书之一。

1958年9月，毛泽东离京去大江南北视察，曾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并三次去过延安的张治中应邀陪同前往。在此次视察途中，一天，毛泽东正在火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成了东吴的统帅。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人民政协报》1987年1月6日，余湛邦文。）关于读《吕蒙传》，毛泽东还向罗瑞卿推荐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回到北京后罗瑞卿自己先很用心地读了《吕蒙传》，他还请人将其译成白话文，供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以此来激励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

据逢先知的记载，60年代，毛泽东先后两次要读《三国志》。一次是1960年4月20日，这次，主席要读《三国志》，逢先知送给主席的是标点本《三国志》。一次是1964年10月13日主席要读《三国志》，逢先知送给主席的除上次送的那部标点本《三国志》外，还有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全18册）。这部《三国志集解》，线装本、字也比较大，毛泽东非常喜爱，后来一直把它放在他的书房里，读了又读，上面还写了许多批语。有两处批语，至今还深深地留在笔者的记忆中。这两处批语的大概情形是这样的：裴松之在《魏书·武帝纪》一段注释中，引用了曹操于建安15年（公元210年）12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主要内容是叙述他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当时许多的心理活动，表明它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等三县，以消除时人对他的误会。卢弼对此除作了一些考证、订谬外，对曹操还提出了许多的指责。曹操在令中写道，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对此指责说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又写道，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卢弼对此指责这是“皆欺人语也”，并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还写道，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认为曹操的这些话是“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并在注中又列举了曹操打过的败仗。以上的这段文字，特别是卢弼的注，毛泽东看的很仔细，差不多都作了圈点。卢弼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毛泽东很不赞成，他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在读了卢弼的这段注后，毛泽东在书的天头上写了这样的一段颇有感慨的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据扫叶山房石印本《李太白全集》，“弥”应为“祢”——笔者注）衡。”此为近之。“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的诗句，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时代人，史籍说此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对这个人的才能不仅没有引以重视，而且还侮辱了他，因此被祢衡大骂。祢衡后被黄祖所杀。鹦鹉洲据说是祢衡曾在此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大概是因为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比较符合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在此特引了李白的这句诗。

毛泽东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

《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刘姓家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作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孟德是曹操的字。刘表在对待俘虏的做法上与曹操是大相径庭的。曹操所以能取得全局的胜利，这与他对待俘虏的豁达大度是分不开的。曹操“不杀降”，敢于用人，史书有不少的记载。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的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去后就没有回来。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他的性命担心。曹操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仅没有杀毕谌，反任为鲁相。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

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有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毛泽东的这条批语，既表明了他对刘表作法的蔑视，又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和爱才的称赞。

在《魏书·刘表传》中，卢弼也有一段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张恻平之”，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读了这段注释又在天头上写了一条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这里，毛泽东又一次称赞曹操。

毛泽东晚年读《三国志集解》写了不少的批注，许多的篇章他都圈划得密密麻麻。从中我们足以看出，他老人家晚年对《三国志》这部大作是很为喜爱的。

据笔者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笔者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他的《三国演义》，都是从中国书店新购买来的。我们还看到，毛泽东晚年游泳池畔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一种是上海涵芬楼（商务印书馆专贮珍贵图书的藏书楼名。该馆从清光绪末年即搜集南北藏书家散出的孤本秘籍多种，曾选取部分古书，编印为《涵芬楼秘笈等》）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是50年代陈秉忱从中国书店给毛泽东购买来的。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2月影印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两种《三国志通俗演义》，每部都是24个分册，因为字都比较大，毛泽东很喜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1975年8月中旬，大概是在给他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前，他还在游泳池畔的书房里与陪读的北京大学芦荻侃侃而谈《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李锐说：“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5页）“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这种攻击，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它从反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在十年内战时期，《三国演义》就已经读得很熟了。对于这一点，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67寿辰时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的谈话中，在谈到“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问题时，还颇有感触地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他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后来的几十年里，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年，他还很有兴趣地与身边工作人员谈《三国演义》。据笔者所知，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如同读《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一样，很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从不同的视角去说明实际问题，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特点，也是他阅读《三国演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毛泽东从哪些视角阅读《三国演义》的呢？

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的视角。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与一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的，也是时代的产物。就拿《三国演义》来说，书中描写的诸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虽然经过作者对历代民间传说进行精心地综合溶裁和再创作，但是字里行间仍然反映了动乱的三国时代的社会状况，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到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军事的矛盾和斗争。《三国演义》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封建社会中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社会背景和作家创作的主题思想是密切相联的。毛泽东认为，作家创作的社会背景必然要影响到作品的主题。阅读、研究文学作品，不可不重视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很注重考虑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并且把这一社会背景与作品的主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倾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对作者罗贯中是不是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各家更是各执一词。历史上不少文学评论家都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描写汉末至西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大乱到大治的历史过程的长篇历史小说，因此，要其不表现皇权正统观念是很难做到的，作者罗贯中“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创作主题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对古今一些文人学者的这种看法，毛泽东一方面是沿袭此说，一方面又有其独特的见解。就拿对曹操这个人物评价来说，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一个“汉贼”“奸雄”，这正是作者“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皇权正统思想的体现。但毛泽东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又有他自己的看法。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参见陶鲁笏：《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

1959年，一次在谈到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毛泽东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50年代有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与保健医生徐涛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孙宝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前面说到的毛泽东曾批阅过的《三国志集解》，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中有关曹操的内容，毛泽东作了许多圈划，写下了不少的批注文字。在《魏书·武帝纪》中，毛泽东圈划批注比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经历和战绩外，还有曹操所采取的政策。从这些圈划和批注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张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我们从毛泽东阅读批划过的鲁迅著作中还看到：1927年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其实，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50年代，毛泽东在读到这段话时，用红铅笔划上了粗粗的着重线，这一条条红线，把他与鲁迅连接到了在一起。对曹操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说毛泽东与鲁迅是相通的？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曹操不仅是一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的战功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给李敏、李讷的信中写到：“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李敏、孔令华主编《怀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曹操的诗作，毛泽东是很爱读的。在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期间，我们常常翻阅毛泽东阅读、批划过的图书。我们这样做，一是为了了解掌握毛泽东读书、批注的具体情况，二是为了熟悉毛泽东平常爱读的书。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做好为毛泽东的服务工作。当然，翻阅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如果说我们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化有点什么了解的话，这一时期的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在工作实践中的实习是极其重要的。在翻阅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过程中，我们记得有四种不同版本的《古诗源》，还有《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这些书上曹操的诗，毛泽东差不多都有批划。有不少的诗，如《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却东西门行》等等，毛泽东阅读过多次，每次阅读他都要在这些诗上圈圈划划。读一次，圈划一次，多次阅读，多次圈划，时而用红毛笔，时而用红铅笔、黑铅笔或蓝铅笔，因此，有不少的诗，都圈划得密密麻麻。有一本《古诗源》，毛泽东用红铅笔在作者“武帝”两字旁划了两道粗线，“武帝”的注释：“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这段文字，毛泽东逐句圈点。《短歌行》这首诗的标题上，他还用红、蓝铅笔各划一圈。诗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文字旁，都划上了密密的圈记。曹操的诗，因为很爱读，也因为读得多，所以，有不少的诗篇，如《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毛泽东都能熟练地背出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大概差不多都知道，在中南海散步时，或者漫步在海岸沙滩，或者在山间崎岖小道行进，或者在办公室里，毛泽东常常饶有兴致地吟诵古诗。曹操的一些诗作，就是他常吟诵的古诗词之一。保健医生徐涛回忆说：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有些天，在海岸沙滩散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毛泽东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

观海，有时也常这样低声吟诵。毛泽东不仅爱读爱吟曹操的诗，而且在练习书法时也常书写曹操的诗。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央档案馆编辑，文物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就收入了两首，一首是《观沧海》，一首是《龟虽寿》。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两件墨宝，书法行家们都认为是当今我国书苑里的精品。曹操《龟虽寿》一诗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两句具有朴素唯物论思想的诗句，毛泽东很欣赏。1961年，胡乔木生病，8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劝其“不计时日”养病，这封信中就引用了曹操的这两句诗，并对胡乔木说“此诗宜读”。从此，我们足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的诗是很喜爱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喜爱曹操的诗呢？毛泽东生前在和他的子女们的一次谈话时这样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有一次，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显然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相悖的。作者笔下的“汉贼”“奸雄”，毛泽东认为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作者罗贯中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小说中“扬刘抑曹”，除传统观念的影响外，当时的现实社会方面的背景对作者有没有影响呢？毛泽东认为有，他还一路发挥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约略地看出，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不迷信书本，不拘泥于古人，敢于冲破作者“扬刘抑曹”这一皇权正统思想的束缚，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一个独到之处。

战争、外交、组织的视角。这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又一个特点。

三国鼎立时期，社会动荡，事态百变，势均力敌的魏蜀吴三国战争不断。《三国演义》记述的就是这一时期各个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三国演义》虽然不是兵书，也不是军事专著，但是，书中却有不少栩栩如生，动人心魄，千古流传的战争和战斗场面的描写，有有关战争战略、策略方面的记述，也有具体的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后发制人等许多的战役和战术方面的描写。例如：祭东风、赤壁大战、走麦城、空城计等等。所以，《三国演义》，毛泽东不仅把它当作三国时代的历史来读，通过它来知兴亡，鉴得失，明事理，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而且还从战争的视角来读，从战略、战术的视角来读。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独到之处还在于，注重学习书中可供借鉴的有关军事斗争的知识和思想材料。大概正因为如此，十年内战时期，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和毛泽东领导所取得的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说毛泽东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这当然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别有用心地攻击，是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熟读《三国演义》，注意学习《三国演义》中谈及的有关战争知识，并且取其精华，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这是无疑的。

说到毛泽东从战争的视角读《三国演义》可以追溯到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结合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际，谈及战略防御的原则时说过的一段话：“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这里，毛泽东列举的我国历史上六个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三次大战，都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战例。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尤爱读《三国演义》中这些威武雄壮的战例。小说中描写的这些战例，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它们已经深深地存留在毛泽东的记忆中。

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中这些著名的战例，不仅是因为作者对这些战例描写得生动、壮观，而且是因为这些战例中都包含有不少的战争知识。与其说毛泽东在读小说，倒不如说毛泽东在借鉴历史，研究分析和学习战争。就拿吴魏赤壁之战来说吧。这是《三国演义》第47回着力描写的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大战。

曹操在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之后，即挥师南下，企图一举消灭刘备和孙权的势力，席卷南方。刘备派诸葛亮去联合孙权，孙权和刘备结成联盟，他们一起抗击曹操。当时，曹操的军队号称80万，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大概也就是20多万人马，驻军乌林（现在湖北省洪湖县龙口乡，长江北岸）；孙刘联军总共不过5万人，安营赤壁（现在湖北省蒲圻县赤壁乡，长江南岸）。双方隔江相望，在赤壁江面摆开了战场。

曹操的军队大半是北方人，不习惯船上作战，不适应江上风浪的颠簸。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曹操命令工匠把战船用铁索联在一起，又在船与船之间铺上木板，钉上铁钉，加以固定，以减少船身的摇晃，他们把这称为“连环船”。诸葛亮得知曹操采用“连环船”的战术之后，立即与东吴军队主帅周瑜等商议对策。周瑜部将黄盖提出用火攻的办法，烧毁曹操的“连环船”。诸葛亮和周瑜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定了火攻的作战方案。周瑜事前安排了放火用的船只，黄盖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曹操，假意声

称要带军队渡江投降。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11月的一个夜晚，赤壁江面恰好刮起了一阵比一阵紧的东南风。黄盖带领十只战船，船中装满了浇了油的柴草和大批硫磺、烟硝等引火物，用黑色篷帐蒙起来，上面插上旗帜，向曹操的水寨驶去。战船的后面还拖着便于战斗的小艇。曹操深信黄盖来投降，所以毫无戒备。当黄盖的战船驶进曹操的“连环船”时，就立即放起火来。火借风力，风助火势，曹操的水寨顿时陷入火海之中，“连环船”被全部烧毁，连岸上的营地也都着了火。这时曹操明知中计，干急没法。周瑜和诸葛亮望见起火，立即擂动战鼓，指挥水陆两军全面进攻。曹军大败，孙刘联军夺取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

曹操败退后，一时无力南下，孙权巩固了在江南的统治，刘备占领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并开始向益州发展。从此就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赤壁之战，曹操失败，孙刘获胜。它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有名的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之一。自古以来的战争，强者并非就一定能够战胜弱者，弱者并非就一定不能战胜强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少亦能战胜多，弱亦能战胜强，败亦能变为胜。少与多，弱与强，败与胜，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就是战争中的辩证法。吴魏赤壁大战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例证。

说到毛泽东对赤壁大战故事的兴趣，笔者在这里再向读者介绍一点有关的情况。在读书治学生活中，毛泽东生前有两个特别的喜爱。一是喜爱唐诗宋词，读得多，记得住，可以随口背诵。二是爱好书法，50年代和60年代初他在工作之余，饭后睡前，常常孜孜不倦地潜心练习书法，仅凭自己的记忆，书写了许多古今著名的诗词曲赋。书写的唐诗宋词尤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又练习书法，又学习唐诗宋词，这是“一举两得”。毛泽东工作之余书写的大量唐诗宋词墨迹中，我们看到过至少有两件是与《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赤壁战争有关的。一件书写的是唐人杜牧的诗《赤壁》，一共四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后两句就与赤壁大战有关。东风，就是指当时赤壁之战，周瑜用火攻之事。周郎，即周瑜。铜雀，台名，在北方的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这个台传说是曹操所建，上有楼，楼上有大铜雀高一丈五尺，因此得名，是曹操宴饮之地。二乔，指东吴有名的美女乔氏姐妹，大乔为孙策夫人，小乔是周瑜的妻子。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东风给了周瑜的方便，则很可能东吴要大败，连二乔也被曹操掳走锁进铜雀台了。另一件书写的是宋代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几句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里的大江，是指长江。风流人物，杰出的或英俊的人物，此指三国时代的包括周瑜在内的英雄豪杰们。“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军在这里击败了曹操，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作者苏轼所感怀的就是这些古人古事。毛泽东书写的这两件墨宝都被中央档案馆挑选编入《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一书。《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赤壁之战早已成为历史，毛泽东书写的这两件与之有关的墨迹还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际，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中着力描写的战争场面是很有趣的。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最有兴趣的大概就是对著名大战的描写。因为他对这些大战的描写很感兴趣，所以他读得多，看得细，对作者罗贯中着力描写的这些大战的情形，他都很熟悉，在讲话和文章中常常谈及。他从战争的视角读《三国演义》，从赤壁大战、官渡大战、彝陵大战等许多的战争、战役中学习战争的谋略，学习克敌制胜的策略，学习战争的知识，并密切结合实际，运用于他所领导和进行的革命战争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一大特色。

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曾作过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对薄一波说过，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薄一波是山西定襄人——笔者注）——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他还讲过，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青年团员”周瑜，29岁当了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借这件事说明选拔干部，不能统统按资历，要按能力。（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毛泽东不但从战争的视角来读《三国演义》，而且还从外交、组织的视角来读《三国演义》，从读《三国演义》中联系到我们干部之间、领导班子之间的团结，联想到选拔和使用年轻干部。这些都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等历史古籍的重要特色。

政策和策略的视角。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很重视进行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对书中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是很为关注的。说到毛泽东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读《三国演义》，笔者在这里先介绍毛泽东的一段历史佳话。

1941年1月，我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之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共产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主张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毛泽东认为：“我们是必须制裁反动派，反击顽固派的，但我们要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任何党员都不许超过自卫原则。蒋介石

既有抗战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即既有对中共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一面，又有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我党的方针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对他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采取联合政策；对他动摇和反共一面，采取斗争和孤立的政策。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三者缺一，就要吃亏。”这是对国民党的情况作了极精辟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极高明的斗争策略。如何制裁反动派呢？这在《巨人之谜》一书中有生动的叙述：“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说到这里，毛泽东慢慢地掏出火柴，点燃手里的那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徐徐将烟喷出，烟雾飘渺，变化无穷。

在场的所有人眼光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毛泽东吸引了。毛泽东又接着说：“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他也就违背了党的政策。”

“为什么呢？”

在场的李卓然听得入了神。

毛泽东一手撑腰，一手拿烟。

“事理纷繁，重在主要矛盾。你读过《三国演义》没有？”

“读过。”

“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为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应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扬振之等：《巨人之谜》，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42页）

毛泽东的侃侃而谈和口若悬河般的宏论，特别是通过分析《三国演义》这段刘备兵败身亡的历史故事来给大家以启示，便很快统一了全党同志对皖南事变的认识。

上述毛泽东谈到的刘备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主要矛盾。”“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毛泽东认为：只有“抓着主要矛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先曹后孙才是大局为重的上策”。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来分析和总结书中谈及有关的历史事件，并能用它来说明

现实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又一个特点。

联系实际问题，从作品中寻求启示的视角。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常常联系实际问题，从中寻求启示。他常常“以既定的思想水平和历史观点来评价作品所描绘的内容，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17页）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又一个特点。

1926年5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说过：“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要造一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毛泽东用“唯物史观”这个锄头，去挖掘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中国历史小说，从而独辟蹊径，探寻出新的思想，得出新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毛泽东认为，这恰恰不是说明帝王将相和掌握知识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表明，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也没有”。（转引自《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31—132页）

在延安时，毛泽东经常在文章、书信、谈话、讲话和报告中谈及《三国演义》，用《三国演义》中的话或故事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1936年9月8日，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他引用《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句名言，来说明“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全国抗日运动推动下，在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但予以拒绝，反而更加倒行逆施的情况下，在西安软禁了蒋介石，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了当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人主张无限期地监禁，有人主张公开审判，更有人主张把蒋介石杀掉。而中国共产党从全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宽大处理，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了说服当时党内的同志，毛泽东就引用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他说：“杀掉蒋介石很容易，有一把刀一下子就杀了，可是脑壳只有一个，杀了就安不上了。人总是要死的，有老死的，病死的，战场上打死的；有站着死的，坐着死的，躺着死的。。蒋介石也是要死的。但是中央主张现在不叫他的脑袋搬家，因为杀了他就没有戏唱了，这是对抗日不利的。何况杀了他，还会有蒋介石第二、蒋介石第三。。中央也不主张把他关起来，而是主张把他放了。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七擒七纵，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董志英：《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3页）1937年7月，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实践论》中，他又用《三国演义》中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形象地说明“人在脑子中动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

1956年3月5日，毛泽东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所作的指示中，又一次引用《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说明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要妥善解决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关系。修理和服务行业过于集中，群众不满意，就需要适当地分散和多设一些点，以方便群众。

《三国演义》第49回有“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保？”一句话。1958年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来说明人的忧患与生俱来。

人民公社这一社会组织形式，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一种尝试。在推进和肯定这一组织形式的时候，毛泽东把它与历史上的一些农民对大同世界的探索和试验很有兴趣地联系起来。这从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读《三国志·张鲁传》（魏志卷九，裴松之注）时写的批注中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读《三国志·张鲁传》时，于12月7日和10日先后写了两大段批注，长达1500字左右。他还指示将他10日写的批注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印发与会者。毛泽东似乎从读《张鲁传》中隐约看到了“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渊源。所以，他高兴地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

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①拜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①摩尼教：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宗教，以光明与黑暗为善恶的本原。公元七世纪末传入中国。1120年的方腊起义，即信奉摩尼教。杨么：南宋初年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首领。名太，龙阳（今湖南汉寿）人。他继承钟相起义，有众二十万人。后为岳飞击败，牺牲。钟相：杨么前的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领袖，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有众数十万人。后被孔彦舟袭败，牺牲。明教：由摩尼教发展而成的宗教，崇拜日月，认为光明必战胜黑暗。组织多次农民起义。红军：也称“红巾”。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等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以红巾为号，称红军。山童牺牲后，福通拥立山童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兵败后归朱元璋，病死。徐鸿儒：农民起义领袖，明山东钜野人。明天启二年（1622），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战败牺牲。唐赛儿：明初农民起义女领袖，山东薄台人。永乐十八年（1420）发动起义，失败后不知所终。白莲教：混合佛教明教等内容的宗教，崇尚光明，起源于宋代。清代嘉庆元年至十年（1796—1805），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嘉义十八年十九年（1813—1814）冀、豫、鲁有林清、李文成的起义。

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对张鲁行“五斗米道”的一些具体作法，毛泽东很为赞赏，并把它与当时在我国大地上普遍建立的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相对照。毛泽东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又写道：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教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我们知道，一部二十四史，毛泽东前后整整读了二十四年，写下的批注也不少，但像这样长的两大段批注，笔者所见到的，这还是第一次。《张鲁传》全文不足300字，毛泽东写的这两段批注比《张鲁传》长好几倍。毛泽东对《张鲁传》的兴趣，实际上并不是始于这次的八届六中全会。他向与会同志推荐《张鲁传》也不是偶然的。同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就曾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9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又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这些言谈话语表明，毛泽东对张鲁五斗米道几个月前就已有浓厚的兴趣。在毛泽东看来，历史虽已过去一千多年，现在与过去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张鲁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追求等，对人们认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进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很有启示的。借用历史来启发人们的认识，开阔人们的视野，让人们更大胆地进行创造性地实践，这大概是毛泽东当时向人们推荐读《张鲁传》的主要意图。用一千年前张鲁的五斗米道的实践来类比当时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和追求，当然是过于简单了。建立人民公社这一社会组织，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和广大农村的实际，不能有效地提高和发展生产力，因而不成功，这是很自然的。

为了纠正已经出现和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减少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之前，向全党连续发了四封《党内通信》，反对当时全国

各地盛行的浮夸风等“左”的倾向。在上海会议上，与会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着重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大家看看《三国演义》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策谋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攻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意思是希望各级领导作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不少干部认真阅读了郭嘉传，从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头脑发热、脱离实际等错误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在今天，对于我们指导各方面的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说到毛泽东爱用《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故事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还有这样一件事：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在四届人大将要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为了说服中央委员能够同意他的建议，不要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再提设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用三国时代的历史故事启发大家。毛泽东说：“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接着，毛泽东又说：“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皇帝，你们也不要做孙权。”（龚坤祥著《毛泽东，信步危难》，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类似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总之，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是多视角的。上面说到的视角，只是笔者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视角。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更爱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理解，去阐发他的认识。到了晚年，他老人家也还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现在也都还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随着《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在我国人民中越来越广泛的流传，毛泽东读这两部书时写下的批注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04章 读《西游记》

《西游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作者是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是乡愿思想。孙悟空，也是作者吴承恩的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坚定不移，团结一致，坚持奋斗。那匹小白龙马，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的精神和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西游记》是毛泽东很爱读的又一部中国古典小说。

《西游记》是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神话小说。故事来源于唐代名僧玄奘西行到印度取经及从唐末到明代大约六百年民间传说、戏曲、平话，经过许多人的创造、取舍、增删、修改和加工，最后由明代吴承恩再创作而成。它是一部规模宏伟、结构完整的巨著。前七回写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的故事。通过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描写，曲折地表现出作者对封建秩序一定的反抗精神。八至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经缘由。十三至一百回描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佛主，求得真经，成了“正果”。小说用幻想的形式塑造了孙悟空这一有智有谋，不畏强暴，勇于反抗，不怕困难，神通广大，敢于斗争的形象，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西游记》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很广。集魔性、猴性、人性于一身的齐天大圣，几百年来深受男女老幼的喜爱。加上电影、电视和多种新闻媒介的宣传，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的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很爱读《西游记》。他的老同学萧三曾这样写道：“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老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说唐》等。”据萧三的回忆，毛泽东还对他说过：“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1936年，毛泽东自己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也曾说过：“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西游记》固然与《水浒》不同，它不是直接描写农民造反的专著。但是

《西游记》着重描写的是主人翁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翻江倒海，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爱憎分明，敢于造反这样一个英雄形象和一个个想象丰富、曲折生动、语言诙谐、独具风格的造反故事。所以，毛泽东对《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也是一直很喜爱的。直到晚年，他老人家对《西游记》还有浓厚的兴趣。

毛泽东爱读《西游记》，更喜爱孙悟空这个敢于冲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敢于大闹天宫、敢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神话人物。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讲话、谈话、书信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常常谈到孙悟空，有时候把他作为正面形象来宣扬，有时候又把他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每一次引用，每一个比喻，都抓住和体现孙悟空的一个特征，一段故事，说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在毛泽东的著作、讲话、谈话和诗词当中，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是很多的，但是，引用最多的或者说他最有兴趣的，大概就要数这个齐天大圣了。

早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毛泽东比喻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毛泽东认为，“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3页）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是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的。

说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引用孙悟空的事，王炳南在《阳光普照雾山城》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45年10月，在山城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进行了接触。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把他们看成是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毛泽东去见陈立夫，他先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门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又作为正面人物来宣扬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在谈到准备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页）这里，毛泽东两次提到孙行者（即孙悟空）也都是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的。

《西游记》第6回中有一个故事，说孙悟空有72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为鸟兽虫鱼草木器物，还能变为各种各样人。有一次，他和天上的皇帝——玉皇大帝的战将杨二郎相遇，孙悟空变成一物，杨二郎即变降他的一物，双方变来变去，最后孙悟空变成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成一根旗杆，结果还是被二郎神识破了：“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泽东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有好几次在讲话当中说到这个故事。

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在谈到梁漱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1页）

到了60年代，随着国际国内客观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形象和风采更是称赞不已，激情“欢呼”。1961年11月17日，写下的著名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内心情感的真实表露。到了1964年1月，在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又借孙悟空这个人物故事，对自己当时的心境和思考作了进一步的表露。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曹力铁译，党史文汇》1986年第6期）

直到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他身上有虎气，也有些猴气。这封信中，毛泽东是这样写的：“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

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前几年，还是以激情洋溢的诗句“欢呼孙大圣”，今日，他自己就变成了孙大圣“这样的大王了”。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很爱读《西游记》，许多读者对此大概早有所闻。

那么，到了晚年，特别是到了70年代，他对这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仍有浓厚的兴趣，还时常翻阅，时常与人侃侃而谈。对于这一点，读者所知所闻大概就很少了。

说到毛泽东晚年爱读《西游记》的事，这里，笔者把过去知道的事和当时所见所闻介绍给读者。

毛泽东晚年在中海住地的会客厅里，也就是他晚年的书房里，一直放着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这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是：《西游记》世界书局版上、下册《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上海广益书局1924年版1—16册《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海广百宋斋光绪庚寅（1890年）校印1—20册《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海广百宋斋光绪辛卯（1891年）校印1—10册《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4月版上、中、下册根据当时的记录，进入70年代之后，毛泽东先后有两次向我们要过《西游记》。一次是1971年8月初，他要看《西游记》和《西游真诠》。《西游记》是从中央办公厅图书馆找出来的，大字线装本，就是上面说到的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那种《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西游真诠》线装本，全20册，他的书库里也没有，我们是从当时的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西游真诠》，清代悟一子陈士斌撰，康熙丙子（1696年）刊本，他翻阅后，大约一个多星期就退给我们了。《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因为是线装本，装帧也较别致，字也比较大，他很喜爱，一直放在身边。第二次是1973年3月上旬，这一次他指名要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新出版的平装本《西游记》。他跟前已经有了大字线装本的《西游记》，为什么又要新出版的平装本呢？当时，在我们管理图书人员的头脑里也都有这个疑问。后来秘书徐业夫告诉我，他说线装本有个别地方字看不清，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首长就翻看平装本，用平装本来补线装本的不足。毛泽东看别的书也喜欢这样做，他常常将几种不同版本的同一种书放在一起，对照着读。毛泽东的这种读书习惯，除了徐秘书说的这个意思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意思呢？我们就说不清楚了。据我们的记录，1973年4月5日，毛泽东又一次向我们要《西游真诠》，同时还要《西游原旨》一书。《西游真诠》，我们是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西游原旨》，是从中国书店购买来的，是清代刘一明撰，嘉庆二十四（1819年）刊本，全24册，字也比较大，他很喜爱，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伴随着毛泽东度过终生的诸多的图书中，上述几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和这部《西游原旨》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上列的毛泽东晚年会客厅里一直放着的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毛泽东晚年曾多次阅读过。上海广百宋斋光绪辛卯（1891年）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还写下了批语。它是中海毛泽东故居里仅存的毛泽东写有批语的《西游记》。这种版本的《西游记》，装帧倒不怎么讲究，字也不是很大，但字都印得很清楚，与小32开本差不多大，每册很轻，看起来很方便，所以，毛泽东也很爱看。毛泽东在这部书上写的批语，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的有这样两段：一段是在读第18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行者降魔”时写下的。

作者在这一回中，写高老招猪八戒做女婿之后，在与唐僧一行谈及他这个女婿时说：“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后来就变做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又有三溜鬃毛，就像个猪的模样。食肠却又甚大，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老拙这些家产几时早也罄净。”唐僧听后说：“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毛泽东的这段批语就是在读到这里时写下的。是出于对猪八戒的同情呢？还是对唐僧的话感到意犹未尽，因此读了以后就随着思维蒙发的火花一路有感受有发呢？这只有毛泽东本人才能说得清楚。笔者认为，应当是前者。毛泽东的这段批语是这样写的：只因为做得多，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当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

上述的高老在唐僧师徒面前嫌其女婿吃得多，唐僧为徒弟八戒说情，说“他做得多，所以吃得多”。这本来是小说中很为普通的一段描写，然而，它却引发了毛泽东的思维，信手写了这样一段富有哲理的批语。这大概不是没有缘由的。

这部《绘图增像西游记》，虽是1891年出版的，但毛泽东阅读批注此书，大体时间应是在50年代后期。根据有三：一是50年代初期，毛泽东进城之后，从延安带过来的图书不多，特别是线装本的图书就更少。随着毛泽东的读书需要，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后来田家英、陈秉忱、逢先知等陆续为他购买配置了一部分线装古籍图书。这部《绘图增像西游记》可能就是这一时期购买配置的。二是本书印的字似3号宋体字，小32开本，这样小字号、小开本的线装书，60年代之后，他一般是很少看的。三是从批注的字迹和用笔来看，批注是用黑铅笔写的，因为本书天头空的地方不大，所以批注的字写得也不大，字迹是流畅自如的行书体。我们知道从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读书写的批注差不多都是用铅笔写的行书字体。如读鲁迅著作单

行本写的批注，读二十四史写的批注等等，用的都是铅笔，写的都是行书字体。由此判断，这一段批注像似50年代后期所写。所以，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段批语可能是在50年代后期写的。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中，他明确主张“多劳应当多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5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城乡各地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这一符合实际，深受全国人民拥护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50年代后期，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一时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在人民公社内部不实行按劳分配，而搞平均分配，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为此，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先后在河南的郑州和湖北的武昌召开了会议，开始着手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同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着重批评了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倾向。1959年2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严肃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实行平均分配的错误倾向，进一步强调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由于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采取切实的措施，才使这种“左”的思想和错误倾向得以纠正。直到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上，毛泽东又一次写道：“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这里，毛泽东把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提到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的高度要人们加以重视。正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人主张实行平均分配，不要按劳分配；也正因为这种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主张和“左”的思想的影响在社会实际中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果断地批评和纠正了这种错误思想倾向。这是毛泽东写下这段批语的直接的思想缘由。毛泽东写的这段批语，与他在50年代后期的思想实际是紧密关联的。批语是毛泽东当时思想实际的一种表露，也是他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实际问题的一种再思考再认识。联系社会和思想实际问题读书，这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直到晚年，他一直坚持着这样做。这段不长的批语，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毛泽东在读“闲书”的时候，头脑里似乎也没有停止对诸多的社会思想实际问题的思考。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读“闲书”，就如同欣赏名人书画一样，其主要目的在于休息和调节大脑。然而，在实际的读书过程中，往往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就拿笔者在这里提到的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来说，他在读这部“闲书”的过程中，头脑里似乎还在想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坚持和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实际，所以当他读到唐僧说的“只因为他做得，所以吃得”的话时，就如同心中的一直难以平静的波澜，又遇突起的飓风而更加汹涌澎湃起来一样，因此，情不自禁地挥笔疾书了上述的那一段批语，再一次借机强调“多劳应当多得”的这一重要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原著中，与这段批注相关的还有这样两段话，猪八戒对假妻子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耘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第18回）孙悟空对高老说：“你这老儿不知分限。那怪也曾对我说，他虽然食肠大，吃了你家些茶饭，也与你干了许多好事。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资，皆是他之力。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问你祛他怎样的。据他说，他是一个天神下界，替你当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儿。想这等一个女婿，也门当户对，不怎么坏了家声，辱了行止。当真的留他也罢。”（第19回）这两段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还都用铅笔一一划上了道道。

第二段批语，是在读第28回：“花果山群猴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时写下的。吴承恩在这一回中写孙悟空回花果山，用法术把百余来犯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并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孙悟空的这段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用黑铅笔都划上了道道。毛泽东的批语，就是在读这段话时写的。毛泽东写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样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唐僧的善恶观，孙悟空不信，作者吴承恩不信，毛泽东也不信。毛泽东认为“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是乡愿思想。“乡愿”源于《论语》，是孔夫子的话。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可见孔夫子对“乡愿”思想也是极力反对的。什么叫乡愿思想呢？就是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人生哲学，就是《西游记》中所着力描写的唐僧的待人处世哲学。唐僧的善恶观，唐僧的思想言行就是“乡愿”思想的最典型的表现。这种“乡愿”思想，不仅不能号召和鼓舞、团结人们去斗争，去除恶，去积善，而且还容易长“妖魔鬼怪”的志气，灭革命造反派的威风，鼓励、放纵“魑魅魍魉”作恶成灾。唐僧就是因为笃信、主张、恪守这种思想，所以三番五次地遭受苦难，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因此，毛泽东对唐僧虔诚信奉的这种处世哲学是极为反对的。孙悟空的思想行为正与此相反，战妖魔，斗鬼怪，尽管一次次遭受唐僧“紧箍咒”的约束和折磨，然而他不改初衷，始终勇敢战斗，全力除恶求善，为师徒四人朝接日出，暮送晚霞，排除险难，不断向西天行进，直到最后面见佛主，求得真经立下汗马功劳。没有孙悟空一路上的战

妖除恶，斩魔行善，师徒四人要到达西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认为，孙悟空的思想与唐僧“乡愿”思想是相反的，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毛泽东所以一次又一次称赞孙悟空，“欢呼孙大圣”，大概这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善和恶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善就有恶，善恶并存是永恒的。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这样的话，后来还说过多次。1956年9月27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这就是毛泽东的善恶观。

对于有善就有恶即善恶并存的思想，《西游记》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西游记》是写佛门之事，对开口就是“善哉！善哉！”的和尚的描写，照理说对他们的慈悲和行善应当多用点笔墨，然而吴承恩笔下的所谓四大皆空的和尚仍然是贪财好色的：观音禅院的老和尚为了谋夺唐僧的袈裟不惜放火焚烧寺院，干出谋财害命的勾当；宝林寺和尚仍然是用世俗的势利眼光看人，欺软怕硬，却无半点慈悲心肠。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被佛教宣传为天堂般的西方极乐世界、庄严神圣的世界里，还有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伽叶需索取经的人事（索贿赂），和我们现在社会中的贪污行贿的事一样。孙悟空将此事告到佛主如来处，如来反说：“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唐僧无物奉承，只得将紫金钵盂奉上。书中对阿傩接到取经的人事后的丑态是这样描写的：“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第98回）可见成了佛的尚也是非常爱钱的。唐僧取的无字经被白雄尊者抢去后，满眼垂泪地说：“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毛泽东对《西游记》中这一段的描写看得很细。对阿傩丑态描写，都划上了道道或浪线，在“只是拿着钵盂不放”这句话后连划了三个圈圈。对唐僧说的“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这两句话下面分别划上两条粗粗的横道，末尾还划上了两个大圈。从划一条横道或一条浪线，到划两条横道或两条浪线；从划一个圈、两个圈，到划三个圈，这是毛泽东读书过程中留下的标志。这种种的标志是毛泽东读书过程中的思维或思想活动的轨迹，是对原书内容的一种反映。它表明毛泽东晚年在阅读《西游书》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它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对《西游记》这部著名的神话小说，读起来依然是很有味道，很有兴趣的。

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保存下来的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西游记》，固然没有《红楼梦》、《水浒》、《聊斋志异》等那么多的版本，但它也一直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最后最难忘的岁月。毛泽东的一生中，阅读和批注过的图书是很多的，但毛泽东阅批过的《西游记》，保存下来的只有上面我们提到的这部《绘图增像西游记》。它是毛泽东晚年阅读《西游记》的重要记录，也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的一份重要史料。

毛泽东晚年不仅爱读《西游记》，而且对《西游记》的研究也非常关心。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一些报刊先后公开发表了一些《西游记》研究文章。1957年，作家出版社将几年来国内报刊上先后发表的《西游记》研究的重要文章汇集编辑出版了《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一书。对《西游记》的研究文章毛泽东也是一一精心研读，孜孜探求。

说到毛泽东晚年关心《西游记》的研究，爱读《西游记》研究的文章，笔者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研究论文集》的情况。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4月编辑出版）也是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仅存一部毛泽东生前阅批过的《西游记》研究专著。这部论文集，共收研究论文17篇，附录1篇。它虽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游记》研究论文的全部，但它是《西游记》研究论文之荟萃。作家出版社编辑部在本书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所收的只是截至发稿以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的散篇论文。未曾发表的文稿、整本和专著，已经被收入作者自编的论文集或其他选辑的文章，整理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的序言，均不收入”。这本《西游记研究论文集》，约13.5万字。全部文章，毛泽东都曾用心阅读过，一些篇章在阅读的时候还写下了批注，划上了密密麻麻的道道和圈圈。

卷首篇是现代著名作家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翻开这本论文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在张天翼文章篇首写下的“1954年，2月，人民文学”一行非常醒目的批注。开始，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看完张文的尾注我们才明白，毛泽东的批注意思是说张天翼的这篇论文原载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杂志。标题的左边，毛泽东用黑铅笔连划了三个大圈，格外引人注目。“张天翼”三字下面还划两条横道。全文从头到尾几乎逐段逐句都划上了横道、浪线和圈圈。圈划的种种符号表明，张天翼的这篇文章，毛泽东是逐字逐句阅读的，看得很细，而且是十分用心的。张文一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题材、主题和作者的态度”。对张天翼的分析和看法，毛泽东似乎很有兴趣，在阅读的时候又圈又划。在谈到对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评价时，张天翼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以前，还没有见过哪一家写幻想的神魔故事能写得像这么生动，这么艳异多彩，而又这么亲切，这么吸引我们的。”毛泽东似乎对这段话有同感，或者似乎对这段

话比较欣赏，所以，在阅读的时候，每句话下面，他都用黑铅笔划了两条横道。使人一看就知道，他读这段话时是引起一定的思维活动的，是颇有感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现实性和幻想、寓意等等”。毛泽东在读这一部分的时候，圈划的符号比第一部分还多，还密。在这一部分中，对孙悟空这个人物的看法，张天翼写了这样一段话：“孙悟空之所以败于玉帝他们之手，难道是由于孙悟空作了什么‘恶’而得报应么？我们说一点也不是。作者笔下的孙悟空，是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恶魔化身），使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动；我们不但觉得他这是‘恶’，而且还觉得他可爱，同情他，心向着他。他的失败，更不是什么‘恶’不敌‘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力量不敌而已。”这段话的每一句下面，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都划上了一条横道。最后的一句“力量不敌而已”划了两条横道。段末还划一个大圈。对这样的专题研究论文，毛泽东都看得这样细，看得这样用心，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对《西游记》的浓厚兴趣和对《西游记》学术研究是多么地关注和重视。

张天翼这篇文章的后面还有一个附注，共三条约2000字，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1957年，毛泽东已经64岁，对一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6号字看起来显然是很吃力了，然而，毛泽东如同读正文一样，也还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划上了道道、圈圈。字排得小了，圈划的种种符号就更显得突出了。圈圈划划，密密麻麻，满页皆是道道和圈圈。附注的第二条，是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传说，其中有这样两段：“《法华经》里还写观世音菩萨有时‘现妇女身而为说法’，民间传说里就渐渐使这‘妇女身’固定下来，终于成了一个妇女。在《三教搜神大全》里就有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了，说她是一个国王的三公主，因为抗婚，父王要烧死她，而她‘色不变而志愈坚’。她被囚到冷宫里，大家苦劝，她不听，‘反失语激父，父大怒’，立命斩讫。虽然写她的反抗是为了‘欲了人间事’（要出家），而且那结果是公式化的（照例是由于一些奇迹而得救），可是总写出了是一个非常坚决顽强的反抗到底的女性——为民间所喜爱所歌颂的性格。”“就这样，这几乎成了个传统：在民间作品出现的观世音菩萨，总往往是正面人物，而且往往是妇女。就连《西游记》——对天界的哪一位佛神都讽刺揶揄，可是对观音就另外一种态度，把她写得可亲近，有的地方还写得很美。”这两段文字，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都一一划上了道道或浪线。第二段的末三句，每句下面除划了浪线外，每句末尾还都划了一个圈。附注是与正文有关内容密切相联的，它是对正文有关内容的进一步补充或注释。看了正文，再看附注（有的叫注释），或者把正文和附注联系在一起看，这是毛泽东晚年读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读别的书如读《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时就是这样。注释的字一般都小于正文的字，对毛泽东来说，看注释当然比看正文吃力。然而，他有时读注释比读正文还仔细，还有兴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正文中提到的人物、事件等受文章整体结构、主题内容和语言文字表述方式方法的限制，所以往往是一笔带过。要使读者知其所以然，作者往往用加注的形式，把有关的人物、事件等补充交待清楚。就如同上述的张天翼在正文第一部分内容中，只写“例如观世音菩萨”几个字，要知道观世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为什么受许多人的欢迎，只有阅读他的附注才能有所了解。毛泽东所以爱读注释的文字，大概这就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还有童思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在这篇文章的篇首开头处，毛泽东也写了一行批注：“1956年2月，西南文艺”。“西南文艺”四个字下面还划了一条浪线。他的意思是说这篇论文原载1956年2月2号《西南文艺》杂志。文后的注“（原载‘西南文艺’一九五六年二月号）”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西南文艺”四个字下面毛泽东也划了一条浪线，“一九五六年”几个字下面划两条横道，“二月号”三个字下面划一条横道。文前的批注与文尾划的浪线和道道，意思是一样的。标题的左上方，毛泽东还用铅笔划了三个大圈。作者“童思高”名字下划了粗粗的两条横道。非常醒目的三个大圈和两条横道，大概是表明毛泽东一定的心理意向。这部《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收入的17篇论文，毛泽东在篇前写批注和在题目上划三个大圈的只有两篇，一篇是前面说到的张天翼的文章，第二章就是童思高的第一篇。毛泽东在这里划的三个大圈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看到17篇中只有两篇题目划了三个大圈，而这两篇毛泽东看得最仔细，圈划的各种符号又最多。这不能不说明毛泽东对这两篇论文的重视，也不能不说明毛泽东对这两篇论文的喜爱和浓厚的兴趣。对这两篇论文，毛泽东在阅读中虽然没有写下什么评价和称道的话，但是阅读圈划的具体情形可以反映出这两篇论文在这部论文集的特殊地位及其重要性，也反映出毛泽东称道这两篇论文的一种心理活动。阅读圈划的实际表明，毛泽东很重视这两篇论文，很爱读这两篇论文。毛泽东阅读这两篇论文思想上闪动的火花或受到的启示、甚至产生的某种共鸣，都渗透或凝聚在他本人圈划的各种符号当中。毛泽东阅读过程中圈划的种种符号，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知道它所表明明确涵义，但它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划下的，是毛泽东阅读过程中思维活动的轨迹，是毛泽东读书实践的记录和反映。它对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读书实践一定是有帮助的。

下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毛泽东阅读童思高这篇论文圈划的具体情形吧。

文章一开头，有毛泽东写的“十六世纪”四个字，这是毛泽东对本文第一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出生于明代中叶（约公元一五一〇年——一五八〇年）”的批注。接着本文作者写道：“正是明成祖制定严刑峻法、残酷迫害人民的时代”这一句话下面，毛泽东划了两条横道，句末还连划了两个圈。我们知道，毛泽东读古典

小说，不仅当作小说看，而且当作历史看。他是很注意作品和作者的社会背景的。这里的圈划，至少也表明了这一点。童思高的这篇论文共分六个部分，毛泽东圈划最多的是第一、二、五、六这四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引了原著第35回中孙悟空和李老君的一段对话：大圣道：“你这老官儿，着实无礼。纵放家属为邪，该问个铃束不严的罪名。”老君道：“不干我事，不可错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试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天去也。”大圣闻言，心中作念道：“这菩萨也老大惫懒！当时解逃老孙，教保唐僧西天取经，我说路途艰涩难行，他曾许我到急难处，亲来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搆害，语言不的，该他一世无夫！——若不是老官儿亲来，我决不与他；既是你这等说，拿去吧。”

这段对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每一句下面都划上了横道，其中“该他一世无夫”一句，除了划横道外，句末还连划了三个圈。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一段，作者引了孙悟空说的一句话：“若专以相貌取人，干净错了。”毛泽东读后分别划了两条横道。接着作者又引了唐僧说的一段话：“我等三个徒弟相貌虽丑，心地俱良，俗谓‘面恶心善’，何以惧为？”毛泽东在阅读中，前两句下面分别划了一条横道，后两句下面分别划了两条横道，末尾还连划了三个圈。孙悟空和唐僧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毛泽东读后又划又圈，表明他对这些话的赞同的心理取向。

童思高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中，在论述神魔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时，写道：“统治阶级的作贱人民和妖怪的害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民的大害。”作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西游记》，因此格外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大概是作者的分析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吧，所以，毛泽东读了这句之后，在“作贱人民”“妖怪的害人”九个字下面都划上了横道，后两句下面都划了浪线，句末连划了三个大圈，因为不是段末，所以划的三个大圈把后面一句话的前两个字都划进圈里了。可见毛泽东读这篇文章时的心情是不寻常的。

这篇文章的第六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中，在谈到“神佛既是要唐僧西天取经，为甚么又要使妖魔为难，增加取经的困难呢？”作者在这里引《西游记》第77回孙悟空说的一段话：“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教我等来取。怎知道苦历千山，今朝到此丧命！”毛泽东对孙悟空这段话很感兴趣，阅读中差不多每一句下面都划上了两条横道，第一句、第二句后面都划了一个大圈，最后一句末尾划了三个大圈。如此又划又圈，在毛泽东读过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是仅此一处。圈划的几种符号非常突出，特别引人注目。这段话是孙悟空在去西天途中遇到严重困难时说的一段生气的话，也是一段牢骚话。它是孙悟空在特定的条件下的一种逆向思维的反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孙悟空的这种逆向思维，从思维方法上来说，毛泽东似乎觉得它是合乎逻辑的。解决问题，能从不同的思路去思考，去提出问题，不拘泥，不守旧，这是毛泽东一贯主张和提倡的思维方法。大概是心里赞同或者是称道孙悟空的这种思维方法吧，所以，他在阅读中才如此圈划。不过，正如本文作者所说：“若果如孙悟空这样说，也就没有取经故事了，也就不会有《西游记》这部小说。”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不会不理解的。

除了张天翼、童思高两篇论文外，《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还有萧歌、竞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西游记〉读后的一些体会》。这篇文章，毛泽东在阅读中也有许多的圈划。本文作者在谈到吴承恩与《西游记》创作的社会背景时写道：“吴承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样的社会现实，已足以使他愤世嫉俗，何况他又是个失意者呢！他在科举上很不得意。虽然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但并不为当时统治者所赏识，。。”毛泽东在读这段话时，除划横道外，在“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这句话旁边还划了一个问号，它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划的唯一的的一个问号。这里作者引用的对吴承恩评价的一段话，出自《天启淮安府志》。这样评价吴承恩，是否与实际相符？大概毛泽东对此有点疑问，所以阅读时就划了一个问号。在谈到吴承恩创作时的思想感情时，作者还引了吴承恩的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延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这首诗揭露了豺狼当道的黑暗局面，表现了作者胸中的愤慨，毛泽东很爱读，每一句下面都划了浪线。接着，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吴承恩，本文作者又引了吴承恩的一首《满江红》词：“穷眼摩挲，知见过，几多兴灭，红尘内，翻翻复复，孰为豪杰？傀儡排场才一出，要知关目须听彻，纵饶君局面十分赢，须防劫！”词中，吴承恩对统治阶级的骄傲、虚伪、昏庸、愚昧，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警告。这首词的后半阙，作者嘲笑那些贪图高官厚禄、封子荫妻的士大夫们。吴承恩写道：“身渐重，头颅别，手可炙，门庭热。施安排娇面孔，冷如冰铁，尽着机关连夜使，一锹一个黄金穴，被天公赚得鬼般忙，头先雪。”吴承恩的这首《满江红》，毛泽东很喜爱，句句划上了浪线，每一句后面还划一个圈。看得出，这首词，他读得是非常认真的。在《西游记》研究的论文中引用的吴承恩的诗词，毛泽东都如此爱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对我国古典诗词具有特殊的兴趣。

萧歌、竞华这篇文章后面还有一篇附记，是这两位作者给编辑的一封信。实际上是作者对上述文章中谈到

的一些体会的补充和说明，也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字虽小，毛泽东也都一一阅读和圈划了。

这部论文集中，还有沈玉成、李厚基的《读〈“西游记”札记〉》，沈仁唐的《〈西游记〉试论》，李大春《读〈西游记〉的几点心得》，等等，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也有许多圈划，这里笔者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毛泽东读《西游记》，和读我国其他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一样，开始是当故事读的，后来就联系我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实际，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理解，去运用，去说明实际问题，所以，到了耄耋多病的晚年，他老人家还常常黄卷青灯，爱不释手。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爱从哪些视角去阅读《西游记》的呢？这大概是很多读者都想知道的。这里笔者将自己所闻所见和在实际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介绍给读者。

政治的视角。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的一个重要视角。

《西游记》是一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从政治的视角去阅读这部小说，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是怎样从政治的视角阅读《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的呢？这里，我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毛泽东有关的几次谈话。1957年2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的同志有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旨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社会各界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对当时在座的文艺界的同志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闹天宫，反官僚主义。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神话故事与反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毛泽东在这里阅读《西游记》与国内当时的政治斗争还没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他把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与当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就紧密联系起来了。

6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是很严峻的。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下的光辉诗句：“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严峻形势的最好的写照。1963年7月，中、苏争论进一步公开化。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中央攻击的回击形象地比喻为“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在同苏共中央的斗争中，毛泽东本人就像大闹天宫的孙大圣，高高举起千钧棒，奋力澄清万里埃。在斗争的实践中，他坚定地号召全国人民“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率领全党同志“大闹”苏共中央这个“天宫”的同时，对国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等政治问题也极为关注。1964年9月7日，在故乡湖南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号召人们：要斗争。他说：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毛泽东这里说的批评的对象显然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他激情欢呼的“孙大圣”也不是泛泛而谈的革命者的代名词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向人们反复强调：“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就是在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

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直接与现实的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号召人们站在孙悟空一边，保护孙悟空，为孙悟空欢呼，向孙悟空学习，与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作斗争，这是毛泽东从政治斗争视角读《西游记》的一个独到之处。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所以能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西天，取到真经，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不止。毛泽东所以爱读《西游记》，这大概也是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生前曾与一些领导干部和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到《西游记》时都说过：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毛泽东还说：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一位领导同志听后认为，毛泽东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不要怕不同意见，不要怕有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最后总是会成功的。（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这是毛泽东从政治的视角读《西游记》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坚定的信念，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团结奋斗，毛泽东对此是极为关注的。

政策和策略的视角。早在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中就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

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中央委员群众说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1948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的前夕，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通报中又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8页）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河中，毛泽东一贯是非常重视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在读《西游记》这部历史小说中的一个个神话故事时，他也非常注意从政策和策略视角去寻求启示。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又一个独到之处。

说到毛泽东从政策和策略视角读《西游记》，并从中寻求启示。早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毛泽东自己曾这样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3页）这里，毛泽东将孙悟空比喻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西游记》第7回谈到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悟空虽然能够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去。如来佛翻掌一扑，将五个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压住。毛泽东在这里借用这个神话故事说明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斗争是必然会胜利的。同时还谈到了“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的具体的斗争政策和策略。这里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思想。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在谈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其重要意义时，毛泽东指出：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毛泽东说：“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为了说明这个斗争的策略，毛泽东在这里还讲了唐代大作家柳宗元写的《黔之驴》这个寓言。毛泽东说：“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宠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最后，毛泽东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883页）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用《西游记》第59回孙行者变为小虫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孙行者就是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页）这里毛泽东又一次谈到《西游记》第59回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故事，不过是反其道而用之，把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比作孙行者，把我们自己比作铁扇公主。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四省一市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时，又一次谈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故事。他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武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客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革命斗争和我们的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在实际工作中，在谈到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时，毛泽东常常是这样不拘一格地与《西游记》相联系，从具体的神话故事中寻求启示。许多的政策和斗争的策略，通过毛泽东的口用《西游记》中的人物或故事来加以阐明，说来引人入胜，道来妙趣横生。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大特点。说到这一点，笔者在这里再向读者介绍一段小故事。

1961年国庆节前夕，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浙江省绍剧团来北京汇报演出根据《西游记》第27回白骨精故事改编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演出。剧情的发展和演员的精彩表演，使毛泽东对这出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演出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始终很有兴致地观看。他时而点头，时而微笑。当演到“天王庙”一场戏时，看到孙悟空被贬，唐僧被白骨精擒住，猪八戒逃走时的蹉步、踉步、跑跳等夸张动作，毛泽东则捧腹大笑。这出戏先后在北京演出多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曾三次观看演出。看了演出之后，他特意写了一首七律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全诗是这样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老的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唐僧的憎恨，提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

毛泽东看到郭老师的诗后，不同意郭诗敌视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看法，认为郭老对唐僧的看法有些偏激。因此，他于1961年11月17日，也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了毛泽东的这首和诗后，认为毛泽东的诗，气势宏伟，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看问题。他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改正他对于唐僧的偏激看法。于是，于当天又依韵和诗一首，《再赞〈三打白骨精〉》：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迷雾聚成堆。

九千万里明真谛，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警惕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亿次来！

毛泽东看了郭老的这首和诗后，于1月12日，非常高兴地挥笔在郭老这首诗旁边写道：“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浙江省绍剧团的主要演员也挨了整。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对绍剧团著名演员的“解放”工作很关心。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南巡到杭州时，第二天，他就向有关方面询问了扮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那个美猴王的情况。毛泽东十分风趣地问道：美猴王现在是不是还压在五行山下？9月5日下午，当时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传达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后来，绍剧团的著名演员都很快“解放”了。这里，毛泽东把“对中间派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对著名演员的“解放”政策，和《西游记》中的有关故事联系起来，话说得不多，但寓意深刻，通俗易懂，字字句句都印在了人们的心中。

作者和作品的创作主题的视角。读《西游记》与读《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一样，毛泽东对作者和作品创作的主题是很为关注的。作者和其创作的小说作品，是一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其创作作品的主题是密切相联的。作品创作的主题总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总是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实际相联系的。历史演义小说是这样，像《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也是这样。所以，毛泽东读《西游记》，不仅在读一个个神话故事，而且还从作者和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来加以理解，把它当作形象的历史材料来学，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又一个特点。

本文上面提到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不少文章都谈到吴承恩和他创作《西游记》的社会背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都一一圈划。萧歌、竞华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吴承恩生于公元一五〇〇年，卒于一五八二年。这一段时间内，明朝的皇帝换了五个（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从当时的阶级斗争来看，武宗正德年间是明朝农民暴动范围最广、斗争最强烈的时期。。除去农民暴动之外，还有许多次城市居民的暴动。。从封建王朝的内部来看，帝王荒淫无道，委政权奸，朋党对立，互相倾轧。历史上遗臭万年的奸臣、阉党都产生在这个时代。例如：正德年间的刘瑾；嘉靖年间的严嵩、严世蕃。直言极谏，肯为人民着想的政府官吏，先后被奸宦的特务、钢刀、监狱和酷刑夺去了生命。能够在朝做官的，多半是权奸的奴才，不然就是噤若寒蝉，混吃等死的傀儡。吴承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样的社会现实，已足以使他愤世嫉俗。。”这些文字，毛泽东在阅读中差不多都划上了横道道。

对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社会背景，沈仁康《〈西游记〉试论》一文中，论述得更为详尽，从政治说到经济，从农业说到商业，对朱明王朝的专制独裁、奢侈腐朽、荒淫无耻、昏聩平庸、残害人民、疯狂掠夺、无恶不作等都作了分析。最后，作者指出：“总之，农民、市民与进入垂死阶段的封建势力，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西游记》产生的时代特征。”这篇文章，虽然作者已经在文后说明有“不少错误”，但是毛泽东还是从头至尾，又读又划，圈划符号密密麻麻。一条条横道、一条条浪线、一个个圈圈，如同一道道耀眼的光环，折射出毛泽东把《西游记》当作历史材料来评读的心理。与其说毛泽东在读《西游记》研究的文章，不如说毛泽东在读封建社会的历史。它是毛泽东把小说还原到产生它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把小说当作形象的历史来读的一个佐证。

关于《西游记》创作的主题思想，鲁迅、胡适等都有过评述。鲁迅认为，这部神魔小说“其所取材，颇极广泛。。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5—136页）胡适经过大量考证，确认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易竹贤辑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到底应当怎样理解这部大作的主题思想，上面说到的毛泽东阅读圈划过的张天翼、童思高、萧歌和竞华等《西游记》研究论文中都有评述。毛泽东在阅读这些评述的时候似乎分外用心，并有自己的倾向。

上面说到的文章中，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是怎样阐述的呢？毛泽东是怎样阅读圈划的呢？这里，我们将所知道的情况向读者作一些介绍。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张天翼写道：在《西游记》成书之前，“这取经故事里所写的，一边是神，神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上自天界，下至地府，无不要俯首听命。一边是魔，偏偏要从那压在头上的统治势力下挣扎出来，直立起来，甚至于要造反。天兵天将们要去收伏，魔头们要反抗，就恶斗起来了。”张天翼因此认为：“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时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前）的主要阶级关系和矛盾，在这里多少是反映出来的。而且，这故事愈经演变，愈发展，这一点就给反映得愈明显。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的了。”“在那原来的卫护封建正统的故事主题和题材里，却多多少少表现了人民的反正统情绪。”对孙悟空大闹天宫，张文写道：“究竟要闹出怎样一个局面来，起先连孙悟空自己都模里模糊。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这才忽然想到玉帝的尊位——‘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因此，张天翼认为：“假如孙悟空闹成了功，那也不过是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着农民起义运动的高潮而爬上了龙位一样——自己成了地主头儿和统治者，而农民又照样被那换了姓的主子剥削着压迫着，终至于又闹造反。”

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张天翼在《〈西游记〉札记》中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同构”关系。这一观点与毛泽东关于神话传说的一贯看法是相合的。所以，毛泽东在阅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对张天翼上述的一些分析和研究很有兴趣，读后在每一句话下面都划了横道道，有的话下面还划了两条横道，有的地方还划上了圈圈，足以表明他对这些分析的重视。

这里要说明的是，张天翼这篇文章，起初是发表在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当时，毛泽东有没有及时看到和阅读这篇文章，笔者这里也说不清。但笔者知道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的这一期《人民文学》（包括张文），毛泽东没有阅读圈划的标志。这篇文章后被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毛泽东阅读圈划的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笔者看到的就是收入这部文集的这篇。

上面已经提到过的童思高的文章，是专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一开头的几句话，好像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作者是这样写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出生于明代中叶，正是明成祖制定严刑峻法、残酷迫害人民的时代。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作者以愤世嫉俗的情绪，讽刺揶揄当时世态；以神话式的幻想和虚构，创造了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名著。”这段话，毛泽东读后重重划上了横道道，“正是明成祖制定严刑峻法、残酷迫害人民的时代”这一句话下面划了两条粗道道，句末还划了两个圈。

对神佛和妖魔的关系，童文的见解颇有新意。作者认为《西游记》中的神佛和妖魔一体，同属统治阶级。“神佛只不过是公开的‘合法’的压迫人民、掌握着人民的命运的统治者，有天兵天将、诸神法力等统治阶级的威权。使人民把他们奉为不可侵犯的神圣，并还要随时顶礼朝拜，供奉香火。稍有冒渎不恭之处，立即降祸生灾，万民受难。。。妖魔是神佛的下属，是直接受神佛支配的压迫与统治人民的工具。”“孙悟空等要保护唐僧到西天去取经；而神佛则遣使妖魔安排了‘八十一’难，试他师徒果有真心取经。孙悟空战胜了一切妖魔鬼怪，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终于达成目的，成为‘正果’。这和当时人民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的痛苦心情是一致的。孙悟空这一英雄形象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封建统治者的压榨下，仍然发挥了无限的战斗性与创造力，具有丰富巨大的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力量。”“这个取经故事就构成了：一边是神魔——主宰世界的统治者，。。。一边是唐僧等众，虔诚修行，立志前往西天取经，克服了神魔安排的各种困难。唐僧等对困难的斗争，就变成了善与恶的矛盾和斗争。”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写道：《西游记》“是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力。”童思高的这一关于“神佛和妖魔同属统治阶级”和对孙悟空这一英雄形象的评价，大概更能说明《西游记》的主题意义，它与毛泽东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诗句的思想观点是相通的。所以童文中上述的有关《西游记》主题思想的一些评述，毛泽东读来尤有兴趣，并且一一圈划，有不少地方，都划了两条粗粗的横道，还有不少句末和段末，都划了三个大圈。这些圈圈划划，充分表明他非常重视这些分析。毛泽东所以爱读《西游记》，与对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的喜爱是分不开的，也是与童思高上面所阐述的他本人的思想观点相通的这一主题思想是分不开的。

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和解释神话世界，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一次在同一个阿拉伯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世间纷争不断的问题时，来宾们颇有感慨。毛泽东接着提出一系列问题：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继而他又一路发挥说：按照中国道教的想法，天国还有一位众神之王，叫“玉皇大帝”，如此看来，天国也不会安宁，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85页）毛泽东的这一充满想象力而又风趣含蓄的谈话，把人间与天国、现实与幻想沟通，在他看来，各种各样的神仙和上帝，是现实生活世界各种矛盾的延伸。孙悟空同玉皇大帝等天神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的失败和失败后的归顺，从一定的意义上揭示

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体现了人民渴望自由，征服自然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毛泽东这样联系《西游记》，不拘一格去联想，去进行思维发散，这不能不说是他读《西游记》的一个重要特色。

作者和作品创作主题的视角，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这也是毛泽东把小说当作历史读的一贯的做法。

用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来印证或阐发自己的认识，说明一些实际问题。这也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个视角。《西游记》虽然是一部历史神话小说，但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常常联系实际，用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来印证或阐发他自己的认识。许多实际问题，包括人们工作、思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通过毛泽东这样去联系，去阐发，去加以说明，就能给人以启迪和教育，就能使人心明眼亮，就能给人增加信心和力量，就能给人带来希望，就能给人指明前进的方向。

还是在延安的时候，一次在给即将毕业的“抗大”第三期二大队学员的讲话中，在谈到学员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应当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要求时，毛泽东就借用《西游记》中的故事和人物侃侃而谈。他说：“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在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地提到那匹白马，他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毛泽东的通俗、风趣的讲话不时引起全场的掌声笑声，给学员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牛克伦：《熔炉》，《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干部要定期“放火烧身”，要经受锻炼的问题时，就引用《西游记》中太上老君把孙悟空放进八卦炉里用火烧的这个故事。他说：“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孙悟空在太上老君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2页）这故事见《西游记》第7回。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冷不防被太上老君的“金钢琢”打中，被众天兵抓住，玉帝命押到“斩妖台”将他剁碎。不料孙悟空法术高强，刀砍不动，枪刺不进，用火烧用雷轰也损伤不了他一根毫毛。太上老君就把孙悟空放进他炼仙丹的八卦炉里，用猛火烧七七四十九天。可是孙悟空在八卦炉里，不但没有被烧成“灰烬”，反而经过烟熏火燎锻炼出一双“火眼金睛”，变得更加刚强了。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还要锻炼，我们的每个干部当然人人也要锻炼。毛泽东的讲话，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毛泽东在报告、讲话和与人交谈中，很爱引用《西游记》中的人物和故事来印证阐发他的认识。说的人随口引用，贴切自然，恰到好处，听的人入耳入脑，受益非浅，回味无穷。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爱读《西游记》，而且读得很熟。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会读书，善于运用，就是像《西游记》这样的历史神话小说，他也把它与当今实际相联系，给人以教育，给人以启示。在半个多世纪岁月中，毛泽东对《西游记》一直充满着浓厚的兴趣。青少年时代，毛泽东爱读《西游记》，那是因为受书中的一个个神话故事的吸引。那么后来，特别是踏上革命道路之后，直至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之后，为什么对《西游记》还一读再读呢？对于这一点，很多的读者一定都是很了解的。笔者认为，《西游记》虽然是一部神话小说，但是，《西游记》中有政治，有斗争政策和策略，有封建社会的掠影，有我们现实生活可供借鉴，为我所用的人物故事等各种历史资料，所以，毛泽东对它一直很喜爱。毛泽东阅读《西游记》，不是仅仅在读神话故事，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在同一历史时期，他读《西游记》都是有各种不同的视角。我上面说到的四个方面的视角，只是笔者的个人之见和个人的归纳，实际上远远不止这四个视角。还有文学的视角、语言运用的视角、人物塑造的视角，等等。因为他读《西游记》，有多种不同的视角，把小说当作政治书读，当作政策和策略的书读，当作认识和了解封建社会历史书读，当作处理和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的参考书读。所以几十年里，他对《西游记》一直很喜爱。

毛泽东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西游记》，有平装小字本的，也有线装大字本的，现在大多都还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西游记》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部神话小说，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百花园里也是一朵艳丽夺目的奇葩。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游记》和其中的人物故事仍然会受到今人和后人的青睐，在社会和人民中流传。那么，毛泽东阅读和批注过的多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和他关于阅读《西游记》的轶闻趣事，也一定会备受今人和后人的重视，在社会和人民中千古传诵。

第05章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是一部社会小说。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主张自由恋爱。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作者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小谢》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聊斋志异》中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如果说，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神魔小说，毛泽东最爱读的是《西游记》，那么，我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狐传奇小说，毛泽东最喜爱读的大概就要算是《聊斋志异》了。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学中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它是我国清朝初年的一位杰出的作家蒲松龄所撰。据说，我国现存最早刻本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青柯亭本，分为16卷，共400余篇。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方面还发现并影印出版了作者的半部手稿定稿本，还有会校会注会评本，所收篇目比较完备。本书作者长期生活在农村，书中的故事大都是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基础，想象丰富，构思奇妙，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境界瑰丽，艺术独特。作者通过民间广泛流传的、人们喜闻乐道的一个个故事，通过自己独特的思维和艺术创造，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深受人们同情和喜爱的人物形象。本书的作者以谈狐说鬼的故事形式，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和统治阶层及官吏们的腐朽生活与种种的罪恶、对科举制度和种种封建礼教等多有揭露和批判。作者还以火一样的激情和无限同情的笔调描绘了许多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执著地追求人生自由和个性解放、热烈地向往美好生活的妇女形象。无论从作者的文学语言的艺术特色，还是从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社会现实价值，《聊斋志异》在我国古典文学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它与《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古典小说一样，是一直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一部古典小说。

毛泽东早在少年时代就爱读《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小说，关于他少年私塾读书的情况，他的塾师毛宇居曾回忆说：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他最喜欢看的是《精忠传》、《水浒传》、《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1960年4月《韶山老人座谈会纪要》，转引自高菊村等著的《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毛泽东本人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过：“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这里，老师和学生的回忆中虽然都没有直接说出读《聊斋志异》这部书，但两个人的回忆中都用了同一个“等”字，这“等”字中是不是包括《聊斋志异》呢？如果说这里的回忆还没有直接说出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聊斋志异》，那么，下面的回忆说得就很明白了。李锐在其记述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的著作中，谈到毛泽东少年时在私塾读书的情况时写道：“在一篇讲鲁迅的文章里看到，说过他幼年在私塾读那些古书，并无多大好处，帮助开窍的，乃是《三国》、《水浒》，后来是《聊斋》，一生受益的不是经学而是杂学。”（《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4页）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瞭望》1983年第12期）一文中说：“《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毛泽东少年时代就非常喜爱读我国一些著名的古典小说，《聊斋志异》是我国非常著名而且流传很广的古典小说之一，所以，《聊斋志异》引起少年毛泽东的阅读兴趣，这是很自然的。

1937年8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哲学论著《矛盾论》中，在谈到矛盾的互相转化的问题时就说到了《聊斋志异》。他说：“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是互相变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0—331页）这大概是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说到《聊斋志异》。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聊斋志异》如同《西游记》、《淮南子》、《山海经》一样，毛泽东都是读得很熟的，这些书中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他都一直记得很清楚。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岁月，毛泽东还多次阅读《聊斋志异》。说到毛泽东晚年读《聊斋志异》的事，这里先向读者介绍一下笔者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的会客厅里，放有许多毛泽东晚年常看的图书，其中就有蒲松龄著的《聊斋志异》。有线装大字本的，也有平装小字本的。笔者知道至少有以下4种不同的版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上海同文书局印行1——8册《聊斋志异》文学古籍刊行社1995年9月版1——4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版1——12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上、中、下册1974年2月出版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有两部，一部是放在会客厅里，另一部是放在办公桌旁的书架上。这四种《聊斋志异》，毛泽东晚年都翻看过，有的看过多遍，有的还作了圈划，有的还写有批注。圈划和批注的具体情形，笔者下面再详细介绍。

除这四种外，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毛泽东书库里还存放了以下十种线装本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评注图咏》1——16册《聊斋志异新评》1——13册《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光绪十二年（1886年）版1——8册《聊斋志异》（影印本）1——4册《聊斋志异新评》1——13册《聊斋志异》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5月版1——5册《聊斋志异》1——8册《聊斋志异新评》康熙己未年（1679年）版1——16册《聊斋志异》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9月版1——4册《聊斋志异》咸丰乙卯年（1855年）版1——16册还有4种平装本的蒲松龄的著作：《聊斋故事选》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3月版1册《聊斋故事选评》中华书局1962年8月版1——3册《聊斋白话韵文》朴社1929年3月版1册《聊斋志异拾遗》1册这些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的著作，差不多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管理图书工作的人员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和对中国古籍阅读广泛的需要，陆续从旧书店、旧书摊上购买来的。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版本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毛泽东不是古籍版本的收藏家，对各种古籍版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是，毛泽东非常嗜爱中国古书，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等，他尤为喜爱。所以，管理图书工作的人员在旧书店里、旧书摊上，一见到毛泽东喜爱的图书就把它购买回来放到他的书房里。每当毛泽东走进他的书房，看到新购买来的图书，总要先粗略地翻一翻，先知道个大概，然后才看其他的书。第二，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如同读《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一样，常常将几种不同的版本放在一起，对照着看，或者翻翻这一种，或者看看那一种，这些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据笔者了解，不能说是全部，恐怕绝大多数，毛泽东都阅读过。有的不知道反复看过多少遍。笔者听陈秉忱说过，上海同文局印行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9月出版的《聊斋志异》，大概是1955年秋季购买的，那时候，毛泽东还在丰泽园居住。陈说，这两种书买回之后就放在丰泽园菊香书屋西厢房毛泽东的书房里，他一见到就很喜爱。1966年8月毛泽东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居住后，这两种书随着他诸多的他晚年爱看的古籍（包括1952年置的那部大字线装本二十四史和各种字贴、墨迹等）一起搬到游泳池他的书房里。毛泽东逝世之后，遵照中央有关负责人的指示，1979年初陈秉忱领着我们几个人在游泳池整理毛泽东生前阅批过的图书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两种，陈高兴地对我们说：“这两种书是我替主席买的。”陈说，那时候，他和田家英、逢先知等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晚饭后、星期天等闲暇时间，他们几个人常到琉璃厂中国书店、东安市场等处为主席购买图书。说到这里，陈突然停了下来，想了片刻后又接着说，大概是一天晚上，田家英找到了他，说主席要看《聊斋》。第二天他就去中国书店买了这两种。说着他就情不自禁地一页一页翻看起来，似乎仍然沉浸在过去岁月的回忆之中。从1955年到1976年，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21年来，毛泽东把这两种《聊斋志异》一直放在自己的身边，可见他对蒲松龄的这部著作是多么地喜爱了。这两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详注聊斋志异图咏》许多地方用黑铅笔作了圈划。后一种《聊斋志异》，毛泽东还在上面写了一些批注。这两种《聊斋志异》都是毛泽东生前很爱读的，连同上面提到的各种《聊斋志异》，现在它们都还存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瞻仰过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人们都会看到，故居里到处都放着书，在那浩如烟海的图书典籍中就有笔者上面说到的几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

毛泽东在《聊斋志异》上写的批注，很多读者一定是很有兴趣的。这里笔者将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条批注向读者作一简略的介绍。

《聊斋志异》卷六中有一篇题目叫《小谢》的，这一篇是写渭南一个穷书生陶望三借住在一座鬼魅感人的旧府第内，被乔秋容和阮小谢两个女鬼恫吓、纠缠、调逗，但他却不惧、不恼、不动，且对两鬼友好相处，平等相待，二鬼被感动，就拜他为“师”习字读书。几个月后，小谢“书端好”，秋容“能诗酬唱”，且因受师开导，她们也“颇知义理”了。当陶赴试并被诬下狱后，二鬼给他送饭，并赴院申理，遂使陶获释出狱归家。其中两鬼亦备受艰辛，小谢脚受伤，秋容被黑判摄去幽囚。经过一番曲折，他们得以团聚，“情同伉俪”，但始终无越轨同寝。小谢、秋容的善良、勇敢、多情，和她们同陶生的和睦互助，真心相爱的行为，感动了一个道士。道士称赞“此鬼大好，不宜负他”，遂用仙术先使秋容借郝氏女尸还阳，又使小谢借蔡氏之妹尸还阳，方才结为夫妻。作者笔下的小谢和秋容都是容貌绝世、品质纯净、聪明痴情的女性，她们蔑视封建礼教，积极主动地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作者在这里还赞扬了陶生与小谢、秋容之间的平等关系。小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简练，形象生动。毛泽东读后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并饱含深情地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批注：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和平等的。蒲松龄的这一篇小说在这里能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明这一篇小说从思想到内容到人物描写和语言文字等都是很好的，它是我国古典短篇小说中的一篇佳作，它在我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聊斋志异》卷六中，还有一篇题目叫《马介甫》的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是，河北大名府有一个秀才，名叫杨万石。杨非常害怕老婆。杨的妻子尹氏，非常强悍，杨稍微触犯了她，就要挨她鞭打。一天，杨在府城里等候乡试时遇见了马介甫。从此，他们交往越来越亲密，便结拜为弟兄。在交往中，马介甫得知杨妻尹氏横蛮地欺侮和摧残杨家的老老小小。因此，马对杨家老小深表同情，于是，他就施种种小技，帮助杨万石制服这个悍妇。但是，每当杨万石看到老婆的气焰稍微收敛一些时，就不照马介甫说的办法去做，或者向悍妇讨好献媚，或者向悍妇泄漏真实情况。当悍妇一次又一次地知道事情的真相时，便认为她的丈夫并

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因此，在马介甫离开杨家老小之后，她仍然轻视他，嘲弄他，辱骂他。没过多久，那悍妇的故态完全恢复了。读罢这则故事，大概是因为作者对杨万石怕老婆和对这个悍妇的横蛮、凶残描写得淋漓尽致的缘故，所以，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批注：个性斗争，此妇虽坏，然是突出典型。

读过这篇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蒲松龄笔下的杨万石的老婆，是一个心肠狠毒的女人。然而从小说描写的艺术上来说，她又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从这段批语中，我们仿佛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作者刻划人物艺术的称赞。

卷六中还有一篇题目叫《白莲教》的小说，说的是白莲教的首领徐鸿儒，得到了一部旁门左道的书，能够役使鬼神。略微试了一试，看到的人无不惊异，奔走在他们门下的像一群鸭子争先恐后地来了。于是暗地里图谋不轨，便拿出一面镜子，说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终身结果。挂在厅堂上面，叫人自己去照，有时是一顶平民所戴的幞头，有时是一只贵人所戴的纱帽，有时是一袭大官所穿的绣衣，所戴的貂蝉，出现的形象很不一样，人们便更加感到惊异。因此到处传播，登门求见的，挥着汗珠络绎不绝的来了。徐于是宣称：“凡是镜子里出现的文武官员，都是如来佛祖注定要参加龙华会的人。各自应该努力，不要退缩。”便拿镜子自己来照，只见冕旒龙袍，就像一个帝王。大家互相看着，大吃一惊，一齐拜伏在地。徐于是造起旗帜，拿起武器，莫不踊跃相从，希望能和他在镜中出现的形象一样。没有几个月，聚集的人马以万计，山东的滕县、峄县一带，听到风声，就倒向他一边了。

后来，朝廷派了大兵来围剿，有一个彭都司，济南地区长山人，武艺和勇力都超过了别人，徐派了两个垂着头发的少女出来应战。两个少女都拿着双刀，骑着大马，刀白如霜，马嘶若怒，轻快迅速，周旋进退，从早到晚，两个少女没有能够伤害彭都司，彭都司也没有能够打败她们。这样打了三天，彭觉得精力俱竭，气喘吁吁地死了。等到徐鸿儒杀了，捉到徐的同党拘系起来拷问，才知道刀乃木刀，骑乃木凳，假的兵马战死了真的将军。

这篇小说写得虽然很离奇，但它说的是与农民起义有关的事，所以毛泽东很喜爱看。看了以后，他还提笔写下这样一条批注：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毛泽东写的这段批注，虽然文字不长，但对作者和作品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小说中虽然故事写得很离奇，但作者对封建主义的表现是很明显的，这是由作者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尽管是这样，毛泽东从这篇小说的字里行间还看到了作者同情农民的心理倾向。在封建社会里，作者能有同情农民的心理，并且还能将这种心理公开地渗透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作者，这样的作品都是值得称道的。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与作品所表现的这种积极的社会意义是分不开的。

《聊斋志异》卷六中还有一篇题目叫《细侯》的小说，写的是浙江昌化一个姓满的书生，在杭州教书，偶然到街上去走走，经过一所靠近街坊的阁楼时，忽然有一只荔枝壳掉在他的肩上。抬起头来一看，一个年轻的女子靠着阑干站在那里，姿色妩媚，十分美好，不由得凝神注视，心动情摇。那女子俯着身子往下一看，微笑着进去了。一打听，原来是妓院里贾家的养女名叫细侯。她的声价很高，满自己想到无法如愿以偿。回到书房里冥思苦想，整夜都没有入睡。第二天，他拿了名片来到妓院里，见到细侯，两人说说笑笑，十分开心，于是更加被她所迷惑了。他假借别的事由，向他的好友借了一笔钱，带到细侯那里去，得到极其殷勤的招待，便在枕上口吟绝句一首赠给她云：膏腻铜盘夜未央，床头小语麝兰香。

新鬟明日重装凤，无复行云梦楚王。

细侯皱着眉头说：“我虽然出身卑贱，常常希望找到一个同心同德的人托以终身。你既然还没有娶亲，看我可不可以给你做个当家的？”满非常高兴，再三叮嘱她要坚守盟约。细侯也很高兴的说：“吟风咏月的事，我自己认为也并不难。往往没有人在的时候，也想学作一首，恐怕不一定就好。如果能够嫁给你，希望能指点我啊。”顺便问了问满：“家里有多少田产？”回答说：“薄田五十亩，破屋几间罢了。”细侯说：“我嫁给你以后，希望常常生活在一块，不要再出去教书了。种四十亩地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再种十亩黍，织五匹绢，缴纳平常的赋税还有多了。关着门互相照应着，你读书，我织布，有空的时候，喝几杯酒，吟几句诗，消遣消遣，就是千户侯也不过如此啊！”

毛泽东的批注就是在读了满生和细侯这一段对话之后写下的。毛泽东写的批注是：资本主义萌芽后来满生和细侯的爱情又经历了一番曲折。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后他们终于不改盟约，破镜重圆。

这里，毛泽东写的批注虽然仅6个字，但它清楚地告诉我们：毛泽东读《聊斋志异》不仅在读小说，看故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读历史，他把《聊斋志异》当作清朝的历史来看，这是毛泽东读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对于这一点，笔者后面还要作具体介绍。

毛泽东批读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9月出版的这部《聊斋志异》，大概是1955年10月之后。此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聊斋志异》中一个个谈狐说鬼的传奇故事，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读得烂熟，到了年过花甲之年，他还一直如此有心境，还如此又读又批，爱不释手，充满浓厚的兴趣，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聊斋志异》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思想倾向。在管理图书工作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古典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进步性思想倾向的作品，都是很有兴致阅读的。《聊斋志异》虽然主要是写狐写鬼的，但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一些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思想倾向。对《聊斋志异》中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思想倾向，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作过评说。1939年5月5日晚，毛泽东专程到“鲁艺”去看望刚从国外归来的老同学萧三，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高陶著《天涯萍踪——记萧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与“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教师的谈话中，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毛泽东还曾说过：《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小谢》是《聊斋志异》中表现人与人之间民主平等关系的代表作。到了50年代，毛泽东在重读这篇作品时仍然那么有兴趣，称赞它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和平等的”。毛泽东直到年过古稀，一次与家人的谈话中，还称赞《聊斋志异》写得好。他很有感触地说：“《聊斋志异》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与读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一样，常常是这样带着感情阅读并从中挖掘出强烈的积极的思想价值。例如，他在阅读《注释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编，中华书局印行）白居易的《琵琶行》并序时，曾带着感情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①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无论是读古典小说，还是读古典诗词，对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主性或进步性的思想，毛泽东总是这样加以肯定。这是毛泽东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大特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通过一个个鬼狐自由相恋、自由相爱、自由结合的爱情故事，塑造了诸多的妇女形象，从非常广泛的范围内真实地反映了妇女的悲惨遭遇和苦难的命运。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非凡的概括力，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而且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凝聚着作者所主张的自由相爱、人与人之间民主和平等的思想，表达了作者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美好愿望。《聊斋志异》中一个个人鬼狐相恋、相爱的故事，就如同是作者精心绘制的一幅幅以妇女的觉醒和对种种封建礼教的反抗为主题的精湛的图画。所以，毛泽东在年过六旬的时候，重读这部鬼狐传奇小说还是那①《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又：“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样情感真挚，留连不舍。

第二，《聊斋志异》形象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的历史，广泛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如果说，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爱读《聊斋志异》，是因为该书中的一个个人鬼狐自由相恋、自由相爱以及他们热烈追求幸福生活的爱情传奇故事的吸引，那么后来，特别是到了晚年，毛泽东对《聊斋志异》还难以释手，一读再读，就不是因为一个个鬼狐传奇故事的吸引了，而是因为小说深刻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的历史，形象地再现了清代初期的时代社会风貌。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殁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是我国清代初期的一位杰出的作家。其代表作就是《聊斋志异》。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农民朝夕相处长达几十年。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深刻的感受，他熟悉农民的心理、愿望、风俗、信仰。他的思想感情有和农民相通之处。《聊斋志异》所描写的有许多都是作者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过的事。一个个故事就是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生产和生活的一小片投影。蒲松龄构思和创作《聊斋志异》，是从社会基本结构——家庭写起，从封建家庭内的夫妇妻妾、兄弟姊妹、父母子女、公婆妯娌直到族中乡里、朋友宾客等，甚至妻妾争宠、兄弟和睦、姊妹易嫁、继母虐子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历史而具体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微妙的关系。如果说一个故事就是清代初期社会生活的一隅，那么，全部的《聊斋志异》，就是再现清代初期生活的一幅汪洋恣肆、气象万千、世相纷呈、斑斓多彩的历史画卷。它非常清晰地向人们展现了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社会习俗、道德风尚、宗教信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聊斋志异》还以鲜明的人民性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官与民、官与官、豪绅污吏之间的关系，活生生地描画出平民被贪官虐吏勒索宰割、搜刮蹂躏的真实情景。《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诸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一个个不同的命运和悲惨的遭遇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的历史。

纵观《聊斋志异》全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书中大多数故事都体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基调。它们一方面把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幻想事物组织到社会生活中来，又极力把花妖狐鬼人格化，把幽冥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矛盾；一方面充分利用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以惩恶扬善，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理想的人物和生活境界。”（《毛

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81页）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天涯萍踪——记萧三》，第257页）正因为《聊斋志异》是一部社会小说，形象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社会的历史，所以毛泽东一直把它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而且越看越爱看。

第三，《聊斋志异》的文学艺术价值在中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除了作品具有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思想倾向之外，还与作品独特的写作艺术和语言艺术是分不开的。

对《聊斋志异》的写作艺术，1939年在延安时，毛泽东与他的同乡同学萧三的一次谈话中就作过评说。他说作者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里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萧三：《窑洞城》）《聊斋志异》俗名鬼狐传，作者笔下的花妖狐魅多具人情。作者的本意不在写鬼狐，而是借谈鬼抒发孤愤之情，通过拟人化的鬼狐社会活动以及它们的言谈话语来阐发自己的主张和人生理想。因此，作者描写的“鬼”、“狐”有的比人还可爱，而且很通人情，很会讲道理，对于这一点，研究《聊斋志异》的专家孙一珍写过这样一段评述：“蒲松龄在这些花妖狐魅身上，并不突出其物的属性待证，而是把它们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来描写。作者将这些幻化的形象，置于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寓意深远地摹写了各种人物的人性和人情。它们不仅具有普遍人的形体、外貌和生活经历，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如《狐谐》中人称‘狐娘子’的女主人公，一直没有露面，当然谈不到什么肖像描写，但是她那伶俐的娇音，诙谐的谈吐，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谈笑风生，若不经意，把那几个轻狂的客人，奚落得目瞪口呆。从而使一个爽朗、幽默、才华洋溢的女性形象脱颖而出。《青凤》中的青凤，尽管点出她是个怕犬的狐狸，终归还是把她当作大家闺秀来写的。她美丽、聪明，对爱情有着向往和追求。然而她又显得那么拘谨、矜持、温情脉脉。”（孙一珍：《聊斋志异》，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83页）对《聊斋志异》的写作艺术，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一文中也有评说：“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如福地洞天，别开世界；如太池未央，万户千门；如武陵桃源，自辟村落。不似他手，黄茅白苇，令人一览而尽。”

《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众多，但作者对每个人物的掌握和描写，做到篇篇有新意，人人有特点，个个有个性。描写的青年妇女达几十名之多，不仅个个都是那么漂亮、聪明、热情、可爱，而且性格彼此各不相同。对人物的描写，文字也都十分简练，往往只用几个字就把少女的美丽、伶俐等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语言艺术方面，《聊斋志异》在我国古典短篇小说集中，也以简洁、精练著称。有的学者说，蒲松龄在语言上锤炼得具有千金不易一字的功力。例如《红玉》这一篇，作者只用了32个字，就把冯相如和红玉月夜初逢，一见钟情，彼此默默无言而又心心相印的内心活动描写得维妙维肖！《罗刹海市》的开篇，作者只用了39个字，就把人物的姓氏、身世、外貌、衣着打扮、性格和爱好等刻画得栩栩如生。《聊斋志异》在语言艺术方面，除了以简洁精练、形象生动著称之外，同时还极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作者凝练的文字，卓越的语言技巧，笃厚的文字功底，使得《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更放异彩！

创作艺术的独特，语言艺术的高超，使毛泽东对《聊斋志异》一直青睐之至，暇不释卷。

毛泽东最爱读《聊斋志异》，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以上列举的三个方面，只是从作者和作品的方面来分析的，就是这方面的分析，笔者自知也是非常浅薄的。实际上与毛泽东本人的因素如理想追求、文化素养、性格爱好等也是密切相关的。大家都知道的，毛泽东非常爱读中国历史，把阅读中国历史作为认识和了解中国过去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毛泽东也很爱读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唐诗、宋词和中国古典小说，这是他认识和了解中国历史的又一个重要的途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名著，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社会的历史。因此，它博得毛泽东的喜爱，这是很合逻辑的。如果毛泽东主观上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客观上的东西再好，也是很难引起他的兴趣的。对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笔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这大概是很多读者已经知道的。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中，对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这部名著，毛泽东到底是怎样阅读的呢？这知道的人大概就不是很多了。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如同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一样，是多视角的。不同的岁月，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外部条件或不同的内在要求，阅读的视角是不同的。这是毛泽东读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读《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

那么，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毛泽东是从哪些视角阅读《聊斋志异》的呢？

历史的视角。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最重要的一个视角。在延安时，有一次毛泽东与何其芳等谈我国

的古典文学，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这是毛泽东对《聊斋志异》的一种评价，也是他读《聊斋志异》的一种方法。实际上，从延安时期往后的岁月，尤其是晚年的岁月，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差不多都是把它当作清朝的历史来阅读的。对于这一点，从上面已经介绍过的，毛泽东在50年代读《白莲教》、《小谢》、《细侯》这三篇小说时写的批注中可以看得出。就拿读《细侯》这一篇来说，《细侯》作者本来描写的是家境贫困潦倒的满生与妓女贾氏细侯的一段相恋、相爱的故事，可是毛泽东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从中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读《白莲教》这一篇，看到了“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很显然，他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

在与何其芳等的这一次谈话中，为了表明他的上述看法，他还以《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这一篇故事为例，他认为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他说：“《席方平》这篇作品的内容是借描写阴间的黑暗，来揭露清朝的人世间的黑暗。它描写阴间的狱吏、城隍、郡司、以至冥王都是贪污受贿，不问是非曲直。阴间的最高统治者冥王，对受地主老财的迫害，因而冤枉死的人来告状，不但不受理，而且用酷刑迫害。结论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其甚于阳间。”（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72页）

《席方平》是《聊斋志异》的代表作之一。席方平是人名，一个性格刚强的男子。故事说的是：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与同乡富户羊某有过一些不和。这位姓羊的富翁死了之后，席廉得病，在生命垂危时对人讲，是羊某贿赂阴司官吏来拷打他，最后席廉浑身红肿，惨叫着死去。父亲惨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如呆如痴，他发誓说：“我要到阴间为父伸冤。”果然席方平的魂魄离开了身体，来到了阴间之后，远远地看见他父亲在向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听了父亲的诉说，更加痛恨狱吏，遂写好状子，向城隍（在旧社会里，被说成是十分正直的地方阴司官）告状。城隍因受了羊某的贿赂，看了席方平的状子后，硬说席的控告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席方平气愤至极，继续往上告，告到郡司。由于郡司也受了贿赂，他不但不受理席的状子，还将席痛打一顿，仍将此案交城隍办理。席方平只好又回到城隍辖区，尝尽了桎梏之苦，而不能伸冤。城隍怕席再告状，就派人将席押送回阳间的家。鬼差押席到家门口就走了，席又悄悄回阴司，状告到冥王那里。谁知冥王偏袒城隍和郡司，不容席诉说，就下令打他二十大板。席方平厉声问道：“小人何罪？”冥王仿佛没有听到。席在酷刑下愤愤不平喊道：“我是该打的。谁叫我没钱！”冥王更加发怒，叫鬼卒把席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冥王问他还敢再告吗？席说：“大冤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冥王听后更加大怒，又叫两个鬼卒把席的身子锯成两半，席疼痛难以忍受，却硬是一声不吭。行刑的两个鬼卒大加钦佩说，真是条硬汉子！掌锯的鬼卒同情他是孝子，不忍锯他的心，锯子故意锯偏才没有伤他那颗心。不一会儿，身子被劈成两半。冥王问席还告吗？席怕再遭毒刑，便谎说，不告了。冥王立即叫鬼差把他送回阳间。

席方平回到阳间，他想阴间的黑暗比阳间还厉害。可是他还不死心，要到玉皇大帝那里再告。他听说二郎神是玉皇大帝的亲戚，聪明正直。于是席又重到阴间去找二郎神。席到阴间又被冥王的鬼卒抓住，冥王软硬兼施，叫他不要再告，并强行把他投胎为婴儿，席愤怒哭啼不吃奶，活了三天便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遇上了玉皇大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冥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了阳寿三纪（古代的一种计时方法，一纪为12年）。

《席方平》这一篇，毛泽东读得很熟。他认为，《席方平》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读。小说虽描写幽冥，其实正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投影。作者笔下的席方平这个人物形象鲜明，对现实社会的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这篇小说，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还常有声有色地给身边的同志讲述这个故事。毛泽东对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特别赞赏。他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岳瑟：《鲁艺漫忆》，《中国作家》1990年第6期）毛泽东讲《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要身边的同志懂得，老实的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要历经磨难，冤案终能昭雪。他说，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劳改、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从历史的视角读《聊斋志异》，把《聊斋志异》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条主要的方法，也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之处。如果说，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读《聊斋志异》是着重于看故事，那么，后来的岁月，特别是到了晚年，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笔者认为，就是着重于读清朝社会的历史了。

战略和战术的视角。这也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之处。《聊斋志异》不是兵书，也不是战略战术的专著，毛泽东怎么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去阅读的呢？

为了说明毛泽东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里，笔者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毛泽东在60年代初

与何其芳的一次谈话。

时间是1961年1月4日上午，地点在中南海毛泽东丰泽园住地的颐年堂。大约在1959年4、5月间，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的需要，提议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编选工作落实到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大概是到这一年的夏天，《不怕鬼的故事》基本编成。1960年，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将已经编好的初稿再加以精选、充实。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说明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以便引导读者结合实际更好地阅读。序言，毛泽东让何其芳先起草，起草好后再送给他看。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言。毛泽东看了这篇序言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在他的住地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毛泽东在与何其芳谈话时说：“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接着，谈话就转入正题，谈到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指《不怕鬼的故事》——笔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说完《妖术》和《宋定伯捉鬼》这两篇故事，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127页）

这次谈话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何其芳对序言又作了修改。1月16日，何其芳将修改稿又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值北京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会议间隙，毛泽东又一次审阅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并且在这个修改稿的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亲笔加写了以下一大段话：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今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〇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除了加写的这一大段话之外，毛泽东对这个序言修改稿还有两处重要的修改。一处是，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增写了：“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序言中原话是这样写的：“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看了这段话之后又加写了一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句话后来毛泽东又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两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住地又一次约见了何其芳。一见面，毛泽东就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说着，他还把他自己添加的上述那一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其他在座的几位同志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还要何其芳再增写几句，讲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129——130页）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本书序言中说：“这里选的不怕鬼的故事，都是着重描写人的勇敢，描写他们对于鬼怪无所畏惧，而且敢于打击它们，因之或许更多地表现了战略上藐视的精神。但其中有些故事也是可以用来说明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的密切结合的必要的。”《聊斋志异》中描写的许多个妖、狐、鬼的故事，如同《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中许多故事一样，既表现了战略上的藐视，又描写了战术上的重视。正如毛泽东所说：“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就拿《妖术》这篇故事来说吧。这个故事里的于公，不相信街上的算卦人说他三天就死的预言，没有受到讹诈。但他回去以后，并不是毫无警惕

的。到了第三天，他静坐在屋子里看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他便关门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一个荷戈的“小人”来杀害他，他用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一个纸人。接着又一个狰狞如鬼的怪物来了，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一个土偶。后来又来了一个高与檐齐的巨鬼，它一推窗子，墙壁都震动得要倒塌的样子。于公怕房塌被压，就开门出去和它搏斗。因为他会武术，这个巨鬼终于被他打败了，原来是一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器和武术的准备，他不是就会被那个算卦人派来的鬼怪所杀害吗？这个故事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就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人只要不怕鬼，敢于藐视它，敢于打击它，敢于战胜它，鬼就怕人了，鬼就必然要失败。

说到毛泽东从战略的视角读《聊斋志异》，还有这样一段历史趣闻：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向与会的同志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他在讲了1958年炮击金门的事之后说，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说到这里，他那如同我国历史文化知识库的大脑里立刻又浮现出了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我国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说着，他就很有兴趣地给大家讲了《聊斋志异》中那篇“狂生夜坐”的故事：《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

毛泽东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完了这个故事后，又强调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

毛泽东还把这个故事与当时炮击金门、马祖的实际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毛泽东风趣的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们哄堂大笑。当时的会议记录上，注明“笑声”二字的就有六处之多。毛泽东认为，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

在这次讲话之后的第21天，即5月6日，在与周恩来、陈毅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讲了上述“狂生夜坐”这个故事。在毛泽东看来，对鬼也要讲究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相信，任何鬼都是可以战胜的。

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就是这样，他不仅在看故事，而且在看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在阅读过程中，还紧密结合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实际，由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战略和战术，联想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现实斗争的战略和战术。既联想到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又联想到中国国内的种种魔鬼残余。他把《聊斋志异》中一个个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50年代，60年代，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年，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之所以那样用心，那样津津有味，这大概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产斗争的视角。从生产斗争的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是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的又一个特点。在我国古代的著名作家中，在农村生活时间最长、对农民最熟悉、最了解的，大概就要算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了。蒲松龄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在家乡山东淄川农村度过的。因为他长期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不仅亲眼目睹了风、雹、旱、涝、虫等自然灾害在农村造成的种种悲凉凄惨的情景，而且还亲身经历广大农民预防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种种的生产斗争的实践。他不仅熟悉农村，了解农民，而且从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学习、掌握了许多生产斗争知识。所以，《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的描写，既是封建社会我国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剪影，也是封建社会我国农村和农民从事生产斗争、生活习俗、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植物栽培、动物饲养宰杀等各种知识和经验的实录。它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我国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知识丛书。毛泽东说过：“《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清朝的史料”，既包括阶级斗争的史料，也包括生产斗争的史料。《聊斋志异》中有丰富的生产斗争知识，所以，毛泽东常常从生产斗争这个视角来阅读《聊斋志异》。

就以毛泽东读《狼三则》这篇故事来说吧。这篇故事包括三则小故事，都写的是屠夫与狼的斗争。第一则，写一屠夫被狼追着，他用卖肉用的铁钩子把肉挂在树上，狼缘树求肉，结果“钩刺狼腭，如鱼吞饵”，缢死于树。第二则，写一屠夫依靠场边的麦垛，先杀死面前的一只狼，又杀死麦垛后边正在打洞的那只

狼。第三则，写一屠夫以窝棚为掩护，用小刀割开狼伸进来的前爪，用吹猪的方法置狼于死地。这三则小故事，都是写屠夫运用自己的生产知识杀死贪欲很强的恶狼的。这篇故事，毛泽东早就读得很熟。据何其芳回忆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夕，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他和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个党员教师在毛泽东的谈话中谈到了《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还很有兴致地给他们讲了这篇《狼》中的第三则小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了，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

何其芳回忆说，毛泽东以这个故事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讲完了这个故事后，毛泽东还笑着对他们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73页）这是毛泽东对作者蒲松龄的称赞。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屠夫宰猪一定是见得很多的。正因为他具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才写出了这样令人爱读的故事。

类似《狼》这样含有生产斗争知识的故事，《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

毛泽东在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能从生产斗争这个视角去加以理解，把小说当作生产斗争知识来读，从阅读这些故事当中来学习生产斗争知识。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又一个独特之处。

调查研究和搜集写作素材的视角。这也是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视角。我们知道，名震中外的《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大约从30岁开始，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才写成的。它是蒲松龄一生殚精竭力作。《聊斋志异》的创作成功，除了作者长期的农村生活基础和创作才能外，与他大量地调查研究和自觉地长年不懈地搜集写作素材是分不开的。

清代以来，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传说颇多。传说他在塾师教书之余，专门从济南移植“白玉垂丝菊”，精心制做“蜜饯菊桑茶”，用驰名的柳泉水沏泡，招徕远近往来行人说故事。山东潍县年画界有一位有名的画商“年画张”，对蒲松龄极为敬重，两人友谊很深。“年画张”每年腊月进画，卖画，或者春天去江苏扬州、姑苏一带搜集画稿或购买雕板优质木材，都要从蒲松龄的家乡淄川经过，一年中要往返好几次。“年画张”知道蒲松龄在写《聊斋志异》，就主动帮助他搜集民间故事。因为他走的地方多，听到的传说和搜集的民间故事也多，而且他还自己动手帮助蒲松龄修改、创作。据传说，有一天早晨，“年画张”给蒲松龄讲了三个民间故事，带来两篇搜集稿，一下子就提供了五篇创作素材。恰好这一天李希梅又带来了由济南、曹州朋友处寄来的两篇。这样，蒲松龄在一天中就搜集到七篇故事和素材。（“年画张”的材料见杲红星、王赤生编《蒲松龄轶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对蒲松龄的调查研究和搜集民间资料，我国的有关史籍中亦有记载。最为详细的，大概要数邹弢著的《三借庐笔谭》卷六中的一段：“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辰，携一大磁罍，中贮苦茗，具淡巴菇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

据载，在辽宁金县人民口头上也有这种传说，说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写不下去了，就煮了一锅绿豆汤给南来北往的人歇脚，解渴，说故事。他把故事听多了，品透了，再回去写。这回可跟以前大不一样，“那笔就像捅着泉眼了似的，一溜两行的字儿，自己就冒出来了。”（《蒲松龄的传说》，《民间文学》1963年第6期）

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浙江的一则传说更为奇特。说蒲松龄的长相和钟馗差不多，一脸落腮胡子，“心地却是一潭高山泉，一清见底，肚才也好得出奇出异”。传说他本来考上了状元，只因皇帝以貌取人，嫌他长得丑，没取。在他落第回家的路上，有个驼背老大爷，给他讲了马骏（驥）飘海到罗刹国的故事，于是蒲松龄回去写了“花面相迎，世情如鬼”的《罗刹海市》。从此搜集一篇写一篇，写成了《聊斋志异》一部大书，并且传说连怎样搜集民间故事，也是这个驼背老大爷教他的：要在四个字上下功夫。这四个字就是“甜、酸、苦、辣”。

甜，是嘴要甜，对人要和气，称呼要好听，“男女老少都接近，故事多得写不赢”！

酸，是心肠酸，说故事的人伤心，搜集故事的就得流泪，“要是长了木头心，故事好能动人心”？

苦，有两重意思：泡壶苦茶给讲故事的人喝，给他润喉；另外还要做到：“十冬腊月不怕冷，大暑炎炎不怕热，无衣无食不怕苦”！

辣的地方要辣，不要怕伤人，辣了能醒人！

据说从此蒲松龄真的按老大爷的教导做了，听了一辈子故事。因为天下的奇事太多了，到死也写不完，所以蒲松龄死的时候一只眼未闭。（汪玢玲：《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

上述这两则传说，不一定真有其事。但它从一个小小的侧面说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是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和搜集资料工作的，人民给予蒲松龄的智慧和力量，蒲松龄从人民中搜集了创作素材，汲取丰富的经验和营养。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素材的来源和搜集，蒲松龄本人在《聊斋自志》中也有这样一段自我介绍：“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以上简略的介绍足以说明，《聊斋志异》的创作成功，是因为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搜集写作素材的工作的结果。正如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对刚从国外归来的诗人萧三说过的那样：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狐狸精来呢？（《天涯萍踪——记萧三》，第257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读《聊斋志异》，不仅在读故事，而且从故事的字句中间看到作者所做的大量的深入的、艰苦的调查研究和搜集材料的工作。从调查研究和搜集写作素材这个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到的方法。

毛泽东是一个很注重调查研究的人，并且长期在身体力行。《聊斋志异》是蒲松龄调查研究的产物，《聊斋志异》中凝结着蒲松龄调查研究的实践。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与此有无联系呢？

以上谈及的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视角，仅是笔者根据毛泽东读书的实际所归纳的主要的视角，它是笔者的主观之见，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视角。《聊斋志异》是一部荟萃中国文史典实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无论从作者和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品的思想内容、创作艺术、语言运用、人物描写等方面来说，《聊斋志异》都是很值得一读的。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更爱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研究、去理解、去汲取、去运用，所以在几十年中，他一读再读，越读越爱读。

笔者知道，从50年代开始，毛泽东身边就一直放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的岁月，他办公桌旁还放着《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毛泽东终身爱读《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一直伴随在毛泽东的身边。如今，毛泽东已经离去，然而，他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聊斋志异》，还一直存放在中南海他的故居里，成为我们永久的纪念。后记今年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03周年。在深切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时候，作为曾经直接为他老人家服务过的我们来说，心情更加不能平静，更加思念这位最受我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也是我们心目中最敬爱的导师。

我们是为晚年的毛泽东管理图书和报刊的。自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几个有关的同志还像往常一样，一直伴随着他老人家生前阅读批注过的数万册图书，依然每天进出在他曾工作生活长达27个春秋的中南海故居。故居的主人虽然随着流逝的岁月离开我们越来越远，然而，每天每时，当我们走进故居，看到故居的主人生前用过的一件件遗物，一直很喜爱的一册册字帖和一件件古今著名人物的字画，整理抄录他生前读了又读而且写了许多批注文字的一册册图书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不由地就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和已经过去的一件件往事，仿佛他仍在我们身边。毛泽东是已经离开我们，而且离开我们越来越远。然而我们的心理感觉好像似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的心目中，他老人家仍是那么神采，仍是那么慈祥，仍是那么幽默，仍是那么令人敬仰、令人心折、令人崇拜。他老人家还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

毛泽东博览群书，终身酷爱读书，特别是在耄耋之年和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还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常常不分昼夜地读书，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眼见耳闻和自己亲身经历与做过的一件件往事，还都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间。如果说毛泽东一生中有何最大嗜好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就应当说是读书学习。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中，还是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离开北京去外地开会或视察工作期间，不管工作多忙，他每天都要坚持读书。进入70年代，特别从1971年“9.13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体质愈来愈差，多种疾病接连不断。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喜爱的散步、游泳等运动几乎全神有余而力不足了。唯一的每天能坚持的活动就是读书。生病发烧了，

医生建议他少读书或不读书，可是他还天天带病坚持读书。腿病不能站立、不能走路了。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也要读书；眼病小字本的看不见了，就看大字本的。从1973年底到1976年初，他先后看了几十种数百万字的大字本书刊。没有大字本的，就用放大镜一行一字地看。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两眼全不能看书了，每天还要让身边的同志给他读书。直到他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几个小时，已经无力说话了，还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书。正如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时曾说过的那样：“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是按阴历一年为三百六十天计算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的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有人曾经把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比作是书籍的海洋，这是因为在他的住地到处都放着书，连厕所里和睡觉的床上都摆放着书。进城以后毛泽东一直睡的都是双人木板床，床上除了躺下一个人的位置外，其余的地方全放的是书。与其说毛泽东是睡在木板床上，不如说毛泽东是睡在书籍的海洋里。毛泽东是一位很喜爱在长江、大海里顶狂风、战恶浪的游泳高手，也是一位生命不息、在书籍的海洋里孜孜不倦、采撷不止，从来没有满足过的求知者。几十年来，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广泛地阅读古今中外记载着各种知识的书籍。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存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各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还有各种社会科学和许多自然科学书籍。毛泽东一生中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很惊人的，是很少有大学问家可以相比拟的。是图书一直陪伴着毛泽东，还是毛泽东一直陪伴着图书，反正生活中，毛泽东的身边不能没有书。中南海故居里存放的数万册图书，有的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在湖南上学时读过的，有的是延安时期读过的，更多的是建国以后阅读过的。有的书上有毛泽东本人的亲笔签名，有的书上盖有毛泽东的印章，有的书上还写有许多的批注文字和圈划的种种符号。这一册册的图书，一直伴随着毛泽东。它们是毛泽东读书生活最真实的记录，也是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的珍贵的资料。

《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五部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读得烂熟。后来的半个多世纪，他还一直爱不释手，直至生命垂危的最后的岁月，他在病中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时常很有兴致地和身边的同志一次又一次谈论和评说。如果把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活比作是人生行进的万里历程，那么，他阅读和批注过的《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五部古典小说就可以说是这万里历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耀眼的光环之一。它虽然仅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侧面，但从中我们也能约略地看出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倾心追求知识的精神是多么令人钦佩。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五部古典小说的批注、评论和轶闻趣事，将会随着这五部小说的流传受到今人和后人的青睐，在今人和后人中千古传诵。

这本小书的出版，得到了华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书草拟过程中，摘引了逢先知同志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期间的有关的原始记录，也参考了一些同志的有关的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书中谈及的一些史实，仅是根据我们当时的记录或个人的记忆，有的不一定准确。一些观点或评说，也仅是笔者的粗浅之见，有的可能也不尽妥当。不妥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愿这本小书能伴随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愿这本小书能增添您对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点了解。

愿您从这本小书中能得到一点启示。

徐中远一九九六年五月于北京